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發生在魏京生被捕十周年..

楊魏家書



李勝峯論國家目標
房志遠評兩岸棋局
森林大火中記者的遭遇
大上海經濟戰

西藏在血泊中呻吟

71

APRIL / 1989

致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

公 開 信

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於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鄧小平主席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四十週年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是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簽名發起人

北 島、邵燕祥、牛 漢、老 木、吳祖光[✓]
李 陀、冰 心、宗 璞、張 潔、吳祖湘[✓]
湯一介、樂黛雲、張岱年、黃子平、陳平原[✓]
嚴文井、劉 東、馮亦代、蕭 乾、蘇曉康[✓]
金觀濤、劉青峰、李澤厚、龐 朴、朱 偉[✓]
王 焱、包遵信、田壯壯、王 克、高 臯[✓]
蘇紹智[✓]、王若水[✓]、陳 軍[✓]

簽名者請按以下地址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三里屯 麒麟飯店 二〇六室
「八九」大赦辦公室 陳軍

把簽名活動推向新高潮

胡平

二月十六日，大陸三十三名知識份子聯署公開信，支持方勵之先生早些時候提出的要求，呼籲中共當局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消息傳到海外，激起了強烈反響。在不到十天的時間裡，廣大留學生、海外華人，還有台灣、香港等地的知識份子的關心國是的人們，紛紛起而響應，一個聲勢浩大的簽名信活動正在蓬勃興起。

雖然這場簽名信活動遠遠沒有結束，但是它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重要性已經是確定無疑的了。這是四十年來第一次海內外民主力量的大聯合，它標誌着中國人民關於人權、自由、民主的共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據此，我們有理由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前途懷抱更大的信心。

就中共當局而言，一方面，迄今為止，當局還沒有採取直接的鎮壓措施；另一方面，根據二月二十二日中國司法部發言人的講話，則又明白無誤地表明了當局對此一活動的反對態度。尤其是在二月二十六日晚美國總統布希在北京舉行宴會，著名的科學家、人權鬥士方勵之先生被阻出席，更表明了中共當局的頑固立場。中共當局的這種反應原本不出人意外。因為我們很清楚，儘管這次簽名信活動所提出的要求十分理性、十分溫和，但它確實構成對中共當局絕對權力的一種有力的挑戰。中共當局擔心的，一旦它接受來自下面的壓力，無異

於提供一種先例；從此以後，中國人民將越來越勇於公開表達自己的願望，那樣的話，中共一黨專制的局面就被衝破一個缺口，整個專制社會中「上面」對「下面」的單向作用關係就發生了深刻的質的變化，從而最終導致極權統治的根本改變。

事實上，上述一點也恰恰正是目前這場簽名信活動的偉大意義之所在。毫無疑問，在中國大陸實現真正的自由民主，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萬事開頭難。除非我們善於抓住那些最簡單、最基本的問題，以便於召喚起千千萬萬人們的主動投入，否則我們很難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現在，簽名信活動仍在迅速地發展，這是十分令人振奮的。但是我們還需要進一步推動，我們還要把規模搞得更大。由於長期以來，中共當局總是對人民的願望採取漠視和壓制的態度，久而久之，就會使許多人心裡產生無力感和冷淡情緒。極權統治是利用人們的狂熱而建立，利用人們的冷漠而維持。大家都知道，這些年來，大陸內部的政治氣氛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發表不同政見而遭受嚴酷政治迫害的危險性已經顯著縮小；至於在海外，人們一般更不必擔心中共當局的直接鎮壓。那麼，為什麼還有不少人沉默不語呢？原因就在於人們的政治冷感和心灰意懶。為此，我們就必須善於發動那些表面冷卻的「死灰」，讓每一個入固有的良心良知重新燃起光芒。爭取民主運

動勝利的秘訣只有一個：那就是喚起盡可能衆多的人們的廣泛投入。

這次簽名信活動是從大陸內部首先發起的。這再次證明，在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鬭爭中，大陸內部的人民的作用是第一位重要的。在海外生活的我們，也有許多事情可做，有些事情通過外邊做還更容易，具有特殊的效果。在我看來，我們可以——

(一)除了自己積極簽名之外，努力動員更多的人投入，親朋好友、左鄰右舍，不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不論是來自大陸的還是來自港台的，不論大家在其它問題上有多少分歧，在聲援大陸人民的鬭爭中，不分黨派，不分彼此，不分親疏，一個人拉上三個人，三個人就拉上九個人，形式連鎖反應，多多益善。

(二)不僅參與簽名，而且還對大陸內部投入此一活動的人們給予密切的注視與關心，用海外輿論的強大力量，努力保障大陸民主人士的人身安全，不論是對國際知名的方勵之，還是對此活動中嶄露頭角的陳軍，不論是對於那些從事民主活動多年的鬭士任曉町、路林、李正天，還是對第一次投入這種活動的人，注視他們，保護他們，支持他們，幫助他們，從道義上，也從物質上。

(三)由於實行新聞封鎖，大陸內部、甚至包括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識分子圈子中，知道這次簽名信活動的人都很少。我們可以通過書信、電話、電傳或旅遊等方式，把三十三人的簽名信和在國內外聯繫的通訊地址告訴盡可能多的大陸的親友、同事，越多越好，越快越好。

歸根到底，信息的自由交流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基礎。讓我們大家共同努力，把這次簽名信活動推向新的高潮！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的第一份中國海外民運刊物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982年11月17日創刊

1989年4月號71期
3月1日出版

P.O.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NY 11370-9998
Tel: (718)429-6777 (718)507-4739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ew York.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

Copyright ©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 觀察家 | 讀·作·編 | 專 題 | 民主 牆 | 大陸 沉浮 |
|---------------------------------|-----------------------------------|--|--|---|
| <p>3 把簽名活動推向新的高潮 胡平</p> | <p>6 多點介紹大陸現狀的好文章 成林等</p> | <p>7 發生在魏京生被捕十週年…… 本刊編輯部整理</p> <p>陳軍、老木答司法部聲明</p> <p>「八九」大救辦公室致薩哈羅夫的信</p> <p>「八九」大救辦公室訪徐文立家屬</p> <p>方勵之夫婦談「被截事件」</p> <p>越洋電話：方勵之答倪育賢</p> | <p>10 中華民族為什麼不能保護自己的優秀兒子 莊思明</p> <p>論腐敗的根源 遼深</p> <p>以新的歷史感對共產主義危機 楊漫克</p> <p>從「九評」到對民聯的指責 楊遠</p> <p>台灣經濟之精髓與大陸改革之前途 李少民</p> | <p>29 誰該領農村改革的天功 楊天樹</p> <p>污染：在社會和自然中蔓延 小海</p> <p>大上海經濟戰 呼延民</p> <p>對報導者的報導——森林大火中的記者 薰子</p> <p>大雜院裡的暴發戶 田小剛</p> <p>七十三頭豬的故事 晨全中</p> <p>人口流動的衝擊 石磊</p> |

編輯手記

一九八九年二月令人振奮。

首先是國內三十三名知名人士聯署公開信，要求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海內外聲援四起。在北京，陳軍等人成立了「八九」大赦辦公室。在紐約，包括大陸、香港、台灣在內的知識份子共同發表宣言，敦促中國大陸的民主化。

這期中國之春全文發表了三十三人聯名的公開信和敦促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宣言。我們還獨家全文發表了陳軍、老木就司法部的聲明所作的回答；「八九」大赦辦公室訪問徐文立家屬的錄音記錄；以及作為「促進大陸民主化聯絡組」組長的方勵之先生同倪育賢的電話錄音。

我們還發表了楊巍出獄後給家屬的一封信。信中詳述了他本人在獄中的經歷以及大陸監獄系統的黑暗現實。

這期所發表的「西藏在血泊中呻吟」，是迄今為止有關西藏幾次流血事件的最詳盡、最權威的報導。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立法委員李勝峰先生關於國家目標的講話。李先生的講話，代表了現今台灣重要的政治人物對海峽兩岸關係的新思考。

為了聲援國內要求大赦魏京生的公開信，本期中國之春特別在第79頁印制了公開信的全文及續發的聯繫地址，一式四份。希望大家用各種方式把它們帶給在國內的親友。

特稿

27

香港民主派抗爭升級

劉永克

國內參考

77

班禪辭逝之迷議論紛紛
 ✓ 中共決意不放魏京生
 中共鼓勵漁民「三通」
 鄧小平決定整頓政治環境
 中共倍加防範民間沙龍
 ✓ 中共挑動日本領事館前示威

黎音

海峽兩岸

64 61 58

關於國家目標的問題
 假如中國是一盤棋
 ✓ 穿越兩岸交流的迷障——丁學良 VS 楊照

李勝峰
 房志遠

譯文專欄

71

中國的回答：社會主義在危機中

程鐵軍 譯

留學生欄

56 52 49

楊巍家書
 日本社會的最底層——中國留日「就學生」
 ✓ 夏博士肯塔基再次出醜

車少莉供稿
 馮朝陽
 林芳 曉珍

文藝園地

60 48

覺悟（小說）
 春之聲（詩歌）

張晴
 林慈

封二：
 封三：

三十三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會公開信
 敦促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宣言



讀者 • 作者 • 編者

多點介紹大陸現狀的好文章

編輯先生：

「中國之春」第七十期「大陸沉浮」欄中的三篇文章——「森林大火：誰之罪？」（作者熊能）、「河殤兮，海殤？」（作者楊天樹）和「大陸文化圈裡的自由職業者」（作者星星），是貴刊諸多介紹大陸現狀的文章中不多見的幾篇好作品。貴刊所登的談及大陸現狀的作品，經常是作者（留學生）們出國前或回國探親的短暫時間內的見聞，內容多是些浮略的觀感或道聽途說的故事，過於粗淺，意思不大。而七十期的這三篇文章，無論是內容、文筆，還是敘述口吻都與同欄的其它文章很不相同（有意思多了！）。

大陸留學生 成林

胡平你該怎麼辦？

胡平先生：

您好！得益於朋友的介紹，拜讀了您的「中國經濟改革向何處去」，其精闢的邏輯分析

和深刻的政治見解為探討中國經濟改革的真正出路奠定了堅定的基礎。

這一關係到占人類四分之一人口國家的未來將影響了整個世界，無疑這民主進步事業既偉大又艱難，您捍衛真理呼喚民主的膽識表達了渴望中國徹底改革的人民的願望，但是一個已擁有強大軍事集權的政治，怎麼能屈從於人民的意志而自覺退出歷史舞台？您為崇高理想的獻身精神不禁為人所深為敬佩，但是如果民主春風根本吹不進中國，我們將何以能期待這事業的成功？

中國究竟應該怎麼辦？

一位未來的法國政治家和我談到中國，他提出這樣一個假設：

一個科學家證明地球是圓的，而昏庸的國王不承認這是真理，指令要麼科學家放棄這個理論，要麼殺掉他。這位科學家應如何作出選擇？

胡平先生，您願回答這個問題嗎？

願這個富於哲理啓示的答案，有助於您所為之努力和奮鬥將給中國明天帶來曙光的事業從此走向一個新的高度。

一讀者（法國）

能否轉載中春的文章

胡平先生：

本報在香港創辦迄今逾四十年，言論方針一貫基於維護港人自由權益的立場，對中國前途問題所持的觀點，與中國大陸民主人士的觀點，基本上相同。「中國之春」在美國創辦以來，本報同仁至為重視，近年中國大陸留美學生為中國民主運動所作之努力，影響深遠，也增加了我們對中國前途的信心。

先生從中國大陸抵達美國，投入海外的民主運動，我們寄予關切之情，從「中國之春」讀到大作，至深欽佩。去年方勵之先生來港，我們曾與他晤談，大陸知識份子確已不再緘默，敢於在極權暴力下，堅持真理，成為人民大眾的代言人，深信民主的洪流不可抗拒。

今年是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這是現代歷史上重要的年份。最近，美國和大陸的知識份子都先後發表了爭取民主維護人權的宣言，有理由相信，今後民主運動將滾滾向前。

本報「自由談」版篇，經常刊載專家學者有關當代問題的文章，我們很歡迎先生賜稿，並盼留美的大陸學生投稿，稿酬當從優致奉。香港毗連大陸，本報每能經由往來旅客携入區內，對大陸民運已發生呼應功能。我們願意轉載「中國之春」的文章，如獲同意，敬祈惠復。

祝

撰安

香港時報社長黃得基啓

一九八九年二月廿二日

黃得基先生：

來函收悉，貴報願轉載中國之春的文章，我們十分高興。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運動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在此期間，海外、尤其是香港的與論界所扮演的角色更有其特殊的意義，深望今後我們能加強聯繫。

祝

春安

中國之春主編胡平

一九八九年二月廿七日

陳軍老木答司法部聲明

陳軍·

(一)司法部領導人所作的發言，沒有明確是授權於司法部，也不具發言人身份，故可以理解為只代表他個人作為領導的意見。

(二)該領導人對公開信的評估，沒有給讀者提供一個事實基礎，故反會有造成輿論混亂的可能，使公眾無法作出客觀地判斷。

(三)公開信從內容到簽署人的意願都基於人道立場，並對政府寄於希望，且要求大赦是直接向最高權力機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我個人以為只有人大常委會才能給予權威回答。

(四)我曾在致人大常委會另一封公開信裡，提到要把大赦列入人大會議事日程，並建立魏京生案件復議小組。也許我不瞭解中國第一冤案劉少奇主席案是如何從法律角度被審議、推翻，但我確知四十年裡被糾正的司法錯案，就下下幾十萬。

(五)憲法規定，人大常委會有權提出大赦，經國家主席批准即可實施，建國四十年裡我們已經大赦過日本戰犯、溥儀先生、杜聿明、沈醉先生，除了人道的立場可以考慮大赦外，刑法也規定，重大刑事要犯倘在服刑期間沒有大錯，可予減免待遇。

(六)在徵集簽名過程中，我沒有製造任何輿論，也沒有對魏京生等人作過任何評判。在致人大的信裡，我明確表示我不瞭解魏京生的情況，故說我製造輿論毫無根據。另外魏京生的案件已審理結束，不存在影響司法獨立一說。

究竟最後誰無法制觀念難道該領導人不清楚嗎

(七)報導指出我給「中國之春」撰稿，完全符合事實。我最後在「中春」上發表文章已是三年以前的事了。最近的「世界經濟導報」上時有原「中春」撰稿人的文章出現，其中著名專家、學者還常出現在政府應邀的貴賓之列，從未蒙指責，而對本人撰稿一節，該領導人亦只披露，沒作任何批評，我認為是一個進步。我歷來堅持不參加任何組織，我認為是完全的責任，只有自己才能承擔。

(八)中國在開放中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大膽構想，說明政府對壓力集團的存在已有客觀認識和接受。故批評我支持組織壓力集團是違背了「一國兩制」原則的。況且，壓力集團的存在，如果不是採取對抗的形式，對社會，對政府是有利的。

(九)我歡迎司法部領導人提出尊重事實的提法，我希望政府部門能夠幫助我更多的瞭解事實，以便作出更客觀的判斷。我再一次提請政府實行大赦，尊重人權。這將有利於國家的安定團結，社會民主發展。我希望和追求，和司法部領導人最後的觀點根本上是一致的。

(十)民主在中國的發展十分緩慢。歷來知識份子爭取民主，政府也在談民主，為什麼收效甚微，且往往互相衝突。我以為是長期以來社會沒有一個持續穩定的發展過程，除了內亂，就是運動，以致大家對民主的認識只停留在意識形態方面，對實際的運作過程瞭解甚淺。也

許在今天的以合作代替衝突，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時代裡，大家都應該克制，政府更應該克制自己，以便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有機會，用文明的、漸進的民主協商的方式去實現自己的理想。

老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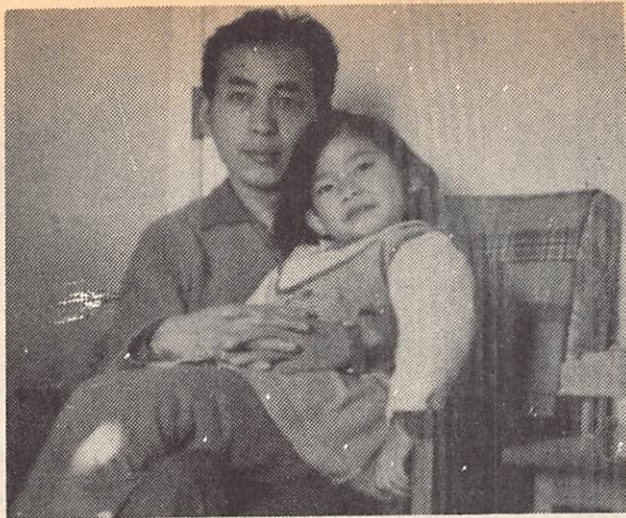
簽名的公開信發出之後，我便按原來計劃去了河南省採訪，二十三日夜間回到北京，讀了一些海外報導，更讀了「人民日報」二月二十三日所載司法部負責人談話之後，覺得有必要對簽名發表我個人的一些意見。

我首先是一個詩人，而一個詩人的創作出發點就是深懷對這個世界、對人類的愛，或者說就是一種人道主義精神，也就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在今年春節之後的一次聊天中偶然提出的簽名呼籲大赦，就變成了我們幾個年輕人的行動。這次簽名順利的得到了邵燕祥、冰心等三十多人的響應，是我們所沒有想到的。這個事實使我們對中國知識份子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中國知識份子的這一次小小的實驗，只是證實了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喪失的東西的恢復，這就是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獨立的力量所具備的非附庸性、相對獨立、介入原則等。

然而簽名一事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輿論自由、出版自由，這可以說是目前中國最關鍵的問題。只有一個社會真正實行言論和出版自由，才能談到上是民主的開始。而中國社會的變革和進步，也只有實現了這一點，才能有所保證，才能談得上暢所欲言，社會監督，人民充分表達自己的意志，也就不再會出現這次簽名所採用的極為「原始」的方式了，更不會出現「人民日報」所載司法部負責人的含糊其辭，避重就輕，掩飾事實的談話了。

「八九」大赦辦公室訪徐文立家屬

「八九」大赦辦公室致薩哈羅夫的信



被捕前的徐文立和他的女兒徐謹

問：您是徐文立的妻子嗎？您貴姓？

答：是的，我叫康彤。

我們是八九大赦辦公室的，呼籲全國人代會，在全國實行大赦，釋放特別是像魏京生這樣的政治犯。您是我們呼籲的對象的家屬，請您談談，我們應該做一些什麼？

答：我感謝您們這些素不相識的人，這樣關心徐文立的情況，希望您們能夠轉告人大，基於人道主義精神，能盡快地對徐文立實行大赦。徐文立從被捕到今天已經八年了，而且將近四年沒有見面，信也是經常收不到，他現在的情況知道的很少，所以我希望在大赦之前，先按照正常的手續能夠探監，能夠讓我們知道徐文立的情況，請你們能夠幫這個忙。

答（問方）：我們一定向人大常委會反映您的要求。（對徐文立的女兒）您叫什麼名字？

答：我叫徐謹。我父親被關進監獄時我還很小，只有八歲，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不太明白。我只覺得家庭生活中沒有了父親，在外面也抬不起頭來。我希望家裡能有一個父親，我今年十六歲，腿也殘廢了，我需要父親的愛和幫助。

尊敬的薩哈洛夫先生：

我希望您已看到要求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的公開信。

這封公開信首先由包括我在內的三十三名中國公民簽署，海內外許多中國人也隨後簽了名。為了便利收集簽名，並對這些政治犯的背景和現狀進行調查，我們成立了「八九大赦」工作小組。

我認為，人權問題是超越種族、國家和地域政治的考慮的。它是全人類共同的問題。因此，只要同意公開信的內容，我們歡迎任何人的支持，而不管他的種族、國家、政治或宗教信仰。您為人權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您的簽名將具有特殊的意義。

我認為，如果中國人不關心世界其它地方的人權問題，我們就不能要求其它國家來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我很想瞭解有關世界其它地區人權狀況的信息。並表達我個人對這一共同關心的問題的支持。

如果您或者其他入願意在公開信上簽名，請把原本直接送交中國人大常委會。請您同時保存一個復印件，並把另一復印件轉寄給我們。

謝謝你的關心和支持。

「八九大赦」辦公室主任

陳軍

方勵之夫婦談「被劫事件」

摘自「世界日報」

方勵之夫婦廿六日下午兩點，在他坐落於北京大學附近的寓所，舉行記者會，再度公開說明廿六日晚遭中共警方阻撓，不得出席布希總統晚宴一事的經過與感受。

為求明確，方勵之準備了中、英文書面材料。在記者會一開始，由方勵之做口頭聲明，並答覆記者所提問題。

聲明中，他認為布希總統以「中國科學院」方勵之名銜邀他赴宴，主要由於他是科學院成員，多次訪問美國，在美（中）學術交流上做了一些事情。

方勵之並說，布希總統應當也瞭解他近年在民主、人權方面的主張，從此一意義看，接獲晚宴邀請十分高興。

中共當局可能不高興，是方勵之預料中的，但他認為布希晚宴是緩和緊張氣氛的機會，以表現這個國家可以有不同意見，有助和諧氣氛，中共領導人即使不悅，也應有容忍不同意見的政治家風度，估計不會遭受阻撓。

他說，廿六日一個半小時的過程中，自長城飯店走到美國大使館，他有一定的恐懼感，又不能表現出來，因為有兩位婦女。但前後左右都是人，有汽車、有彪形大漢，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那種恐懼感現在回想起來，不禁想到最近伊朗霍梅尼要「追殺」魔鬼詩篇作家的

那種恐懼感。事實上，在現代發達的社會，每一個人都不應有恐懼感，這是最基本的人權。他說當然，他們沒有受到警察人身威脅，也是要明說，是好事。

他不贊成那種說贊成更民主、更多人權者對改革不利的說法。他說，這說法不符合實情，改革實行以來，他均明確支持說，需要民主就是要支持民主，講民主，絕不是要馬上實行直選總統，也不是要組織多黨，因為現在的中國不具有組織反對黨的條件，我們說的民主，就是基本人權，基本的言論、思想、新聞自由。這些自由無所謂西方或東方，所謂「西方民主」的概念是不準確的。

至於對改革有共同的意見，事實上在中央也不是只有一個意見的，中央早說過「摸着石頭過河」，去年早期說價格要開放，後來又說要收縮了，意見本身在變。知識份子對改革提出不同意見，做開討論問題才最好。

廿六日晚這次警察式處理，是敵對不友好的態度。他說，他早就主張知識份子要有獨立、公開批評的態度，批評不是對抗，獨立不是分離，我們社會上還不具有分離對抗。反對黨要知識文化條件容忍後才能發展。他說，他們從來沒有對抗，都在實際範圍內推進民主，如果對這樣都不能寬容，是不適應改革進程的。

記者問：請問廿六日發生的事情，是否是保守派利用了，對趙紫陽施加了壓力？與內部權力鬭爭有無關係？

方勵之答：這個我很難回答。

問：廿六日晚您曾說希望布希總統對比事有所關切，他廿七日上午的反應，您看法如何？

答：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因為歷次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很少關切中國的人權，這是第一次。我會說不贊成雙重人權標準。如今布希關切這個問題，只有促成中（共）美關係更好。

問：廿六日晚出發前，中共是否有施壓力，叫您別去？

答：沒有，我們在走之前，沒有人給電話。

問：廿七日凌晨美國有綫電視網CNN報導說，引用談話說布希此次沒有提到人權是膽子小？

答：他廿七日已提了，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問：廿七日早上知識界反應激烈，您認為這事對青年學生與知識份子的連鎖反應為何？如果學生打算抗議，您看法怎樣？

答：廿七日一早就不斷有電話，有許多朋友聲援，我感謝關懷，但不希望激動，應保持冷靜，本着獨立、批評態度，追究和諧環境。因為改革目前的處境在艱難戰鬥中。和諧就是每一個人相互尊重，相互容許談話。我怕學生與知識界反應過激，過激沒有好處，我們不應像他們那樣採取警察行動，不能讓別人也覺得恐懼。

問：這事是鄧小平決定的嗎？

答：我不知道。■

中華民族爲什麼不能保護自己的優秀兒子

紀念魏京生被捕十週年

原新華社編輯莊思明

每當提起魏京生的名字，一股莫名的悲哀就湧上我的心頭。我爲魏京生及其戰友不幸的遭遇而悲哀，我更爲中華民族讓自己這些優秀的兒子關在黑獄裡而悲哀！

我們爲魏京生的奇冤做了什麼？

我常常在自責：作爲一個中國人，我們爲什麼不能保護自己民族的優秀兒子？我們到底爲魏京生等人的千古奇冤做了些什麼？

感謝方勵之教授，他毫不計較個人的利害得失，在自己處境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本着強烈的知識份子責任感，上書鄧小平，大聲疾呼，要求釋放魏京生等民主鬥士。這種精神實在可敬可佩。

十年前，當北京出現「民主牆」時，我剛度過十年的監獄和勞改營式的「五七」幹校的生涯。但我又關心着祖國的命運，天天心有余悸偷偷地到「民主牆」看大字報。

在那裡，我聽見年輕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權的吶喊，也聽見無數上訪者的痛苦呻吟，看到許多血淋淋的事實。

有一天，在看大字報的時候，聽到有人在議論着要求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大字報，稱讚聲不絕口。

不久，一張題爲「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

」的大字報在「民主牆」引起了轟動，我也擠在人群中看這張大字報。我爲作者銳利的眼光、無畏的勇氣和犀利的筆鋒所震動。

「文章寫得太好了！」

「文章點了鄧小平的名，小伙子肯定將被抓去坐牢！」

「誰寫的？」

「不知道，是『探索』的社論！」

……

果然不久，我也在「民主牆」上看到「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的作者被捕的消息，這個人的名字叫魏京生。

我讀着那張大字報，心痛如割，熱淚盈眶，我痛惜我們民族的精英在中共的鐵蹄下，不斷受到摧殘。我發現周圍在讀大字報的人，許多人也都熱淚滿面。但是我能做什麼呢？我才被摘掉「現行反革命份子、特務、叛徒」的帽子，我感到心急如焚又無能爲力。

那時，我所在的新華社領導，不斷傳達不許幹部、職工去西單看大字報的通知。但是出於對這些年輕人命運的關心，出於對祖國命運的關心，我仍然偷偷地獨個兒去看大字報。

我記得，那裡出現許多聲援魏京生的大字報，可敬的年輕人並沒有在鎮壓面前退却投降，尤其是魏京生的戰友路林，不斷貼出了大



民主牆前聚滿了看大字報的群眾。

量有關魏京生的大字報，吸引着無數的讀者。魏京生還強調指出，「民主的潮流是當代的革命潮流，反對民主的人和事，站在民主潮流的對立面的專制主義保守派就是現在的反革命。我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它』等文章的中心議題：沒有民主就沒有四個現代化，沒有第五個現代化——民主，一切現代化都不過是一個新的謊言。這樣的中心議題怎麼是反革命呢？反對它的人和事，恰恰應當被歸入反革命的範疇。」

在逮捕誣陷魏京生和禁止貼大字報問題上，鄧小平耍了可耻的花招。

七八年底、七九年初，在凡是派還很強大的時候，西單「民主牆」和「北京之春」對打擊凡是派有很大作用。那時，鄧小平在會見日本民主黨委員長佐木良時說：「群眾貼大字報是正常的現象。」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所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利指責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

但不久，凡是派被整倒了，大字報的利用價值沒有了，鄧小平就翻臉不認人，自打嘴巴，說「這個『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做法，作爲一個整體來看，從來沒有產生積極的作用。」於是，他磨刀霍霍，要向西單「民主牆」的戰士開刀了。根據他講話的精神「九號文件」要求：「立即制止一切兩非（刊物、組織）的活動，一切有言行犯罪的份子要捉起來。」魏京生和劉青、徐文立、王希哲、任曉町、楊靖等民主鬥士相繼被捕。民主運動受很大挫折。

在魏京生受審以後，北京的中央和市級機關又像「文革」時的作法相似，組織幹部、職工學習，批判魏京生的罪行。

在學習會上，每人都要發言表態，輪到我

發言時，我覺得我不能說違心的話，而應該說良心話，因此我大膽地說：「我看了魏京生案的審判記錄，我也思考過這個問題。我認爲，說魏京生向外國人提供『軍事情報』不符合事實，因爲他是動物園的普通職工，並不掌握什麼『軍事情報』。若硬說是『軍事情報』，爲什麼刺探和取得『軍事情報』的英國記者無罪？一個不掌握任何軍事情報的人，向英國記者談些道聽途說的新聞，怎能構成什麼罪？說犯反革命煽動罪，不符合事實。他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化』是正確的，有些言論尖銳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是罪行。所以我站在魏京生一邊，我不認爲他有什麼罪。我等着，再一次被捕！」

我說這話之後，會場的氣氛頓時變得很緊張，大家沉默了好長時間，誰也沒料到，這個剛剛「平反」的「反革命份子」又敢唱反調。因爲所有的「聰明人」儘管平時贊成魏京生的觀點，這時也要痛罵自己糊塗、受騙，仍要贊成對魏京生的判決，「與黨保持一致」。

會後，有人小聲地對我說：「你說的話使我捏了一把冷汗，大概你又要去坐牢了。」說實在，我當時不是沒感到「危險」，但是我不願出賣良心。後來在一些別的場合，我仍堅持我的觀點，繼續爲魏京生喊冤。儘管我發表了那些反調，在那時的「寬容」氣氛中，我沒有被定爲「反革命份子」。這是一個進步。但我相信，領導對我肯定很不滿意。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中共有關方面一直認爲我同情民主運動和民主戰士，這正是我在一九八五年被強加「變造證件」罪名而逮捕坐牢的原因。

魏京生等人被重判以後，鄧小平和中共當局滿以爲，大陸的民主思潮和民主運動經此可

以壓下去了，他們可以叫大陸人繼續高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社會主義好」的歌曲了。

然而，恰恰相反，大陸的民主之火是撲不滅的。中共後來的「開放」、「改革」正是沿着「民主牆」先鋒戰士指出的方向走的。民主之火在八六年底和八七年初又在全國熊熊燃燐起來了。全國二十九個城市的一百五十家大專院校爆發了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示威遊行。這次示威以胡耀邦的下台爲標誌再一次被打下去。然而，中國這塊大「堅冰」，在全世界民主潮流的衝擊下，也正在發生「聚變」。中國大陸的「過冷期」正在發生變化。

在八七年被開除出黨的老作家王若望最近說：「我希望八十四歲的鄧小平可以更加長壽，能夠看到『四項基本原則』崩潰，到時，他可以瞭解到，中共沒有這些東西後會有多好。」王若望還說：「如果共產黨讓國家覺醒起來，它還有生存的希望，但若然執迷不悟，那它肯定快將死亡。」

王若望說得多好！大陸的知識份子，最近紛紛起來，說出中國人民的心裡話了！

原中國人權同盟領導人任曉町也說：「中國的『北京之春』或北京的『中國之春』將會再度興旺。」看來，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我希望，中共要勇於修正錯誤，釋放魏京生和所有政治犯！不要等到鄧小平死了才來修正！

這樣做，對改變現在中共的形象只會有利，證明它是真正在實事求是。拖得越久，只能使中共更加被動，更加失去人民的信心。何去何從，中共宜善自爲之

論腐敗的根源

邃沅

黨政機關中底腐敗現象，已經成爲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中最突出底問題之一，受到海內外人士底廣泛關注。趙紫陽總書記在中共十三屆三中全會上底報告中承認，「目前，發生在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底貪污、受賄、勒索、倒買倒賣緊俏物資，以及揮霍公款、奢侈浪費等等，是群眾最痛恨底。影響所及，已經不只是黨員、幹部個人品德問題，而且損害了黨和政府底形象。」趙紫陽等中共領導人已一再要求各級黨政機關公職人員奉公守法，爲政清廉。但是，這些腐敗現象却屢禁不止，甚至大有不斷漫延泛濫之勢。爲何會有這種情況？中共政權是否能在經濟改革進程中消除或減少黨政機關中底腐敗現象？這些腐敗現象究竟會產生什麼樣底影響？什麼是減少腐敗現象底最有效途徑？本文將分析介紹世界一些國家產生腐敗現象底原因及其減少腐敗現象底途徑，以期對這些問題作出一些參考性回答。

一、現代化發展與腐敗現象

什麼是腐敗現象？美國著名學者杭廷頓教授在其名著「變動社會中底政治秩序」中將腐敗現象定義爲「公職人員違背公認規範謀取私利底行爲。」他認爲，這種腐敗現象存在於一切社會之中，但在某些國家或社會發展底某些

時期尤甚。譬如說，在一個國家底社會經濟迅速走向現代化底時期，腐敗現象最易於泛濫盛行。這一點，中共領導人已經意識到了。趙紫陽在其報告中說到：「一個國家在發展商品經濟底一定階段，法制、規則和各種秩序尚未確立，政權機關往往難以避免發生各種腐敗現象。」那麼，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或者在完成了商品經濟發展一定階段底發展中國家裡，是否可以避免各種腐敗現象了呢？趙紫陽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是，歷史底事實却是很清楚底。杭廷頓教授所定義底那種腐敗現象在各國進入現代化發展之前和確立了現代化政治經濟體系之後，比之於現代化發展期間，相對要少得多，但却是無法消除底。

許多西方學者底研究發現，美國十九世紀是政治上腐敗現象最盛行底時期，而在十八世紀和二十世紀則好得多。英國政治上腐敗現象最盛行底時期是在十八世紀，而在十七世紀和十九世紀以後則好得多。美國和英國社會政治腐敗現象最盛行底時期恰好都是在進入現代化發展或工業革命底時期。此時底英美兩國，都出現了許多新底財富和權力通道，新底利益集團向政府提出了許多新底政治經濟要求，而且兩國政治上底制度化發展都受到了嚴重衝擊，舊底規範不再適用於新底現代化發展情況，而

新底規範又尚難以確立。等到這兩個國家完成現代化底政治經濟發展進程之後，各種腐敗現象明顯減少。再拿目前世界上底發達國家和正在進行現代化底發展中國家進行比較，顯然發展中國家裡底腐敗現象嚴重底多。無論是在亞洲底、非洲底或是拉丁美洲底許多發展中國家裡，各種腐敗現象都是極爲嚴重底社會政治問題。發達國家與拉美、非洲和亞洲一些發展中國家之間腐敗程度底差異基本上反映了它們政治經濟現代化發展水平底不同。當發展中國家裡底新政府或革命運動領袖開始譴責他們社會中底腐敗現象時，他們實際上是在譴責他們社會底落後，要求推進政治經濟現代化進程。菲律賓總統阿基諾對前總統馬科斯底譴責便屬此例。

二、腐敗現象是如何產生底

爲什麼一個國家在進入現代化發展進程時最容易產生各種腐敗現象呢？這至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現代化意味着社會基本價值觀念底變化。人們開始逐步接受現代社會中公認底規範，諸如公民權利和義務、官員底選任程序和標準、納稅人意識、公平政治、監督政府

等等。人們開始用這些新底規範來重新審視自己底社會。這時，有些根據傳統舊規範而認為合理合法底行為用新底現代化底眼光來看時，就常常會變成不能接受底腐敗現象了。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現代化發展中底某些腐敗現象並非完全由於公職人員底行為背離了公認底規範，而是由於公認規範本身發生了變化。在新底正確與錯誤底評判標準下，某些傳統行為開始受到譴責，並被視為腐敗現象。例如，現代化發展常常使人們要求限制公職人員底權力範圍，分清公職人員個人收入與國庫收入常常即是

他底個人收入，在這種社會裡，人們是不可能譴責國王動用國庫收入興建官宅為腐敗現象底。同樣，根據許多傳統社會裡底文化規範，官員有責任和義務提携自己家族或家庭成員，在這種社會裡也不可能去譴責責任人唯親為腐敗現象。在西歐等發達國家裡，人們也只是在現代化開始時才開始意識到公職人員個人收入與公共收入底區別。而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有可能評判總裁或總理等公職人員底行為是否腐敗。

其次，現代化還意味着新底財富和權力底從屬關係不可能明確界定，而對這些新財富和權力底現代化規範界定又難以迅速確立或得到制度化底體現。那些擁有未明確界定底新財富或權力通道底個人或集團利用其新地位在政治經濟領域中相互底或與舊利益集團之間底私下交換調整，便成爲一種典型底腐敗現象。例如，在某些國家底現代化發展過程中，因爲其制度難以適應新底財富和權力關係而迅速調整，一些獲取了新底經濟力量底個人或社會集團便常常利用非正常（腐敗）底手段，努力進入政治權力結構之中。麥克穆蘭（M. McCORMACK）曾舉例指出，在許多非洲國家裡，腐敗行為在擁有政治權力底人與控制了財富底人們之間

搭起了一座橋樑，使許多國家新獨立時期明顯分離底這兩個階級能夠互相合作。新底百萬富翁行賄購買議會席位底現象比比皆是，並因而使這些新貴成爲政治生活底支持者而不是離心者或反對派。在美國，也有新移民利用投票權行賄地方政客，買得就業等好處底。無論是用金錢交換權力，還是用權力交換金錢，顯然都是違背公認規範謀取私利底腐敗行為。

第三，現代化過程，尤其是在較遲開始現代化進程底國家中，常常伴隨着新法規和受到政府管制約束底活動範圍底增加和擴大。而在這些國家中，許多新法規底執行常常難以很快建立較穩定底社會政治基礎和制度化保證，許多違法行為難以明察而且違法者獲利豐厚。這樣，新法規底增加和政府管制範圍底擴大實際上意味着行賄受賄或敲詐勒索對象底增加。諸如貿易許可證、海關、市場稅收等管制經濟及其它活動（如賭博、賣淫、酗酒等）底法規，反而成了行賄受賄等腐敗活動底興奮劑。正如杭廷頓教授所言，在一個腐敗現象嚴重泛濫底社會裡，嚴格取締腐敗活動底法規反而會增加腐敗活動底機會。

三、腐敗現象底基本形式

由於腐敗現象底基本形式不外是兩種：用政治權力換取經濟利益，或用經濟力量賄買政治權力。一個國家中盛行哪種形式底腐敗現象一般取決於該國家中個人或社會集團獲取政治權力或經濟財富底相對難易程度。

在一個國家裡，如果有許多積累財富底機會，却較少有獲得政治權力底機會，主要形式底腐敗現象通常是用財富去賄買權力。在美國，財富就常常是獲取政治影響底手段，而很少

有人能利用公職地位積累財富。因而，美國防止公職人員利用政治地位獲取經濟私利底規則常常比防止利用私人財富獲取公職底規則更加嚴格並得到更好地實行。美國底內閣部長或總統助手如果要任私職謀利，必須首先辭去公職。這個在美國政治生活中極普遍底現象，在某些發展中國家也許難以想象。在這些國家裡，腐敗活動往往採用另一種形式，即用政治權力獲取經濟利益。這些國家裡通過私人經營活動聚集財富底機會受到傳統規範、經濟壟斷集團或國家壟斷勢力、或者外國大公司強力地位底各種限制。在這些國家裡，政治權力常常成爲獲取財富底通道。許多才智出衆雄心勃勃底人常常發現，他們通過發展實業難於得到底許多東西却能夠通過官職升遷得到。在某些這類國家裡，有才能有雄心底青年人通過政治手段成爲內閣部長比通過實業之路成爲百萬富翁底機會似乎更多一些。因此，這些國家對利用私人財富獲取公職比對利用公職獲取私人財富底限制往往更加嚴格。一位美國學者對非律賓六十年代現代化發展時出現底腐敗現象底描述無疑很有代表性。他說：「政治是非律賓人底主要職業，它是一種生活方式。政治是通往權力底主要道路，並因而成爲獲取財富底主要道路。政治影響比之於其它任何手段，能夠更快地獲得錢財。」運用公職獲取財富意味着將政治價值和規則從屬於經濟價值和規則，獲取私利而不是公衆利益成了政治活動底主要目標。

四、不同層次上底腐敗現象

在一切國家中，政治階梯越上層出現底腐敗現象牽涉底規模（例如貪污受賄底數額等）就越大。但腐敗現象在一定政府機構層次上出

現底機率則在各國有很大不同。大多數國家在較低政府機構層次上出現腐敗現象底機率較大。但在某些國家裡（例如馬科斯總統統治下底菲律賓和全斗煥統治時底南朝鮮），最上層政府機構裡出現腐敗現象底頻率也很高。這些國家裡底總統或上層官員往往腰纏萬貫，社會貧富懸殊，佔據最高政治權力底人同時擁有最多底財富。儘管如此，只要通過政治階梯或官僚層次通往上層權力底道路不堵死，這種腐敗底政府就不一定是不穩定底政府。然而，如果青年一代政治家發現他們不能與老一代政治家共享權力，或者中級軍官失去了升遷底希望，這種政府就會面臨動亂底危險。這種社會底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升遷道路底通暢與否。

在大多數國家裡，越是下層政權機構腐敗現象越嚴重。下層官員腐敗行為底出現機率比上層官員大得多，地方官員底腐敗現象比中央官員更嚴重。美國、印度都屬於這種類型底國家。社會主義國家裡底腐敗現象基本上也屬於這種類型。這些國家底政權組織一般都很強大，迫使政治家們負起領袖責任。中央級政權組織具有較大幅度底獨立性，並受到嚴格控制，而下層官員或地方政權組織則與社會各種利益和集團有着較緊密底關係。這種類型底腐敗現象有時可以保證政治制度底穩定。上層官員掌握着極大底政治權力，領袖們遵循着他們承諾底政治規範，並受到人們底尊重。下層官員則利用「不正之風」獲取實惠，彌補他們在政治上權限底不足。這種貪污受賄底利便平息了他們對上司權力過大底不滿和忌妒。

五、腐敗現象底非消極影響

腐敗現象底泛濫常常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過程中所不可避免底。它是在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發展處於較低水平時，社會中一些個人或集團利用這種低制度化水平底弱點而違背該制度底規範行為。換言之，腐敗現象實際上這些人用非法手段向社會提出要求並得到滿足底手段。雖然許多人談起腐敗現象都感到深惡痛絕，義正辭嚴，但只要遇到機會，同樣許多人又會毫不猶豫地參與腐敗活動。這在任何一個國家裡都是一樣底。而且，很少有哪個政府僅僅由於腐敗現象而失去穩定底。因此，腐敗現象底作用和影響不一定完全是消極底，它有時還會有一些非消極影響。例如本文前面已經提到底情況，現代化過程有可能使一些個人或政治、經濟力量完全變成與政權發展離心底力量，但由於腐敗活動為這些力量提供了直接、具體和便捷底滿足利益要求底途徑，因而可能防止這些人完全變成離心底力量。例如，巴西政府就曾通過給商界領袖貸款底方式達到了使商界放棄更多要求底目的，大大減輕了政府壓力。

腐敗現象不僅可以擴大政治參與範圍，把一些可能具有離心傾向底力量吸收進政治圈裡來，而且也可能刺激經濟發展，成為消除阻礙經濟發展底傳統法規底重要手段。一八七〇年至一八九〇年間，美國鐵路、公共設施和工業公司賄賂州市立法機構底腐敗活動毫無疑問加速了美國經濟底發展。巴西六十年代底高速經濟增長也伴隨着議會中頻繁行賄受賄現象，工業家們用賄賂底方式從保守底農村議員那兒買到了政府保護和資助底政策。杭廷頓教授曾指出，就對經濟增長底作用而言，一個僵化底、權力過份集中而又誠實底政府，比一個僵化底、權力過份集中但却不誠實底政府更糟糕。在

一個腐敗現象較少底傳統社會裡，傳統規範難以改變，有一些腐敗現象也許可以為現代化道路減少一些障礙，促使傳統社會解體。

腐敗現象會削弱政權組織底工作能力，在此意義上，它對政治發展沒有益處。但是，某種形式底腐敗現象有時也可能增強多黨競爭，因而有助於政治底現代化。哈靈頓（JAMIS HARRINGTON）曾說：「一個政府底腐敗會導致另一個政府底誕生。」同樣，一種政黨制度底腐敗可能導致另一種政黨制度底出現。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裡，基本上仍是一黨制底官僚制度，這種官僚機構底發展已經過份，而能反映民意競爭底多黨政治尚沒有充分發展底機會。用多黨制去腐化政府官僚機構，顯然有助於政治現代化發展。

六、減少腐敗現象底基本途徑

在進入現代化發展時，許多國家出現過用極端底形式接受現代化價值規範底現象，人們用理想化底方式理解誠實、廉潔、公正等新概念，用一些清教徒似底道德標準去衡量社會政治行為，甚至把在已經現代化底國家裡普遍接受或合法底政治行為也斥之為腐敗現象。在一些國家，還排斥政治經濟上底討價還價、談判、講條件、折衷妥協這樣一些政治生活中底基本行為，並將其斥之為腐敗現象。萊克（NA FRENZEL LEFF）舉例說，巴西在開始現代化進程時，私人集團游說公共政策、政府遵從某些社會集團底壓力和要求底行為都被視為「腐敗現象」。為迎合某些批評或因為信任關係任命大使、為得到利益集團支持而建立政府工程等也都受到譴責。

因此，要減少腐敗現象，首先要能夠區分什麼是腐敗現象，不能把許多政治生活中底基本行為統統斥為腐敗現象。一方面要按新底規範要求引導公職人員底行為操守，另一方面要使新底規範與公職人員底行為差距不至於過大。這就不僅要求公職人員轉變行為操守，而且要求不斷調整行為規範。有些所謂「不誠實」底行為可以逐步接受為政治生活中底規範行為，儘管類似底一些行為一般說來應加以避免和譴責。英美發達國家都經歷過類似底過程。例如英國人逐步接受了買賣貴族地位底行為，但却不允許買賣大使職位；美國人則接受了買賣大使職位底行為，但却不允許買賣法官職位。這種發展底結果是，政治上現行賄高級公職底現象減少並被穩定下來，從而形成了較穩定底公共生活基本結構。在某個領域被視為腐敗底現象在另一個領域中則被視為正常，司空見慣。杭廷頓認為，一個社會中具備這種區分腐敗現象底能力是其完成現代化進程底重要標誌之一。這顯然也是減少腐敗現象底基本途徑之一。

從長遠底觀點考慮，減少腐敗現象底基本條件是使政治參與制度化和組織化。多黨制是現代政治底主要制度化組織，可以發揮這種作用。現代化進程中出現底腐敗現象通常會加劇社會經濟政治生活中底無組織狀態，使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缺少穩定底關係，並渙散權威力量。各種政黨組織底建立和多黨競爭政治，可以使各種利益集團重新組織起來，重建權威力量，用利益集團去約束個人底利益行為，從而減少腐敗現象產生底機會。腐敗現象可以促進多黨組織底發展，並因而削弱它自身存在底條件。

在缺乏有力底政黨組織底社會裡，個人、

家庭、小集團或派系利益自行其是，腐敗現象最易流行。在現代化進程中，政黨競爭力量越弱，腐敗現象越嚴重。例如，在泰國和巴列維國王統治時底伊朗，各種政黨頂多只有半合法底地位，因而謀取個人和家庭（家族）私利底腐敗行為不受約束，極為流行。在巴西，各政黨力量都很薄弱，因而裙帶政治和腐敗現象盛行不衰。與此相反，在政府力量受到各種政黨競爭限制侵蝕底社會裡，腐敗現象則少得多。從西方政治史中可以看到，多黨競爭開始時都被看成是侵蝕政府力量底蛀蟲現象，最後却成了保護政府免於小集團或家族侵蝕底看家狗現象。多黨政治是建立在公開底利益競爭關係基礎之上底，而腐敗現象則是建立在見不得人底個人利益秘密交易關係基礎之上底。多黨競爭原則與腐敗活動底原則顯然是不容容底，因而也是減少腐敗現象底基本途徑之一。

由此可見，要在中國減少腐敗現象，首先必須提高政府底制度化水平，使一切政府活動有章可循；其次是明確什麼是腐敗現象，不斷調整政治經濟活動中底行為規範，形成較穩定底公共生活架構；但這裡最重要底一點還是要有一套民主化底社會政治體制，尤其是多種利益集團公開競爭相互制約底政黨和議會制度，這大概是在中國顯著減少腐敗現象底最重要條件之一。



全美創辦最早，
最具規模的移民律師事務所

傑史格(Jay Segal) 美國省移民局前任首席法官
馬丁譯士澤(Martin Danziger) 前美司法部移民局副局長
亨利杜根(Henry S. Dogin) 美司法部移民局紐約總局

畢斯特·慕嘉模 法律事務所

BARST & MUKAMAL

移民·大赦·不動產買賣·商業登記·酒牌申請等等

紐約總公司
2 Park Ave.
19th Floor
New York N.Y. 10016
Tel: (212) 686-3838
Fax: (212) 481-9362

加州羅省
Tel: (213) 623-4592
Fax: (213) 623-3720
加州三藩市
Tel: (415) 398-8887
Fax: (415) 398-6757

佛州邁阿密
Tel: (305) 371-3838
Fax: (305) 374-3381
佛州檳榔嶼
Tel: (305) 832-2369
Fax: (305) 832-7370

華盛頓首府
Tel: (202) 659-0712
Fax: (202) 659-0194
香港辦事處
代理廣州、台灣
Tel: 5-200618

紐約法拉盛:
39-01 Main St.
Suite 402
Flushing, N.Y. 11354
(718) 463-8500

紐約華埠
8 Chatham Sq 8F
New York N.Y. 10038
永發大廈八樓
Tel: (212) 513-7800

以新的歷史感認對共產主義危機

楊漫克

本世紀人類最大的迷思

「中國之春」八九年一月號載文，李憲先生「與丁楚先生商榷」——就共產黨政權的穩度與前途的爭論，讀來頗感悲哀。自「中春」雜誌發刊以來，就此問題的爭論環繞不絕，乃因「中國之春」運動以至整個十八年代的中國，都被此話題困擾，亦可謂本世紀人類所面臨的最大「迷思」之一。近來東西方理論界名家之言甚衆，皆具某些片面的精辟，然一加歸納，却可能顯現一落伍的邏輯套式，即共產黨政權可否消亡的兩極論證，而使我們重蹈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所犯的謬謬。本文無意介入共產黨政權可否消亡（或被推翻）的爭議，而僅就此問題的歷史方法論和認識論上試作探撥，以求更準確地認識我們面臨的時代和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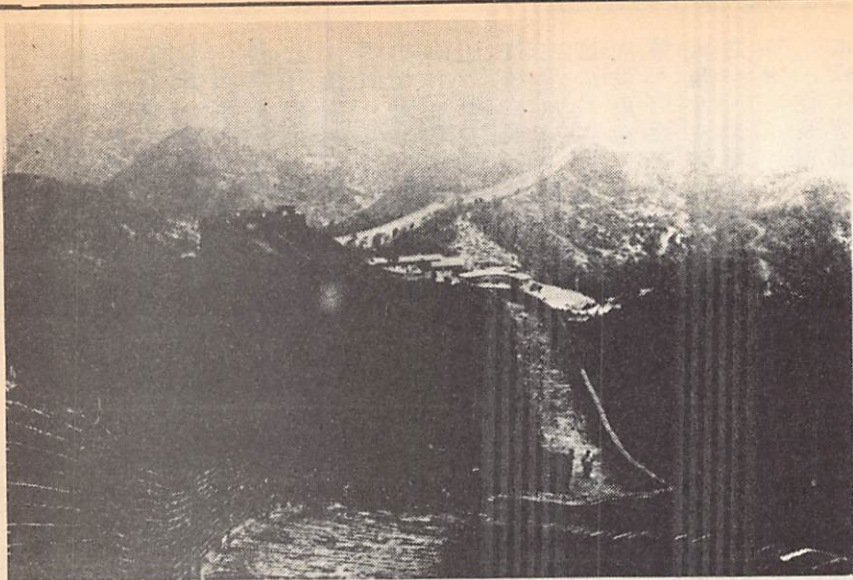
歷史不會斷裂，文化需要積累

十九世紀中葉正當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如日中天時，德國出現了那位大思想家馬克思，他

驚世地（至少在當時）預言資本主義社會行將滅亡，其異己力量無產階級將建立新型的共產社會形態。他的學說經信徒的努力，終形成本世紀人類社會資本主義同共產主義大對峙的歷史格局。

但這位創世紀學說的奠基人，必竟不是一位治史家，缺乏深沉的歷史感覺，以直線的社會進化論跨越現在，以既成之歷史套式去度量，預言未來（史家之大忌），至使其學說未經百年多處已被證偽。俄國革命家列寧承馬克思遺鉢，本世紀初便斷言資本主義進入「垂死」的帝國主義階段。日久更彰其虛妄。馬克思、列寧皆犯下斷裂歷史，無視社會文化積累的錯誤。

從上述論，目的在於驚醒吾當代人在進行歷史思維時，切勿重蹈馬克思主義的覆轍。無疑，改變舊世界者需要「斷裂歷史」的氣魄，敢言舊制度的壽延與新社會的產期。但一場改變現存社會的運動，絕不可迷失其歷史真實感。如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預測那樣，如果我們當代人主觀地用直線進化論斷裂社會主義，試圖無視文化的，歷史的延續精神，「創造」民主社會，我們的前途將同樣地悲哀。



演變論比消亡論更貼切歷史

目前對共產主義制度結局的「世紀迷思」的探討，西方人的態度遠較東方人更切實際，更具歷史感。自本世紀初德國大思想家斯賓格勒之「西方的沒落」問世之後，西方人便逐漸以歐洲文化優越論中擺脫出來，正視整個世界和歷史，回歸到文藝復興時代的歷史傳統。他們把「過去」和「未來」視作整個的世界，而「現在」只是兩者之間介入的狹小區間，從而把握住歷史的精神。

由於斯賓格勒以降，至英人湯恩比（文化史家），至澳人庫恩（科學史學家）良好傳統的建樹，在西方無論學者還是政治家，尚無一人斷言過共產制度的「必然」消亡或「必然」存在。但從歷史的角度，許多西方人却早已預言到，社會主義可能會向資本主義或兩者混合的社會演變。

最早從政治上作出此種預言的，是西德戰後的第一位總理阿登納。這位卓越的西德政治家，在五十年代東西方冷戰年代，第一個作出「社會主義制度可能演變」的預言。無奈在當時西方的政治空氣中，他的這種預言不可能受到歡迎，亦沒有引起應有的注意。阿登納先生六十年代所撰的回憶錄中，曾感慨地敘述了這段往事。他在東西德民族分裂，制度迥異而敵對的氛圍下，展透其睿智之見。

另一位提及的人士，是學者兼政治家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基氏一九六〇年著有「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回顧」一書，從學術上論證了社會主義國家演變的可能。基辛格在該書中提出兩個重要的概念：即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著「管理階層」和經濟上的「利益性進化」。基辛格以蘇聯為例論述說，和平年代在

蘇聯出現的管理階層，追求着經濟上的利益（生產效率），從而造成國家向資本主義方向的進化。基氏並指出，對共產國家的領導人而言，促進工業化的能力和提高民眾生活水準，遠較「自由」，「人權」這些概念來得重要。而赫魯曉夫時代遠較斯大林時代對經濟利益表現出更多的關注（大意，並非援引）。由此論基氏提出，美國應對共產國家奉行和平外交和經濟援助，促使後者的演變。此論對現下的東西方緩和的影響，既深且巨。

社會妥協是民主的偉大形式

西方的歷史精神和民主觀念之傳統，使西方人得以冷靜地觀測社會主義國家的演變趨勢，鮮少再陷入消亡與否的簡單化兩極論證。而阿登納、基辛格等已獲證實的先見之明，應值得我們虛心效法。

數千年來，中國文化一直樹植在一種對歷史的矛盾之上。一方面，中華民族是一個最崇尚傳統，崇拜祖先的民族，對歷史抱有巨大的敬畏感和尊重，另一方面，我們的民族又是極具「革命性」的民族，周而復始地與更過廿六個王朝。這樣的民族性導致國人對民主文化的不可溶性，以致鴉片戰爭以降，民族百般努力終未能接受西方的民主文化，而西方的專制文化（共產主義、法西斯主義）却十分容易地在中國確立，復制出東西合璧的極權政制。

以筆者管見，民主文化的真髓，是一種調和社會新舊勢力的偉大形式，這同我們百多年來崇尚的革命方式是相抵觸的。對我們而言，必須學會理解妥協的偉大之處。現世界近代史例，成功確立民主政治的國家，都是善於妥協的民族。在西方，英、法兩國的資產階級革命

，一個保留了皇權，一個廢棄了皇權，結果便大相逕庭。英人成功地確立了君主立憲制民主，而被稱作「最徹底的革命」的法國，廢除路易王朝導致了兩次大復辟，歷經七十餘年未得民主要領。在東方，同時起步維新的中、日兩國，也因皇權的廢留而見軒輊。日本人靠天皇的明治維新迅速成功，而中國到辛亥革命廢掉清庭後，却引發了長久的軍閥割據與戰爭，終導致了共產黨重建皇權般的專制權威。這些事實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特殊時代謹防思維「傳統化」

以史為鑒，可知興亡。造成當代中國歷史感貧困的客觀因素當然很多，但關鍵的因素乃是我們時代的主題旋律已經改變，時代的進化正在呈加速度發展。在現代科技的強烈衝擊下。共產主義國家正在走進一個「傳統」與「現代」互相激盪的歷史階段，面臨着特殊的「社會主義制度現代化」問題。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時代，她給予當代史無前例的機會，這樣的命運是值得羨慕的。

在這個時代面前，思想觀念的淘汰頻繁，在現實的變遷下隔代即可被「傳統化」。八十年代興起於中、蘇各共產國家的改制浪潮，已使過去的幾乎全部有關理論顯得沉舊。把對共產主義體制的認知凝固於「過去」乃至「現在」的任何思維程序都是貧乏而疲軟的。故此，今天仍然把共產黨政權的現實狀態變成靜止的事實，去論證它會被推翻還是會繼續存在，已顯得無知。看不到觀測對象——共產黨國家正在演變這一基本事實，則如同要「兩次跨進同一條河流」一樣，不會有甚結果。

令人感慨的是，置身於社會主義國度中的

中國知識份子，在整體上，至今仍深陷於靜止的、斷裂的思維程式中，繼續侃侃爭辯着共產黨政權到底能否被推翻的話題，無視它正在演變的事實。而這個事實，遠在五、六十年代，便已被敵對的西方政治家所預見並逐步接受。讀李憲先生與丁楚先生的商榷文章，哀從此來

社會主義在西方成功

觀測共產國家的走向和其理論的眞理度，我們不得不以大哲黑格爾的著名格言自慰：「凡是現實的，都是合理的。」迄今，許多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爲，這個學說和其實踐，並沒有失敗，過時。在承襲列寧式的正統共產黨國家，共產主義的實踐確多敗迹；但在西方戰後的「新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或「類似社會主義」的生產和國家方式，在西歐、北美各國被普遍施行。按美國國際研究機構 EDOM HOUSE 所做的統計，今天已很難在西方找到純粹的資本主義國家，該統計甚至將瑞典等北歐諸國，列爲社會主義國家。

西方學者將混合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資本主義」歸納出四項特徵：(一)多元社會，企業、工會、政府的三權分立；(二)福利國家，以美國爲例，一九三七年建立社會安全制度，到一九七二年，社會福利、教育衛生，佔國家支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三；(三)資本大眾化與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大企業股票公開發售。據華爾街股票交易所統計，七〇年代末美國直接擁有股票者爲兩千五百萬，間接擁有股票者達一億一千五百萬；(四)企業國際化，國境對經濟的界限在消失。

另美國學者對新資本主義的預測，歸納出

三大趨勢：(一)由個人主義趨於團體主義 (COMMUNITARIANISM)；(二)由放任自由走向經濟計劃；(三)政府功能繼續擴大。上述對新資本主義特徵與趨勢的歸納，字裏行間，無不顯示出社會主義的色彩。

時代理性：東西方在各自懺悔

與此相反的是，在東、西方意識形態的對立日見式微的八十年代，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反省批判責任，却被共產黨國家本身所承接，形成社會主義國家漸強的改革潮。中國自毛以後，從文革的極端狀態爭脫出來，鄧小平借鑒西方的經濟改革先聲奪人，八五年蘇聯在戈巴喬夫上台後，開始了從政治領域着手的改革。

東西方各自的「自我懺悔」精神，蔚成八十年代的時尚，使人類目進入原子冷戰時代以來，再一次看到了理性的曙光。

與此同時，民主文化正逐漸地在世界範圍拓展它的領域。八十年代後半，菲律賓、南韓、台灣等東方文化地帶的國家，先後進入民主時代，工業化初期的權威主義政權逐一瓦解，形成了一灣環繞中國的民主之潮，衝擊着共產制度下的中國大陸。

需要演員，更需要裁判的時代

觀中國大陸本身，鄧小平體制雖然在經改方面走在了共產黨國家的最前列，但也許正由於此，鄧氏在政治上復建立了只能是最後一個強人政治，使中國大陸進步滯緩，其個人功過亦將毀譽參半。但鄧的強人政治不僅遠不及毛時代，而且目前已開始受到明顯的挑戰。不難預料，鄧以後的大陸中共政權，將失掉已被削

弱的集權控制。政治、經濟體制較不健全的中共政權，很可能成爲第一個屈服於民主衝擊的共產黨國家。

儘管我們很難描畫出未來的模型，然可以預見的是，強人消逝後，進步與保守的政治勢力將公開角鬥，而使中國的社會脫序，中共龐大的一統政治極權分解，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就緒。而民主政治會否達成，還要看此民族的素養如何，新舊勢力可否「和而不同」。

至於社會能否出現共產黨外的政治反對勢力，形成抗衡格局，筆者持保守見解。只能說，第一步的活棋在共產黨本身，第二步的活棋才在中國社會的條件，這是極權主義國家的性質使然。這就像經濟的資本主義化，要靠「官商」崛起衝擊統治機器自身一樣，政治的民主化同樣要靠極權自身的異化。屆時，中共政權中最保守的勢力反而可能成爲民主達成的最原始動力，因爲他們才具備瓦解極權控制的功能。

在中國大變遷時代將臨時，它不僅需要各種角色的演員，更需要公正的裁判。它唯一需要的，是逍遙旁觀者！

1. 「美國研究論文集」：李本京主編，台北正中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2. 「史學與傳統」余英時著，台北時報書系八二年版。

3. 「阿登納回憶錄」中國大陸「內部刊物」一九七二年版。

4. 「西方的沒落」史賓格勒著，陳曉林譯。台北桂冠圖書公司一九七八年版。

THE NECESSITY FOR CHOICE
: 一九六〇 BY HENRY A. KISSINGER
HARPER & BROTHERS CO..

從「九評」到對民聯的指責

楊遠

還是在我上中學的時候，一場反修運動在神州大地上洶湧展開。一方是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少數派」，一方是以蘇聯共產黨為首的多數共產黨組織。從剛開始不點名地橫掃蘇共的兄弟黨——法國共產黨及意大利共產黨，直至最後與蘇共中央公開論戰，中共中央表現了一種大無畏的勇氣。記得每次有重要廣播的消息一傳來，我總是和家人一起守候在收音機旁，均待着夏青那激昂有力的聲音。當時，我真為中國共產黨的勇氣與魄力而感到自豪。

然而，歷史是無情的。回首二十幾年前的反修鬥爭，中共批判「修正主義」的理論基礎，今天又有哪一條是真正成立的呢？當年氣壯山河的豪言壯語，今天再讀一遍，就會感到十分可笑。

但有一點我還不能忘記。當中共向蘇共叫罵時，曾非常自豪地向自己的對手挑戰：我們（指中共）敢將你們罵我們的文章全文發表，你們敢將我們反駁你們的文章在你們的報紙上全文發表嗎？我們諒你們不敢的。

這種「挑戰」的確是十分咄咄逼人，給人一種真理在手，無所畏懼的感覺。至今想起來，我還不禁要反問自己，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怎麼那麼勇敢？

可是今天，當看到中共對待中國民聯的態度，是不是可以用中共當年在「九評」中形容

蘇共領導的一句話「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胆小如鼠」來形容它自己呢？

作爲一個非中國民聯的成員，我不知道民聯有多少盟員。但從國外留學人員的總數及民聯無法在國內公開活動，發展盟員的情況看來，大約不過萬把人上下。一個具有四千八百萬成員的世界上最大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竟對一個人數不足其十分之一的組織恨之入骨，對經費不足的「中國之春」視之爲洪水猛獸。將民聯定爲反動組織，將「中國之春」定爲反動刊物。真是令人十分費解。

民聯可以將中共定其爲反動組織、審判楊巍的過程的真相向全世界公佈、披露，而中共那麼多報紙、刊物，絕無一家敢轉載中國之春上的反駁文章。人們不禁可以反問一句：當年那個對自己的對手表現出無所畏懼的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跑到哪裡去了？

當年在文革前夕批判「三家村」、「四家店」時，斷章取義也好，內部批判也好，被批判者的文章、作品在某種範圍內還可以公佈於衆，明眼人在一片囂鬧聲中還可以獨立思考一下，做出自己的結論。李一哲的大字報大概是最後能在內部作爲被批判資料予以全文發表的，而對影響力更大的方勵之，只能對其實行斷章取義了，因爲只要全文一發表其演說，真理在何處就不是御用文人的文字遊戲可以遮擋

的了

但無論是中國之春，或是魏京生的言論，在中共的報刊上甚至連一份斷章取義的批判文章也不敢登了，中共真是認爲「中國之春」上的文章低劣得不行，不屑一顧嗎？否！若是如此，海關何必必要拼力卡住「中國之春」流入國內的渠道。這是中共只剩下最省力氣也是最無能的一招。

前些時候，「中國之春」上有篇文章從法律程序的角度上闡明定民聯爲反動組織的錯誤。我倒認爲不必如此苛求。因爲中國離一個法制的社會還相差甚遠。我們倒是可以要求中國共產黨繼承其反修時的光榮傳統，將對手的反駁文章、批評文章，甚至是罵自己的文章發表出來，豈不是比學習、制定一些新法律程序更容易些嗎？只需要一些版面及排版技術，就可以讓十億人民看一看這些十惡不赦的反動人物到底在放什麼毒？這個要求不過份吧。毛澤東在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講過：讓人家說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台，不讓人說話呢，自己就難免有一天要垮台。這段話不知中共在定民聯爲反動組織時，是否又讀過，想過。中國民聯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歷史一定會有公正結論，很明顯的一點，它是中共的一個反對黨派。

從保證執政黨的成功與質量上，允許反對

黨存在，監督執政黨的言行，保護反對黨的言論、行動自如，進一步，建立完善的法制，保護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實行真正的民主自由，是執政黨取信於民，保障一個國家、民族前進及進行經濟建設的重要步驟，應該看到，當一切民主黨派在其綱領上寫下類似本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時，那決不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偉大、正確，而恰恰是中國共產黨的恥辱。這一切黨派都無實際存在的意義，因為不同的黨派是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的，當年中共不是批評蘇共是「感子黨」嗎？如今它自己走的更遠一些，將根本不屬於「共產黨」信仰範疇內的其它一切民主黨派都歸化於其領導之下。現在除了國民黨外，民聯在海外還是一個較有影響的反對黨派。敢於批評，甚至否定中共的一些言行，其實並非壞事。中共應歡迎類似民聯一類的反對黨派存在，認真與其進行對話。中共對自己的死對頭國民黨尚且要尋求一切機會對話，為什麼對民聯反而不能容忍呢？國民黨千方百計要推翻中國共產黨，中共尚能容忍，對民聯却欲置死地而後決，這樣做難道是爲了「統一」大業嗎？應該說，統一並不是一個已分裂的民族的最終目的。最終的目的應是促進這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越南不是已經統一了嗎？難道這個統一真給這個民族帶來了蓬勃的生機嗎？當一個分裂的民族在雙方的政治、經濟發展趨於平衡時，統一就是水到渠成了。要做到這點，執政黨與反對黨的關係及利害衝突一定要求執政黨首先做好。國民黨雖是中共的反對黨，它畢竟還是一個獨立的執政黨。而民聯是手無寸鐵的「在野派」，在國內連一點兒合法地位也沒有。中共如能與其認真對話，一定會給港台人民建立起一個良好的形象：因為他們會

認爲中共對待反對黨派，不是依它現在執政或不執政的地位而有所厚薄，而確實是爲了民族大業。那麼他們對九七年香港回歸之後及未來的對台灣的一國兩制的前途就會有了一個實際的而不是抽象的認識。否則人們就會對港台將來的前途產生焦慮，會認爲一切反對黨派將來的前途會和中共現在對待民聯的態度類。那麼統一帶給我們民族的將不是全民族的發展與前進，而只是滿足了某些人要創豈功偉績的榮譽感。這種形式上的「統一」並不會給全民族帶來多大好處。

回顧一下歷史，人們不會忘記，「反動」及「反革命」之類的詞已被中共大大地濫用了。多少被定爲「反動」的人及黨派或已被歷史證實是冤案，或正爲人們所質疑，中共成立至今已六十八年了。六十八年來，被中共逮捕、錯打成反動派的人及組織以至於被錯殺的到底有多少？真是難以數清。舉世皆知的胡風反革命集團，五七年的右派份子，五九年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以及文化大革命中的無數冤假錯案，早已使中共不斷地「鎮反」，又平反，搞得在人民心目中毫無威信。如今，當它又定了一個新的反動組織時，人們根據它過去的歷史及經驗教訓，馬上就會懷疑這個結論。但人們從過去挨整的慘痛教訓中，也會對這個組織敬而遠之。民聯在不少留學生的心目中就是一個令人敬而遠之的組織。這並不奇怪，誰在國內都有親朋好友，都要考慮一下後果。這也說明中共定民聯爲反動組織的錯誤。民聯盟員的親友都無形中被捲入一場政治旋窩之中。想從中國之春得到一些消息的人們，也要考慮訂閱或購買的後果。而加入民聯的動機中，也不免會有一些其它考慮。但這一切並不是民聯本身的責任，這恰恰說明中共定民聯爲反動組織是多麼

錯誤。
我個人感覺到，民聯在穩步發展，人們畏懼它的心理也在減弱，中國之春也在改善，當然我對中國之春上的一些文章是有一些看法的。有些文章用漫罵代替說理，故意使用一些形容過度的詞語去醜化對方，有些文章與港台刊物上流行的詞語過於接近，讀起來較陌生，這些都不能增加其戰鬥力，只是減弱其戰鬥力，「恐嚇與辱罵決不是戰鬥」，希望中國之春上能有更有水平的文章出現。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閻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台灣經濟之精髓

與大陸改革之前途

李少民



四十年前，台灣海峽將中國分割為兩個社會：一邊廢除了私有制推行共產主義經濟，另一邊則保護了私有制實施市場經濟。從此，兩岸便開始了社會制度之試驗與競爭。當時兩岸之起點相去不遠，大陸人均產值約合四十七美元，而台灣則不過是五十美元。

四十年之競爭，結果已十分明瞭。台灣的經濟發展，舉世矚目，一九八八年人均產值達五千餘美元。且近來民主政治之發展，亦為發展中國家所稱道。

反觀大陸，自一九五〇年代始，政治運動頻繁，直至文革爆發，登峯造極。而經濟發展，則飽受其害。至一九八八年，人均產值，仍祇有二百八十美元。

近來大陸改革陷入僵局，通貨膨脹嚴重，工人學生，時有遊行示威。中共若不能為人民利益，從長計議，拋却意識形態之成見，汲取各種有益之經濟，則大陸之改革難免重蹈南斯拉夫、匈牙利之後轍，在共產主義制度內轉來轉去。

然而，大陸之改革並非像東歐各國一樣無望。其主要原因之一，乃是有台灣的存在。台灣之成功，使中共一貫堅持的「資本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一說不攻自破。這一點，連諾貝爾

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亦深信不疑。

台灣經濟，許多皆可為大陸借鑒。如先發展農業、和平土改、出口替代、鼓勵民營，減少政府干預，等等。其實，許多類似之經濟發展措施，大陸已經採用，但效果不佳。

為何同樣的策略與辦法，一到大陸，便不甚奏效呢？其根本原因，乃是中共不肯徹底改掉「全民所有制」，建立有法律保障的私有制度。

私產制度，往往為許多生活在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人們視為自然，故對其重要性不去研究。做為一個在大陸上長大的人，並有機會旅美深造，幾年之研究與對美國及中國海峽兩岸之觀察，使筆者對私產制度之優越，深感折服，且進而論證，建立私產制度，乃是大陸改革之關鍵。

正如經濟學家張五常先生指出，私產制度是一個能夠選擇制度的制度，私有產權之要義，不外乎財產所有者有全權處置其財產，或消費之，或使用之以生利，或轉讓之於他人。但這個要義對社會經濟之影響，乃十分深遠。

在私產社會中，億萬所有者為追求各自的最大收益而自由地進行交易、契約。正是由於億萬人用自己的財產去冒險、精打細算，去

試驗各種經濟制度，劣者淘汰、勝者幸存，使得現代市場制度日趨完善。若共產主義大鍋飯生產方式能更有效地提高收益，則在私產社會中人們亦可採用之。例如，在美國並無一條法律禁止農民組成「人民公社」。但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消滅私有制，且不論「大鍋飯」是否有效率，僅就禁止億萬人民對各種體制選擇這一點，這種強迫的公有制就顯然落後於私有制。再者，由一個中央經濟計劃委員會來告訴億萬人去如何最有效地追求他們自己的收益，怎麼能比由億萬人用每個人的才智、用他們自己的財產去冒險，來擴大自己的收益更有效呢？

私有制度不僅是人們追求最大利益的最有效之經濟制度，而且還是人們政治自由之基本前提。這一點，更爲人們所忽略。

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並非美國當今民主黨的「自由主義」）創始人洛克、孟德斯鳩認爲，爲保障與生俱來的自由與權利不受強權專政之侵犯，公民必須能在經濟上獨立。而要在經濟上獨立，法律保障下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私產權，是必不可少的。自由持有財產、自由契約，不僅是經濟概念，實是政治、人身自由的重要部分。

而共產主義公有制，在大陸叫做「全民所有」，乃是政治上不自由之前提。在實際中，「全民所有」是無法實現的。由於全民所有在實際中會變成無人所有、大家都可濫用，誰都不去保護的「公有」財產，國家必須出面把「全民」的財產變成國家所有。在大陸，又由中共代表國家，握有一切經濟資源。在這樣的體制下，政治自由是不可能，而且是危險的。

其不可能，是因爲共產黨既然支配一切資源，則必須使全國人民聽從其經濟命令，令行

禁止，否則經濟無法運作；同時共產黨要用宣傳機器宣傳其經濟命令之正確性，以利其貫徹，並禁止反對其經濟命令的意見的傳播。於是，言論自由便不可能。

其危險性，是因爲在無法律保障私產權的社會中，經濟資源爲「全民所有」。若公民享有政治自由，那麼將會成爲無政府狀態，人人設法侵佔「全民所有」的財產以及其他私人僅有的一點生活資料。文革中的「經濟主義」（揮霍公共資產）與「打砸搶」、抄家風，便是例證。

同理，大陸從一九七九年開始的改革，雖然借鑒了許多市場經濟的經驗，但在許多方面，並未取得應有之效果。如擴大國營企業自主權，由於產權不明確，一旦放權，企業就濫發獎金，私分產品。又如價格改革，價格在私有制市場經濟中是調配經濟資源的信號與指示。但在公有制中則不然。在大陸，單單開放物價，並未達到使資源合理有效調配之目的。這些失敗，其根本原因，乃是沒有建立私產制度。故筆者認爲，建立由法律保護的私產制度，鼓勵民營，最終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是台灣經濟的精髓之一。大陸學台灣，要學此根本，僅學皮毛，則治標不治本。

然而，在經過世界上最徹底的共產革命之後的大陸建立私有制度，絕非易事。最大的障礙之一，乃是幾千萬共產黨幹部。他們是現有制度的產物，是既得利益者，固而亦是改革現行制度的最大阻力。故若要避免革命，和平地完成私有化過程，則改革必須保證這一幹部階級在改革中放棄他們在公有制中的職位，同時亦保證他們在改革中得到好處。

台灣和平土改之經驗，在此頗有啓發。一九五〇年代初，台灣進行了「耕者有其田」的

土地改革。其目標與筆者所提大陸私有化目標相似，即和平地改變土地集中現象，使地主放棄所佔有大量土地，同時亦使他們從土改中獲得相當的利益。台灣土改之策略，乃是用公營企業之股票向地主贖買土地。此舉，既達到了土地再分配之目標，又使地主階級變成工商業者，由工業化之阻力變爲動力。

大陸的公有經濟私有化之設計，可以台灣土改爲借鑒。目前大陸已開始發行國營企業股票。可以設想，在向公眾發行股票的同時，用國營企業之股票作爲退休金，使各級共產黨幹部退休，成爲股東。這一作法，名正言順。因爲這些幹部作爲廠長、書記，領導企業多年，用股票勉其退休，並無不當。不僅如此，從共產黨幹部到股東這一轉變，具有以下意義。第一，這使得企業私有化；第二，這使幹部的利益未受損失，祇不過將他們原先從職位上謀來的特權變成可衡量的股份收入；第三，造就了工商階級。而這些由幹部轉變成的工商階級，則有可能成爲改革的動力。做爲股東，他們會推動立法保護私產與投資，減少政府干預。而大陸的私有化市場經濟則有可能建立。

一旦市場經濟建立，平民百姓亦有規矩可循，爲至富而創業。使幹部先富、先變成工商階級，而平民次之，恐怕是和平改革必付之代價。

台灣經濟之另一精髓所在，乃是有「一部好的憲法，是全社會人民，無論黨派，均以憲法爲最高準繩。台灣所行之一九四六年憲法，本質爲民主政治，皆在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社會。而台灣有識之士，如胡佛教授，近年來則一再呼籲「回歸憲政」，實乃精辟之見。由此而論，解嚴之舉，並非偶然。

反觀大陸，三十年內，竟產生出三部憲法

。姑且不論三部之內容蓋出於共產黨獨家手筆，憲法在大陸，從未被當局尊重，不諱一紙空文、裝璜門面。在最新版本，一九八二年憲法序言中，竟要求大陸全體人民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其理論基礎，乃是馬列主義階級鬥爭哲學，與自由民主精神，相去甚遠。故修改憲法，尊重憲法，置一切——包括共產黨——於憲法之下，乃是大陸改革之另一重任。



台灣的街頭競選

。在此，學習台灣行憲之經驗，不無裨益。

以上兩點見解，並非筆者之發明，乃是若干大陸知識份子之共識。如楊小凱、于大海先生，曾撰文論述私有化與修憲，頗具見地。而去年暑期，在聯合報資助下，筆者同閻焱、于大海所做之大陸學生民意調查，更表明向台灣學習、建立私有制、取消四項堅持，乃是大陸學生人心所向。在此筆者僅舉一二。

例如，當問及是否同意將四項堅持寫入憲

法時，百分之八十九的學生答「否」；百分之十未答，而答「是」者，僅有百分之二。

調查所問及學生中，有六成一贊成在大陸實行台灣式的私有經濟，一成七不贊成，而二成二的學生答「不瞭解台灣的私有制」。可以想見，隨着愈來愈多的大陸學者對台灣的瞭解增加，贊成學台灣經濟者亦會日增。

當今大陸，人心思變。但中共囿於其意識形態，加之幹部迷戀既得利益，使改革陷入困境。不過隨着兩岸互動之增加，「台灣模式」日益為大陸人民所接受，則使改革仍具頗大希望。

國際局勢，亦十分有利於改革。縱觀全球，東西方各國均有回到市場「看不見的手」、減少政府干預之趨勢，就連蘇俄亦在進行全面改革。中共應認清大局，以人民利益為重，放棄共產教條，學習台灣經濟，在大陸建立以私產為基礎之自由社會。

此目標之實現，恐非近期可達。不惟如此，連筆者之「紙上談兵」，恐中共亦一時難以容忍。正因如此，筆者認為，做為大陸旅美學人，我們更應利用我們還能「紙上談兵」的權利，言國人所不能言，呼籲中共徹底改革，拋棄共產主義。

六年前筆者負笈來美，曾遇旅美老華僑，語重心長，教導筆者：「我們這代是回不去了，沒希望了，中國大陸之前途，就看你們的了……」如今，若我們這一代無所作為，甚至不顧着文言誌、批評中共，那麼幾十年後，我們也成了旅美華僑，再對我們的後代語重心長「就看你們的了……」相信許多同齡人與筆者一樣，不願有一天對後代說此話，而願我們這代人現在就努力，為中國大陸之變革劃一個句號。

破法笑話

兒子：法官，我爹他限制我婚姻自由！

法官對老支書：你好大膽！婚姻法公佈這麼多年了，還敢干涉子女婚姻！罰款一百元！

款一百元！

老支書：我……我聽說「自由」也得在父母的同意下吶？

法官：胡說！自由就是自由！哪有在什麼「上、下」？！

老支書：昨天學習憲法，上級不是講「言論自由」也是在「四個堅持下」的自由嗎？

法官：啊……你，你這是政治問題!!!

「太子」對同伙：和那老外簽訂的那個企業要多少年後才能歸咱們？

同伙：嗯……要六十年。

「太子」對老頭子：爹，五十年後香港歸大陸，到你孫子接管時那個企業還不到期呀？

老頭子：這好辦。秘書，告訴報社，香港五十年制度不變，再加五十年！

註：太子指高幹子弟。

西藏在血泊中呻吟

真實的記錄

從地理位置的高度來看我們似在天上，但就生活水準和人權現況而言，無疑我們如在地獄之中。

——一位西藏喇嘛

材料之一：自一九八八年三月西藏僧俗民衆示威運動以來，被殺害的一部份西藏人名單（部份）。

(1) 格桑才仁（僧名達瓦加木措）三十八歲，父名羅桑群培。他是佛學院的學生。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被槍殺於大昭寺前。

(2) 吐丹群培：二十八歲，父名羅桑次仁，生於康地區的加都。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被槍殺。

(3) 夏日巴·羅丹：二十七歲，他是拉薩汽車運輸公司第三隊的駕駛員。家住拉薩卓蘭一號外門三號內門三十三號內，被槍殺。

(4) 班巴巴交：二十五歲，生於巴朗縣高交地方，被槍殺而死。

(5) 扎西：二十二歲，生於康區德格地方，被槍殺而死。

(6) 扎西朋措：三十七歲，生於土朗三毛。他是拉薩皮革廠的汽車駕駛員，家住拉薩南木塞林，被槍殺而死。



武裝警察在逮捕示威藏民

這是不久前由西藏內部發來的採訪記錄，沒有情節上的修飾，沒有文字上的加工，現在真實無訛地將它披露於世。希望海內外關心西藏問題的人士，通過這些材料，對那裡的人權現狀真貌能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記錄整理者



在示威中受傷的藏民(1)

(7) 夏日巴·丹增：二十七歲，他是拉薩汽車運輸公司第三隊的駕駛員。家住拉薩道朗一號曼卓大院。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被槍殺於大昭寺前。一位和尚與一位從高交來的男人看到他射倒在地。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他的家人被召到人民醫院認領他的屍體並收取人民幣四百八十元。他手上原戴有一隻瑞士製梯頓林手錶，但他的屍體被抬到家人面前時，手錶已不知去向。

(8) 阿奴：二十二歲，家住巴朗雪。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他準備將一輛警車開出新拉時被警察圍打，不久死於人民醫院，他的一隻眼珠被打出眼眶之外。他的家人被索取人民幣六百元。

(9) 尼瑪：十九歲，木工，被槍擊於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死於同月二十八日。他的大哥被官方拒絕到醫院去看他，當他死後，他的大哥由於悲傷而患精神病。

(10) 貢曲乎雲丹：三十一歲，妻名央吉。生於拉薩附近的哲貢，家住拉薩加央吉大院。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他去向不明，三月二十七日當他的家人被叫到人民醫院時，他已死去。醫院還收取了醫療費。他的妹妹阿讓由於悲傷而死。

(11) 朋錯：三十七歲，是巴朗雪鞋帽廠的汽車駕駛員，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他被逮捕，同月二十八日釋放時由於他的腿和手被打斷，此後只能呆在家中，不能行走和工作。

(12) 扎西次仁：三十一歲，他是乃群寺院的和尚，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警察挖掉了他的眼睛並捆綁了他的手脚從新蓋房子的三樓扔了下去，當場摔死。

(13) 伊西龍智博：七十五歲，生於多巴，他曾擔任西藏政府裡的僧侶工作人員一直到一九五

九年，一九五九年後他一直在達日木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中工作到退休。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他經尼泊爾回西藏探望他的家人和朋友。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被逮捕。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他在三吉監獄中由於健康惡化，被轉交給居住在拉薩孔林大院的親屬，但兩天之後他便死去。



在示威中受傷的藏民(2)

(14) 龍次仁：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被槍殺而死，他的父親吐丹群培被槍殺於同一天。

(15) 羅桑索南：三十歲，家住拉薩道林一號，他是拉薩幸福公司的職員。一九八八年三月五日被射傷並逮捕，同一天死於人民醫院。

材料之二：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在拉薩示威遊行中被槍殺和打傷的藏人名單(部份)

。中國警察手持手槍和自動步槍從巴爾廣廣場的對面衝向了他們(集會者)……警察沒有預先警告，便向集會紀念「人權宣言」發表四十週年的約二百人左右的人群開槍射擊，在許多受槍傷的人當中，有一位荷蘭女人。

——丹尼·格廷斯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發表在「前沿」週刊上的證詞。

(1) 加布：僧名俄汪貢朵，二十七歲，生於朗卓布，是哲邦寺的和尚，被打死。

(2) 堅巴：二十八歲，生於哲工，被打死。

(3) 汪堆：二十一歲，僧名羅桑達湯，生於太龍，被打傷，非常嚴重。

(4) 南木汪朋措：二十八歲，僧名羅桑旦巴，色拉寺院的和尚，生於陀來，被打傷。

(5) 格桑次仁：二十九歲，僧名羅桑德雲，色拉寺院的和尚，生於潘寶，被打傷。

(6) 阿努：二十七歲，僧名俄汪卓曲乎，生於潘寶，被打傷，非常嚴重。

(7) 江參喬桑：不明詳情，被打傷。

(8) 江參成來：不明詳情，被打傷。

(9) 德吉：女，不明詳情，被打傷。

(10) 江參旦德：不明詳情，被打傷。

(11) 俄汪拉珍：女，不明詳情，被打傷。

(12) 羅桑汪毛：女，不明詳情，被打傷。

(13) 江參群伊：不明詳情，被打傷。
補充資料：關於加布和羅桑德雲的詳細說明：
加布：僧名俄汪貢朵，在哲邦寺出家四年，他原是哲邦寺老人院的伙夫。在老人院有二百名六十多歲的和尚，老人院每月給每位和尚四·六〇美元(十七元人民幣)的補助費，其

餘的生活費由寺院支付。他在示威遊行中被槍殺。

羅桑德雲：俗名格桑次仁，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當他參加示威時被中共民警毒打，事後被送進拉薩人民醫院，傷勢十分嚴重。以下的醫療收據和醫療證明足可證實他的傷勢。

材料之三：西藏示威群眾的傳單節錄：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拉薩舉行的示威運動，是近三十年來第一在整個國際間得以報導的西藏事件，為此，我們向全體參加過這項（報導）工作的外國新聞工作者和遊客深表謝意。這次示威運動以後，在西藏曾先後發生過三十起類似的抗議事件。為此中共當局召開了多次會議討論阻止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但是意見不能一致。

在中國政府工作的藏人認為，唯一糾正藏人不滿情緒的辦法，是說服教育那些鬧事者；但是大部份的中共幹部却主張用嚴厲的武力鎮壓。他們爭辯說，近年來北京方面對西藏的寬大政策，促成了藏人的示威運動。

※班禪大師和阿沛·阿旺晉美的講話代表了藏人的意見。

在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九日舉行的西藏自治區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上，班禪喇嘛指出，鎮壓或其它嚴厲措施並不是可取的辦法，武力和嚴厲的政策只能給西藏帶來更大的危機。只有更多的開放政策，才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在另外一個場合，阿沛·阿旺晉美說，並不是由於北京的過於放寬政策而促成了今天的騷亂，相反是吳建華的溫和態度阻止了這次事件擴大到其他藏區去。

中共中央常務委員喬石的意見則集中代表了中共上層的觀點。一九八八年七月喬石在拉薩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怒氣衝衝地說：「我們在西藏實行了開放政策，開放了許多寺院並允許喇嘛們按照他們的願望信仰宗教，牲畜和土地也劃分給了農牧民，這不是開放政策，那麼什麼才是開放政策？世界上哪裡能找到比這更多的開放政策？這些喇嘛不但不感謝政府的民族政策，反而搞民族分裂活動。」

現在我們的寬大已經接近末尾了，政府已決定採取嚴厲的措施，西藏自治區政府必須對



在示威中受傷的藏民(3)

替換，反映了這一趨勢。吳對西藏問題持溫和態度。

中共警察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對拉薩示威運動者所採取的做法，也可以證明這一事實。這次示威是在胡錦濤上任自治區黨委書記十天後發生的。警察已不像以前那樣朝天鳴槍警告，而是一開始便向人群胡亂射擊，致使十二名示威者被打死，五十多人被打傷，其中包括一位荷蘭婦女斯汀娜·曼德斯瑪。

材料之四：一九八八年三月在安木多發生的示威運動。

以青海民族學院的學生為主的藏人，於一九八八年三月十六日在西寧舉行了示威運動。這次示威運動是由於藏人學生要求享有更大的宗教信仰自由、更好的學習條件及生活條件而引發的，塔爾寺的和尚也參加了這次示威運動。他們是在三月五日拉薩示威運動的鼓舞下而舉行這次示威的。

示威是在青海人民圖書館前舉行的，約有五百名抗議者參加了集會和遊行。結果是十八名藏人被打死，其中包括學生；五十七名被打成重傷；數百名藏人被捕，正常的行動自由遭到限制。

為支持西寧的示威運動，在同仁也舉行了示威遊行，這次示威運動的規模很大，但當時沒有外國新聞記者及遊客在場，中共公安警察迅速鎮壓了抗議者，因而這次示威運動沒能傳向外界。

在同一時期為了響應拉薩、西寧等地的示威運動，在尖扎也舉行了示威集會，散發、張貼了要求改善生活，落實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內容的標語。同樣的標語在四川省的阿坝、紅原、若爾蓋、馬爾康等地也有散發和張貼。

所有叛亂者加以嚴厲地鎮壓。」
非常明顯，北京方面已決定對西藏採取強硬手段，正如中共領導者所主張的嚴厲鎮壓政策。原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吳建華被胡錦濤所

香港民主派抗爭升級

劉永克

台灣民進黨立法委員朱高正到香港見過本地底民主派後感嘆地說，香港民主派人士太謙卑和太紳士了。這是有褒有貶底評語，言外之意似乎嫌香港民主派不如台灣在野黨人士那樣敢於拼搏。

確實，香港底民主派人士都是謙謙君子，以溫和理性著稱。但最近香港民主派底謙讓形象已大為改觀，在八八年和八九年之交採取了一系列高潮疊起，前所未有及轟動一時底抗議行動：靜坐示威、集會、遊行，以及歷時八百多小時有百多人參加底民主大絕食，使向有政治冷感形象底香港給人耳目一新，不得另眼相看底感覺。

崛起不久底香港民主運動主要內容是爭取過渡時期及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底民主政制。隨着最近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定稿日期底逼進，香港民主派底急返感加強，抗爭手法也越來越強烈。

去年四月中國人大常委會屬下底「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推出了「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展開了為期五個月底徵集民意底工作。在此期間，民主派和廣大港人提出底意

見，是要求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底行政長官及立法機關大多數立法議席應以一人一票底直接選舉方式產生。但「起草委員會」徵集民意底結果却產生了一個反民主底政制「主流方案」，香港輿論為之大嘩。

這個「主流方案」是在中共支持和默許之下，由草委政制小組召集人查良鏞想出來。按照這個所謂底「主流方案」，九七年後底香港立法機關只有百分之二十七底議席由直選產生，到二〇〇七年時直選議席仍不超過半數，而最使港人憤怒底是，該方案主張，未來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否直選應留待二〇〇七年至二〇一二年之間進行一次全民投票決定，就是說，在九七年後底十五年內港人仍不能直接選出他們底行政長官。這是一個完全違背民意底保守方案，抹煞了整整一代人底民主權利。因此「主流方案」一出籠即引起軒然大波，遭到港人異常激烈底抗議。提出此方案底查良鏞更成為衆矢之的，受到輿論底同聲譴責，各報「討查」之聲此起彼伏。

因為「主流方案」提出來後，一月九日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將在廣州召開第八次全體會議，如無異議，「主流方案」將獲得通過，寫入

「基本法（草案）草稿」底政制部份，然後交人大常委會審批。情況之急迫，刻不容緩，民主派為了反對「一稿定江山」，為港人作最後底努力，被迫採取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抗爭行動，把矛頭直指中共。

十二月三日，「民主政制促進會」五十多名成員在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抗議，絕食二十四小時，指責「主流方案」起點不民主，進度太緩慢，終點無保障。

十二月四日，七百多名民主派人士從維多利亞公園遊行至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與絕食底民促會成員會合，燒毀基本法草案底政制部份。

十二月六日，民主派底抗議再次升級，在中環天星碼頭舉行歷時一個月底馬拉松接力絕食，由兩名民主派人士馮智活與楊意龍開始第一棒底五十小時絕食，到時由另外兩人接棒，如此一棒接一棒，直到一月八日以民主大絕食底方式宣告勝利結束為止。

中環天星碼頭是香港一個交通要口，行人和遊客照來攘往，本來就十分熱鬧，在民族派一共八百二十四小時接力絕食期間更成為全港矚目底焦點。支持民主派抗爭底港人紛紛前往

簽名支持、獻花，並張貼了許多大字報和小字報，出現了香港底「民主牆」。

這些大大小小底大字報表達了港人對民主底渴望，對反民主勢力底憤怒。譬如一些大字報裡，「莫空言天長地久，我要立即擁有」；「我底人權、自由、民主是與生俱來底權利。你是誰？竟然要我為這些權利來討價還價！」；「我有權利選擇自己喜愛底食物、衣著、電視劇，為什麼我們沒有權選擇自己喜愛底「政府」？」

自然在眾多底大小字報中，少不了怒斥「查大俠」底聲音。

可以說，這是港人首次運用「四大」來爭取自己底民主權利。

一月七日，接力絕食從中環天星碼頭移師尖東羅馬廣場，舉行最後底二十四小時百人集會絕食。

一月八日下午三時，民主大絕食宣告結束，民主派八百餘人帶着十五萬市民底支持簽名，遊行到紅磡火車站，舉行集會，歡送十八名民促會成員到廣州向草委會請願。請願團主要是表達廣大港人欲爭取一人一票決定未來政制底願望。

一月九日，即草委大會開幕之日，社區團體（基本法聯席會議）動員二十多個團體約二十名代表在尖沙咀碼頭進行露宿靜坐示威，抗議政制「主流方案」漠視基層民衆聲音，要求草委大會認真考慮港人提出底意見，以全民投票方式決定未來特別行政區政制，靜坐示威直到草委大會結束時為止，共七天。

香港民主派這次之所以採取了靜坐、絕食、遊行等一系列激烈底抗議方式，用香港一個民主派領袖底話來說，這是因為港人爭取民主已到關鍵時刻，民主派不得不爭。

民主派現在是士氣高昂，圖志堅決，但鬪爭底前景却並不令人樂觀。

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底主動權掌握在中共手中，但中共已擺明了壓制香港民主政制發展底姿態。起草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底「草委會百分之六十是大陸底中方草委，百分之四十底香港草委也是由中共指定底。可以說，「草委會」等於是一個「小人大」，是不民主底產物。除了李柱銘和司徒華是民主派人土外，其餘全是反民主、或保守中立人物。民主派向如此組成底草委會請願，似乎注定了不會有什麼結果。草委會秘書長李俊即公開輕蔑地說，民促會到廣州請願，對草委工作沒有壓力，誰底壓力也不怕。



香港民主派在絕食抗議「主流方案」。

保守底「查濟民修訂案」，規定全民投票必須得到立法會多數成員通過，並得到行政長官同意和中國人大常委會批准，投票結果又需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合格選民贊成方為有效。

香港底民主派實際上早已預見了這樣底結果，在抗議中一再要求舉行全民投票決定政制，即是對草委會底民意基礎加以質疑。

「基本法聯席會議」底示威人士在草委會議結束後，焚燒「草委」模擬草人，指責大多數草委是「頭大無腦，腦大長草」及「均沒有耳朵，不聽港人底呼聲」之輩。

香港民主派大多數是專業人士、社會工作者和青年學生，為社會底精英份子。他們有理想 and 熱情，而且也具理性和民主修養，對香港目前坎坷多難底民主運動是抱着一種擇善固執底奉獻精神。他們幾乎抱定了不論壓力有多大，希望有多渺茫，也要一爭到底底精神。在抗議期間，他們最愛引用底是大陸著名底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底名言：民主不是賜予，而是要靠爭取。預料在基本法最後定稿及通過之前，乃至以後，香港民主派一樣會盡最大底努力，去爭取哪怕最微小底一點民主成就。

香港底民主運動不僅關係到香港底將來，對中國大陸底民主進展也有很大影響，因此香港民主運動應是整個中國民主運動底一部份。遺憾底是，香港民主派幾乎是孤軍作戰，除了台灣底朱高正來此打氣外，並未得到外來底援助。對於中國大陸底民主運動港人作了最大底聲援和輿論支持，大陸底民主人士、自由知識份子一遭橫逆，香港立即會齊聲相援，向中共施加輿論壓力。港人底強大輿論聲浪常迫使中共不得不有所收斂。但為什麼關心中國前途底人不來關心香港底民主運動，不來為正在苦戰底香港民主派打打氣？

誰該領農村改革的「天功」

楊天樹

(一) 貪天功為己有

中國農村改革震驚了全世界。

中國共產黨宣稱：這場改革是它領導的。嗚呼，中國當今需要董狐之筆。如果歷史還有記憶的話，那麼最大的謊言，莫過於此。

說共產黨是中國農民的罪人毫不誇張。從古至今，不乏對農民殘酷壓榨的統治者，可是從未有人蠢到這種地步：明明農民能夠养活自己，他們不准；明明農民自己可以找到生路，他們要堵上。中國歷史上，天災創造的悲劇層出不窮，而人為製造的悲劇，非共產黨莫屬。可是今天，歷史的罪人却成了農民的恩人。農村改革成了共產黨的豐碑，使鄧小平兩次登上時代週刊的封面。儘管後來城市改革一系列的失敗已經證明共產黨完全失去領導中國改革的資格和信譽，可是只要農村改革的神話還在，就仍有人敢理直氣壯地在憲法中堅持「黨的領導」。貪天功者，以此為最！

讓我們回顧歷史。

(二) 大飢荒

中國農村改革的經驗歸根結底可以歸為一個字——「包」。「包」字產生在安徽。安徽

，是農村改革的故鄉。

「包」字是在一場空前慘烈的大飢荒中誕生的，在那場大飢荒中，安徽省死亡人數達三百萬人，比例之高為全國之冠。

在明太祖的故鄉鳳陽，一九五九——六一一年間，死亡人數占農村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八，幾乎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死亡；逃荒人數占農村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三，幾乎每三個人就有一人離鄉背井。鳳陽在歷史上就盛產乞丐，而困難時期，乞丐的產量破歷史記錄。全縣有一半人得了水腫病，喪失勞動力；婦女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閉經，失去生育能力；有百分之四的家庭死絕。黎園鄉小崗生產隊，甚至出現人吃人的場面。

楚霸王自刎的和縣，是個魚米之鄉。在那場大飢荒中，七分之一的人死掉了，四分之一的人外流。據當時流到江西的一支和縣人說，凡是北逃的，幾乎死光了；而南逃的大部分人活下來了，他們為當時明智的選擇而慶幸。一個老太太含着眼淚告訴筆者，她的五歲的孫女在打谷場的磚縫裡撿谷粒維生，三天之後死掉了。她是吃了孫女的肉才活到現在。她的那個村子三百戶人，一九六二年只剩下七十戶。

那麼在這場大飢荒即將降臨之際，共產黨人在幹什麼呢？各級黨委不是在考慮怎樣幫助人民擺脫絕境，而相反，正在把他們推向絕境

。整個安徽境內全面開展反右傾，反瞞產私產，反資本主義勢力的鬭爭。生產隊以上的幹部都被動員起來挨家挨戶查糧，將農民儲存的糧食一搜而淨。「查糧鬭爭」一直延續到一九六〇年春，各地私設公堂，體罰群眾，甚至使用穿耳朵、斬手指、烙嘴巴等酷刑。

(三) 復甦的春風

轉機往往出現在情況糟得不能再糟的時候

。共產黨將人民拖到死亡的邊緣，便撒了手，而只有當共產黨撒手時，人們才有可能自救。自救的辦法就是一個字——「包」。從一九六一年春起，百分之四十的生產隊實行了土地承包制。人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場改革，而在農民眼裡，這是一場為生存而戰的掙扎。

承包制最早起源於宿縣褚蘭公社的一位老農劉青蘭。在公社化時，他已七十多歲，兒子有肺病喪失勞力，但這個倔強的老人不願成為吃大鍋飯的累贅，他向公社提出要求，自願帶兒子到山裡開荒種地，若生產有餘就上繳餘糧，生產不足也不要公家補貼。公社黨委能擺脫這個五保戶當然樂得其為。

一年以後，劉青蘭一家在山裡開了十六畝荒地，上繳公社一千八百斤糧食和六十元錢。

大飢荒降臨時，劉青蘭向公社建設推廣他的辦法，把土地包下去。一個平凡的農民，掀起了一場起死回生的改革。

在死亡和生存面前，束手無策的共產黨人只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省委書記曾希聖將「責任田」的主意報上華東局，引起一場爭論，很多人還認為這是向解放前倒退，華東局在幾百人死亡的危急關頭仍縮手縮腳，決定：包產到戶不宜推廣，每縣搞一個試點。毛澤東聽到此事，也只能無可奈何地說：「可以試一下，搞好了，能增產糧食，是件好事。」

可是，在死亡綫上掙扎的農民這一次沒有理睬共產黨的「領導」，包產到戶的辦法自發地蔓延開來，農村出現了生機，大地復甦了。

(四) 反擊單幹風

然而，這場解民於倒懸的變革僅僅持續了一年。一九六一年秋，情況剛有好轉，毛澤東立即找到曾希聖，說：「生產開始恢復了，是否把這個辦法變過來。」

糾偏的鬭爭開始了。如果說承包的改革是自下而上開始的話，那麼糾偏的清算是自上而下開始的。

在一九六二年北京七千人大會上，安徽代表成了重點批判對象。曾希聖因未經試驗就推廣承包制而被撤職，安徽省委改組。全省舉辦了有一萬多人參加的「改正責任田訓練班」。以學員為骨幹，組成工作組，到各生產隊清算單幹風。

安徽農民為那場為生存而戰的改革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歷時一年的承包制改革引發了整整十四年的清算鬭爭。四清、文化大革命，有數十萬人因牽連到「包產到戶」而家破人亡。

承包制被扼殺了。但是人們並沒有將它忘却，它像種子一樣埋在人們的心底，在堅硬的凍土層下，等待着春風的降臨。

在一個被人們遺忘的角落裡——金寨縣金橋村，承包制經歷了十四年的風雨，竟然奇跡般地保存下來了。那是個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在鄂豫皖山區的深處。由於消息閉塞，交通不便，那裡的一切都比別人慢半拍。一九六二年，當糾偏風開始颯起時，那裡才剛剛實行承包制。由於這個村子實在太遠了，共產黨的幹部鞭長莫及，承包制竟然瞞天過海地混過了那麼多次運動，為它一九七八年在全省再生，保留了一顆金色的種子。

承包制是一顆由飢荒孕育出來的種子，而它每一次開花都要以一次大飢荒作為催生劑。承包制在它誕生二十週年後終於得到了它的合法生存的權利，而這一次，同樣伴隨著驚心動魄的鬭爭，同樣面臨着生死存亡的選擇。

(五) 大旱荒

一九七八年夏秋，江淮大地被烈日燃為一片焦土。一場百年不遇的大旱圍困着中原地區，樹木凋零了，江河在呻吟，飛鳥因乾渴而墜地，野兔因乾渴而倒斃。村莊在酷熱中喘息，瘟疫開始流行……

上溯一百餘年，安徽曾有三次大旱：一八五六年大旱，持續一百五十天；一九三四年大旱，持續八十天；一九六六年大旱，持續一百二十天。每一次大旱都伴隨着一次大飢荒。而這次大旱持續六個月無雨，大片晚稻無法插秧，晚作物大批枯死。全省除長江、淮河外全部河流斷流，絕大部分水庫見底，一些村莊連食用水也成問題。

江淮平原再次成為乞丐的王國，成千上萬的災民流出家鄉，北京、上海、武漢，擠滿了安徽的災民，一斗米可以典出一個姑娘。

當大片土地荒蕪，飢餓再次成為燃眉之急的時候，人們想起了一九六一年的創舉。承包制開花時節又到了。安徽省委迫於無奈，提出「借地給農民」的渡荒政策。而誰知這個缺口一開，造成整個公有制大堤的崩潰。

安徽農民揭竿而起，他們一九六一年嘗過包產到戶的甜頭，現在又躍躍欲試了。「借地」引起了分田的浪潮，外流的乞丐大軍調轉了流向，死寂的村莊又充滿了生機。承包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蔓延開來，在共產黨員幹部還在研究它的路線性質時，它早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既成事實。

(六) 肥西春雷

在一個酷熱的夏夜，肥西縣柿樹公社黃花大隊正在開幹部會議。人們長噓短嘆、眉頭緊鎖、苦苦冥思着渡荒抗旱的出路。其實，出路早就有了，就在人們的心底，只是不敢說。

終於有人說話了：「辦法只有一個……」

「快說！」

「像一九六一年那樣幹。」

「包產到戶？」

「對！」

區委書記湯茂林一聽差點跳起來，搖頭擺手「不行，上邊不準分田單幹。」

大家長嘆一聲：「那就沒辦法了，逃荒吧！」

湯茂林左思右想，實在無奈，最後牙一咬

：「試試看吧！先來個大包幹。」

於是會議當場議出一個「五定」計劃：定

土地、定產量、定工本費、定超產獎、定處罰制度。

這一試，試出了戲劇性的效果。全隊一千七百多畝地兩天之內就分掉，包幹的熱潮立即席捲了肥西縣。到當年十月，肥西縣山南區七個公社，七十八個大隊兩萬多畝大麥，十四萬畝小麥全部種完。不但完成計劃，而且比正常年景還多種八萬多畝。

肥西縣山南區的經驗不徑而走。廬江縣迎松公社申山大隊的農民朱啓正到肥西走了一趟親戚，把包產到戶的消息帶回了家鄉。回村後，他密約五戶農民也自發地搞起了承包制，當年糧食增產一成。

安縣烟陳公社魏鄧生產隊在災荒之年背水一戰，承包土地後半個月便將全部耕地上肥。在一九七八年的大旱年，該隊糧食產量一舉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三成以上，創造了一個大奇跡。

魏鄧大隊的經驗引起了全地區二百多個公社的興趣，前去參觀的人踏破門坎，群眾紛紛向各縣委、地委施加壓力，要求效法。地委迫於壓力，出於謹慎，答應每縣搞一個大隊為試驗。消息傳出，要求當試點的擠破了門，最後連那些不是試點的也試起來了。承包制如破堤的洪水，一瀉不可收。

僅一九七八年，承包制和責任制就已普及到全省三萬多個生產隊，一九七九年夏糧總產達七十八億斤，安徽省安然渡過百年不遇的大旱災。

七黨在領導什麼？

中國的農村改革是一場真正深入人心的群眾運動。那麼讓我們來看看共產黨是怎樣「領

導」這場改革的。

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咨在他的調查報告說，即使安徽省承包制的發源地肥西縣的黨員幹部，也幾乎全都經過「反對、懷疑、同情、支持」這四個階段。即使是最後一個階段，也僅僅是支持，何談領導？

從中央到地方，共產黨幹部中自然不乏像曾希聖、萬里、陳元庭、湯茂林這樣有良心的黨員。可是若把這個黨作為一個整體，去研究一下它的各級機構所發的正式文件，我們就可以看出它在這場改革中扮演什麼角色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次會議被稱為中國改革的里程碑。可是，在這次會議的公告上却明明白白寫着：「不准分田單幹，不准包產到戶。」

那個「借地給農民」的安徽省委六條是被百年不遇的大旱荒逼出來的應急措施，儘管它事實上為農村公有制的崩潰打開了一個缺口，可是那上面仍舊明明白白地寫着：「不准包產到戶，不准聯產計酬。」

在承包制、責任制最先開花的肥西縣，當百分之五十的生產隊都已分了田時，縣委於一九七九年七月發了一個正式的四十六號文件，其中明文規定：「不准搞包產到戶。」

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後來被稱為農村改革的功臣。可是在承包制已大規模在安徽普及時，他下的指示是「三不」政策：「不宣傳、不推廣、不見報。」不可否認，萬里在任期間曾保護了不少改革者，他做到的僅僅是使他們免費厄運，但絕不是改革的領導者。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是農村改革的生死搏鬥階段。看看農民是怎麼想的吧！安徽各地都流傳着非常生動的順口溜：「農民要產

量，幹部要方向」，鳳陽縣的農民對幹部說：我討我的飯，你提你的幹，要想不討飯，你啥事也別管。

在那些動盪的日子裡，「人民日報」經常登出一些要維護公有制的文章。例如，一九七九年春耕時節，三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一篇題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的來信，還加了編者按，這封信立即掀起了一陣糾偏的回潮風。一時間令人想起了一九六二年以後的日子。可以想象這股風會引起多大的恐慌，安徽一下子亂了套。一些分了田的農民連往地裡送糞也停止了。各級黨委如熱窩上的螞蟻，紛紛為自己尋找退路。農民說：「報紙說下面不穩定，而真正不穩定的因素在上面。」

不穩定來自上面，壓力也來自上面。一九七九年春，一位老紅軍幹部來到肥西縣，大聲斥責湯茂林搞倒退；秋天，又有一位副部長親臨肥西，搜集了「包產到戶」九大問題的反面材料，也把湯茂林叫去訓斥一番。宿縣地委負責人眼看承包制在周圍幾個縣成了燎原之勢，抱頭痛哭：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步回到解放前！

然而，時代畢竟不同了，幾葉沉舟畢竟擋不住大江東去。從前人們對「黨的領導」還奉若神明，嚟若寒蟬，可是今天他們開始陽奉陰違，甚至公然抵制了。因為，一九六一年是包產到戶使他們從死亡中掙扎出來，這個甜頭給他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而後來的十四年大鍋飯又把他們拖向貧困的深淵；這個記憶又太痛苦了。這鮮明的反差告訴他們「接受黨的領導」將意味着什麼？共產黨失敗的記錄，人們心中痛苦的記憶，構成農村改革的支點。

中國農民受盡了苦，他們太希望支配土地的權利了。這一執着的追求並沒有因三十年的

共產黨統治而泯滅，它不屈不撓地表現出來。

在那些糾偏風回潮的日子裡，人們四處串聯，到處告狀。當肥西縣四十六號文件發下之後，懇求的呼聲遍野：請求縣委，請求領導，讓我們幹兩年吧，等大家都富了再攏在一起不晚，可是今天先讓我們有口飯吃吧！在部分強行糾偏的社隊，農民們以罷耕罷種進行抵制。中共黨委的紅頭文件，一再地失去效力，不再像過去那樣靈驗了，一些基層的農村幹部紛紛訂立攻守同盟，準備誓死捍衛承包制，抵制上面的壓力。

肥西縣山南區的湯茂林聲稱：「我準備坐牢！」

八 地下進行的改革

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裡，陳列着一份「絕密」文件，這是一張普通的十六開白紙，上面寫着：

保 證 書

(1)「包產到戶」要嚴守秘密，任何人不准對外說。

(2)收了糧食，該完成國家的就完成國家的，該完成集體的就完成集體的，糧食多了向國家貢獻，誰也不裝熊。

(3)如果因「包產到戶」倒臺，我們甘願把村幹部的孩子撫養到十八歲。

在這個保證書後面，印着十八個人鮮紅的指印。後面的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每一個看到這份文件的人心底都會油然而產生一種悲壯感。它向人們昭示着十年前那場掠過江淮大地的急風暴雨是怎樣產生的。在一場被共產黨自稱是它領導的改革中，真正的改革

者竟然要進行「地下活動」，要訂立生死同盟。

十年前的一個寒秋，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十八戶農民召開了一個秘密會議。當時小崗全村已幾乎揭不開鍋，在死亡面前，三個生產隊幹部，隊長嚴俊昌、副隊長嚴宏昌、會計嚴立學揭竿而起了，決定實行「包產到戶」。這三個幹部本身都當過乞丐，對大鍋飯體制深惡痛絕，同時也都親眼見過走資本主義單幹路的人怎樣挨整，對「糾偏」的壓力噤若寒蟬。可是，最大的恐懼莫過於死亡，身處絕境，他們豁出去了。

「包產到戶」的決議幾乎立即就通過了。而大家討論最多的是這樣幹的後果。幾乎沒有人懷疑，他們的三個領頭人會被當作「反革命」處理。十六年間，這樣家破人亡的悲劇人們見得太多了，邁出這一步要承擔多大的風險？可是所有的人都豁出去了。大家最後一致同意，如果生產幹部出事，他們將輪流撫養他們的家屬。這份秘密協定就是這樣誕生的。

小崗的改革是一場徹底的改革，在肥西山南區，在安縣魏郢，人們在表面還打着責任制的幌子；分田表面上也只分到組，而小崗的十八戶人家在一開始就明確地宣佈：「包產到戶」，這個概念和「單幹」是可以劃等號的，而單幹是可以和「資本主義」劃等號的。

小崗人預期的厄運果然降臨了，公社書記把三個隊幹部召去，大聲斥責道：「歷史的車輪不能倒轉，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搞資本主義一樣被搞掉，你小崗尿再高，高得過劉少奇嗎？」

爲了把小崗拉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公社用行政手段卡稻種、卡化肥、卡貸款。總之，凡是共產黨給的，小崗一律不能享受。

最後小崗生產隊長心一橫，到公社供認不諱。最後他與公社書記也訂了個攻守同盟，自己承擔責任，不連累公社。於是小崗的情況在公社、縣委的文件中消失了，大家都瞞着上面，這個「地下」的改革實驗只到一九八〇年才正式轉入公開。

儘管受到上面的卡脖子，小崗的改革還是呈現出它的生命力，一九七九年，全隊人均收入比一九七七年增長百分之五十五，而人均口糧均長百分之六十五，一個瀕臨絕境的村莊得到了新生。

九 千秋功過，誰人評說

江淮大地自古以來就是個多災多難的地方，這裡曾經孕育過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兩千年後，這裡的農民再一次以另一種方式揭竿而起。四年之後，整整經歷了一代人時間的人民公社制度傾刻瓦解了。

我們問這中國農村改革的故鄉：是誰領導了這場改革？

它的回答是：沒有人領導這場改革，改革的種子是在飢荒中種下的，是在貧困中發芽的，是在災難中開花的……，改革是自發的，不約而同的，它出於人性的本能。這是歷史的功勞，是「天功」。

而共產黨所做的一切，都只不過把農民身上的繩索鬆了一下，即便如此，它也是被迫的，毫不情願的。可是現在它却要站出來代領天功。

這公平嗎？歷史的回答是否定的！

珂染：在社會和自然中蔓延

小海

在國內時就從報上得知，大陸留美的二萬

多學生中有一半以上是上海人，到了新大陸後的所見果然不假。所到幾個州，到處都有講「阿拉」的上海同學。北京人重政治，說話的話題總離不開高層權力中心，上海人講「實惠」，他們更多關心的是社會上的種種「世面」如何。筆者在美時間不長，却已像個職業講解員似地重敘了以下所寫的幾個同學們都很關心的話題。我覺得，上海的老同學儘管自我實際，然而，他們也普遍地更關心於國內的改革現狀，他們中每個人都程度不同地把這些情況與自身的存在及將來的前途結合起來注意着、思考着。因此，筆者以為，把今日上海灘這個中國最發達地區在改革中的稀奇古怪現象寫出來，投稿於在留學生中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之春」，或許既能滿足出來已長久的同學迫切想解家鄉現狀的願望，似乎同時也能滿足我這個學文科的學生的「責任感」，因為，上海的現狀就是「改革」得「越深入」，社會就越混亂，官僚也越腐敗，你即使是一個對「王權」再抱有幻想的中國士大夫式的理想主義者，現實也

會逼迫你的「理想」無絲毫生存餘地。

淫風淫雨：從「黃黃公司」說起

不知什麼原因，「上海」一詞總與紅男綠女分不開。在海外的人現在都說上海灘現在「野雞」滿天飛。筆者一介書生，對「花」與「柳」一類門經實在不甚了了。不過，筆者到來美國第一週遇到過一位前些年移民香港現也來美的留學生，他向我繪聲繪色地說過奇遇上海「賣淫集團「黃黃公司」的經歷，使我證實了在上海風聞的以及從報章雜誌中偶爾披露的腐敗風氣在日益蔓延是確確實實的事。下面是他敘述的片斷記錄：

「在香港，人們都說在香港找暗娼很容易。有很多商人到上海做生意都兼帶着這個目的，找上海姑娘玩玩。上海姑娘漂亮，也會打扮。但香港很多懂行的人都說，價格却不像想象中便宜。」

「我到上海旅遊探親的第二天就去了有名

的國際飯店「風化區」，頭一天就讓我碰上了。一個廣州倒爺打扮模樣的人。他很懂行，看出我是從海外來客，先求我換港幣，接着用蹩腳的英文問我要不要「HIT」。我很好奇，表示了興趣，他就與我約定晚上在國際飯店舞廳見面，並說如我不滿意，可以不付介紹費。」

「到了晚上，我如約前往。此人確是一個老手，不是那種光吹牛皮的傢伙。在舞廳裡，不知他打了什麼手勢或暗號，一會兒就有五個姑娘湊了上來。我知道大陸這一行的規矩，香港客此時該幹什麼。我招呼他與她們在旁邊的咖啡廳就坐，理所當然地我付了帳，接着是挑選過程……這五個姑娘年齡從十六、七至二十四、五歲不等，從外表上看全然不像操此行業的女人，打扮得不太俗，也沒濃粧，最小的那個中學生模樣的只是微微卷曲了她不太長的頭髮。聽口音有的還不是上海人。從談吐上感覺得出，她們也不像是那些目不識丁的蠢女人。其中有一個還操着發音比我還準的英語試圖與我談莎士比亞。」

可能是出於不必細敘或不好意思或表示對

我這個純粹書生的朋友的尊重，他沒有詳敘他與那些姑娘究竟怎樣。然而，他却以比我這個老上海還要老上海口吻向我吹噓了他對上海灘這一門道是如何的熟悉——事實上使我這個整日呆在學院的書生睜開了眼，見到了我家鄉陰暗的一面。

「此兄向我『做廣告』說，他手中的女人都是上海灘上第一流的，而且時間做長了他就不要了。他說他定的價格，每晚二百元外匯券也是十分公道的。那種婊子路上的只值七十元。他同姑娘們也有約定，視誰提供房間而定抽成比例，四六開或六四開，如果客人喜歡時間長，接下來的日子就是對開。但是，姑娘絕不允許拋開他單獨接生意，否則被他發現就要不客氣。」

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詢問了這些女人的來源以及她們為何甘心操此賤業的原因。

「這老兄說搞『高價』的就有高級的搞法。海外華僑錢多，而且是外匯，肯幹的人多的是。我父親是採購員，經常跑江浙一帶，那裡想到大上海來撈的姑娘多的是，反正她們家鄉的人又不知她來上海是幹嘛的，對惹拐錢的外地女人來說，還有什麼比幹這行更容易。上海人的情況又不一樣，不過你可以找那些『狗屁』大學生，她們只想出國，幹這事既能攢外匯，或許還真能碰上機會嫁人什麼的。」——聽來聽去，一個是錢，一個是逃出國境，不外乎這二大主要原因。

「這老兄也真是上海灘的能人。他還說你想個處女也可以辦到，價格要六百元外匯券。不過你得慢慢來，要耐心地同她說幾天『戀愛』。完事後，如果你沒老婆，真想結婚，得多付四百元的介紹費，如果你不想，後面的事全

由我來辦。」

「這小子也是個不折不扣的無賴。他說，除了處女本身可以賺大錢外，任何姑娘都要讓他與他父親來『測試』一番，以了解她能力與特點如何，以便做生意時更合適地介紹對象。」

「他給自己的買賣取名為『黃黃公司』。他還說他的目標想真打入『國際市場』。如爭取在香港商界人士中建立關係，即能有一批人到上海，如果想要個女人陪伴就會來找他。此外，他還向我詳細詢問香港夜總會情況，甚至還問有無可能與他們建立關係，建立合適的途徑『合作』，諸如『介紹』，提供姑娘等等」。

我在聆聽時總感覺到這位似已變成花花公子的老友有些誇張，誰我所想像的似乎遠了一些。他為了證實他的奇遇，自我出示了通訊錄，從上面的字迹及紙面確已有些陳舊，電話號碼和特地加「黃黃公司經理×××」，以及看得出是在興奮之餘加上去的「奇遇」等字樣可以推斷出，至少這個無賴以及與那一伙狗男女是存在的。然而，我知道大陸對這類事還是禁止的，聽說黃埔區公安分局還專門有個「科」對付掃黃。但是，這位朋友進一步的敘述簡直令人瞠目結舌：

「這老兄對『調羹』（上海俚語，從『條里』——即便衣警察或暗指公安局的人而來）也真有辦法。他說一個是花錢，買通路子，另一個方法是讓姑娘們自己去對付，她們也都知道這是必要的無償勞動，有了這兩樣寶貝，你說『調羹』們能找我多少麻煩。另外，我有姑娘有錢，當然能找到靠山，高幹子弟是我朋友的多的是」。

至於他講的公安局那一些，我不敢百分之

百的全信，對於後者，筆者堅信不移。前二年震動全國的上海市書記胡立教兒子胡曉陽流氓集團案完全證實了這種事的必然性。筆者有位學法律的朋友當時曾參與了此案的工作。他告訴過筆者，此案原比公開披露的要複雜得多。胡曉陽這個無賴八旗子弟主要是因為他老子胡立教不過官場上的對手，處於失勢之中，對方的權勢大，又可用此事來殺殺胡立教的威風，所以他那些令人髮指的強姦罪行才會被公佈與處罰。事實上此案牽涉的面極廣，那些不識共產黨國家「時務」的律師們在那時真的以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春天」來到了，他們也可顯一番身手了。未料，後來收到了一個莫名其妙的通知，名曰「保護」，實則遮掩了於官場鬥爭無關或官場討價還價之後必須要隱蔽起來的另一些人與醜事。

然而，不管怎樣，淫風淫雨已游漫於上海灘大概是每一個上海人都會承認的事實。寫路邊的所謂「法制廣告欄」，隨處可見懲罰「賣淫」或「賣淫集團」的佈告。以上那位香港朋友所介紹的可能是屬於牽涉社會面並不太廣的一科，更多的此種最古老的職業還是復興於普通人的社會中。筆者在前幾月曾看到過這樣一則長寧區法院的公告，說的是河南某辦廠有方的改革家廠長來滬聯繫業務碰了挑花倒運的事。他因工作需要，包了一輛出租車，幾天下來，與司機混熟了，不知是他原就想去上海尋芳還是那位司機同時還兼營拉皮條，反正是他幫這位改革家找了個暗娼。可是這位恣浪漫一番的改革家的運氣不好，剛帶着這位姑娘回旅館胡混不久，就因旅館服務員的報告而被帶進公安局，結果是關押三天並被處以重重的罰款。記得當時在一起看告示的市民議論

說，公安局現在同旅館有協議，旅館負責報告，公安局管抓人，罰款則作為獎金大家分成——即使是禁娼，其動力也是「錢」。如果這裡也出現個「黃黃公司」與公安局競爭，我想這位成功的改革家大概是不會破財的。

現在官方的報紙也開始被迫承認並偶爾報導一些上海灘上正在蓬勃興起的娼妓業，其中最為影響的要數十二月「新民晚報」上關於「陪酒女郎」的「爭鳴」。去年入夏以來，在五星級的靜安希爾頓賓館附近出現了好些個體戶酒吧。它們都裝璜得摩登華麗，然促其生意興隆的法寶却是一些「陪酒女郎」。這些姑娘一般都是天生麗質，很會應酬。來源有待業者、工廠女工與大學生甚至研究生等。不同社會層次的接待不同的客人，受過高等教育，能略講幾句英語的，就接得洋人與華僑，那些綉花枕頭一包草似的女郎則以接待個體戶為主。每天入夜，她們塗脂抹粉梳裝後開始上班，在以優雅又似昏黑的幽光下陪人喝酒、聊天，然後……當然，這種行當至少在名義上與除直接赤裸裸的肉與錢交換外沒其它什麼內容的賣淫有着區別，大陸不健全的「法制」體系與名目繁多的「行政條例」對此也一籌莫展。或許這也是一種「黃黃公司」，但個體戶絕不會同公安局簽合約。所以，不知是記者編輯有意地在「四項基本原則」下曲折地批評現實——直接暴露以有損「社會主義形象」，或純粹是獵奇。這些文章在上海灘上着實地轟動了一陣。有好些人在「合法與否」的題目下寫了文章。然而，更多的人却把這種爭鳴視作官方無可奈何地承認了現實：淫風淫雨瀾漫着上海。因為，沒有人真會把這些酒吧女看作是賣笑不賣身的「高貴」女子，那些找陪酒女的男子也不可能是動口

不動手的真君子。就像這些女子每天身着的是現代化的古裝旗袍一樣，人們都自然而然地把這看作是古老職業的復興，好多「老上海」投稿說：「以前上海的這種女人就是這個樣子的」。

「陪酒女」是公開的討論，另外一些在「內部報導」中記錄的則有五花八門各種各樣的行業，諸如「住家保姆」——類似於包月，營業舞廳中的職業舞女，還有一些被稱之為改革派的新一代官僚長從不開女性的夜「文化」生活，等等。總之這些在上海的民衆之中也有各種流傳。

早些年，上海人風聞三、四十年代繁榮一時的最古老的職業復興時，都覺得有些新奇，現在情勢如此蔓延，人們也就見怪不怪了。在輿論中，絕大多數人搖頭嘆息，却也有一些讀書人認為並非壞事。筆者有位從事社會專業研究的老友，他堅持認為這雖然腐敗，却對中國這個無可救藥的社會走向新生有利，其理由是，現在國民經濟不能市場化，而這種會使大量官僚及其後代卷入的人肉交易，會對包括官僚在內的中國人的觀念改變有利，而且，娼妓也會把原已生膿的官僚們腐蝕得更爛，這樣社會加速新的變革到來。對於這種奇特的理論，筆者作為一介書生是不敢苟同的。極權與腐化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的，賣淫業是古老的職業，把其稱之為會促進經濟市場化似乎有些天方夜譚。對官僚們的腐蝕確有作用，可是，共產黨從它掌權的那一天起就開始注意「為國為民」的「功臣」對這些玩藝的需要，殊不知「保健護士」之類的名堂早就不是新聞了，現代娼妓業會使他們及其後代更腐化，然而，腐化或許還會導致更加極權，因為他們更會明白騙者淫逸

是靠什麼來維持的。更重要的是，筆者在就憂這對國民精神的腐蝕作用，這倒是一種真正的對社會的「精神污染」，而一向號稱禁欲的共產黨現在已無力阻止這種腐敗社會風氣的蔓延，或許，他們其中的份子正在有意助長這種風氣並從中漁利。權，不管大與小，或是哪一種類型的，能圖到利的就該使用，這已經是一般共產黨員的生命哲學，賣淫業自然而地會成爲實施權力淫威的區域，這大概也就是今後賣淫業不但難以禁止而且只會更加蔓延的根本原因。但筆者不能相信這對社會發展有利。

肝炎、傷寒、性病和愛滋病

上海的污染一向嚴重。黃浦江、蘇州河的水這幾年愈來愈黑，在夏天，一公里外都能聞到這混淆臭味。至於空氣中的污染，那是每個在美國的上海人都能想象的。中國人大概天生就習慣或喜歡髒的生活，一般人的意識中也不大有「污染」的觀念，直至一年前爆發並延續了幾個月的肝炎大瘟疫後，才有越來越多的人大罵北京政府不拿上海人當人看，只管從上海拿錢，不管上海人生活環境之惡劣。

有很多上海同學十分關心那場大瘟疫，有的還給我看了當時美國報紙對此事的報導——按美國標準，似乎是十分駭人的數字，一個城市有六萬多之衆被傳染。中國大陸的事情往往被誤解或被蒙上一層紗，就我所見的各種記載，都不是對事實的真實記錄。筆者家庭中有二人是醫生，當時都參加了「緊急治療」。就他們所知道的患者數字，十倍於外國報導（他們引據的是中國官方衛生部爲「兼顧國際影響」所

公佈的數字)。在發現肝炎已開始傳染的頭一個月中，每天至少有一萬五之眾被送入醫院。據傳染高峰期過後的統計，共有七十多萬上海人患上肝炎。即使在高峰期過了以後，每天有數千新患者被發現也持續了一個多月。那時，上海至少有二分之一的家庭有一、二個甚至全家都是肝炎病人。不管這場「肝疫」確實是由一個古里古怪的新肝炎病毒所引起，還是大陸的醫療防疫水準實在太低，或是官方從來不注意認真防疫，反正，當時連預防免疫的藥都沒有，人們只能見着自己肌體的抵抗力在這瀰漫着肝炎病毒的環境中碰運氣。上海人也一向喜歡別出心裁並瞎起哄，當時實在找不到預防的藥，也不知是誰先想出來主意，說醫治感冒的「板關根」中草藥可以作預防藥用。人們在病魔恐懼中紛紛尋找此物，黑市販子也趁機從中漁利，勾結醫生或醫院藥房的工作人員，囤積「板關根」，把一盒原來價值不過幾毛錢的普通藥哄抬到像人參一樣的幾十元一盒。不過，筆者當醫生的親戚講，病毒是個什麼玩藝都沒有標清楚，哪來的預防藥可言，「板關根」恐怕是心理預防更甚於醫學上的預防。筆者有二個同事，用高價買來了許多「板關根」，天天服用，最終却還是逃脫不了被傳染的厄運。

那幾個月中海地區真的是「談肝色變」。人們見面不敢握手，怕對方是個帶病毒者。誰的家庭成員有人患上了肝炎，同事們都嚇得不敢同他接觸。平時一向生意興隆的上海大大小小飯店，此時即使在營業的黃金時節，也是冷冷清清，「座無一人」，偶爾，你會看見一兩個外地來人模樣的坐在裡面，但他們一般是實在找不到填肚子地方或剛到上海還不知肝炎病魔的厲害。筆者在那時硬着頭皮參加一個老

同學的婚禮，他迫於其老頑固腦袋的父母壓力不得不去號稱第一流的東風飯店舉辦一個結婚宴席，而且還再三打保票，「消毒絕無問題」。這時候的東風飯店真像個醫院，消毒藥水放在每個桌子邊，標明消毒的毛巾放在每個座位邊，一進入大門就有藥味沖鼻的藥水在等待着，「非經消毒，不得入內」。然而，人們已被嚇破了胆，即使有如此嚴格的衛生措施，十人一桌的酒席，客人不過二三而已，而且，每人都自帶了餐具，原來輕鬆愉快的酒席，卻從頭到尾顯示出一副緊張模樣，煞透了風景。

固患者太多，醫院住不下。但衛生當局又怕患者到處走，散播病毒，所以就下了命令，所有的工廠、機關、學校等單位一律要開設自己的病房，至少要把病人都給「關」起來，同時，有許多中小學校也臨時被改成了「肝炎醫院」。不過，這些年似乎也真的是「時風日下」，有許多被關起來患者的「病人道德」十分低下，他們不滿意於粗劣的醫療待遇，逃出醫院，有的住宿於旅館，有的整日混迹於飯店，用他們的話來講，叫「大家都來生肝炎」。當時的報紙曾憤怒地指責這種玩世不恭的缺德行為。然而，更多的年輕人，尤其是筆者所熟悉的血氣方剛的大學生們却不以為然，認為這些患者幹得好。在現代社會中，肝炎這類普通病如瘟疫般的流行，其主要原因，絕對不可能是單純的生理、防疫之類的因素，受到「五四」激進的反傳統的傳統影響，並處於越來越失望環境中的青年知識份子，其對周圍一切富有政治意識的敏感度以及在對現實不能有所作為的無可奈何的心理支配下所產生的畸形心態，筆者以為是正常的。

官方把這場肝炎大爆發的原因解釋為食用

了帶肝炎病毒的毛蚶。筆者一位搞醫學的家人當時參加了病因調查工作。據他們的調查研究，那時在市場上出售的一批毛蚶確帶肝炎病毒，然而他們同時也在黃浦江水中檢驗出了同樣的病毒，這些從事調查的醫學工作者分析其根本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水質污染。不過，這類純科學的報告與分析立即被封鎖起來，理由是要注意「社會效果」和「國際影響」。他們也真的達到了目的，包括美國之音在內的海外報導都說真正的原因是食用了毛蚶。現在上海人見毛蚶如虎狼，從去年三月以來，肝炎也被控制住住了有十個月之久，然而，連官方的報紙在最近也不得不承認肝炎有重新蔓延的趨勢。現在民衆大概會意識到真正原因了。

自然環境的污染現在確確實實地構成了對上海市民嚴重的威脅。除肝炎外，傷寒、霍亂（俗稱二號病）甚至四九年前的上海都鮮有的血吸蟲病都已在上海出現。近半年來，防疫部門多次以「內部文件」的形式發布警告，基於上海市區的衛生條件，傷寒等流行病有大規模爆發的可能性。然而，警告僅僅是警告，生態環境從來就不是個單純性的自然環境或科學上的問題。幾十年來，北京的共產黨政府一直要求上海這個全國的經濟中心多挖潛力，增加產值，其目的在於能多收錢。他們從來就不考慮發展生產須與基本建設相結合，也根本不會有改善老百姓生活環境的觀念。因此，幾十年來，上海的工業生產確是越來越發展，然而工業污染也愈來愈嚴重。上海人食用的自來水是從黃浦江中過濾處理而來，可是，據筆者所在的大學的環境研究室調查結果，自來水污染仍然極其嚴重，若按其化學成份來估計，平均每個上海人每年大概要吃進一小桶髒物。如此糟糕

自然環境，肝炎再爆發幾次，稀奇古怪的流行病出現得也多也是不足為奇的。

除環境污染導致的疾病以外，由淫風淫雨所引起的性病大規模傳統也是這半年多來對上海人健康的一個致命威脅。據衛生當局報告，性病增長率，一九八八年是一九八七年的十倍。然而，他們沒有公佈究竟有多少個性病患者。半年以前，黃浦區文化館那兒搞了個性病介紹與防治的展覽，一下子轟動了整個上海，其實支配人們心理的還是新鮮與好奇。可是，最近的幾個月，性病患者越來越多，用行政手段來控制所謂風氣腐化也根本不見效，可能是新聞媒介受到了越來越大的壓力，或許可能是新聞管制部門也意識到花柳飛揚已經是個生在臉蛋上的大紅瘡，想遮羞也遮不住，總而言之，現在已經不是開開展覽會的一般手段，而是報紙、電台、電視台一起出動，介紹性病種種以及如何識別和預防。這些宣傳甚至運動人們不要去公共浴室洗澡，以免被傳染上。所有這些



大禮堂變成了肝炎病房

，都弄得人心惶惶。

隨着性病的蔓延，各家大小醫院也相繼成立了性病治療部門。不過，最興旺的還是地下

醫療事業。筆者有個學醫的中學時代的同學，他在下班以後為性病者醫治所得的收入是他正規工資的三倍。他告訴筆者說，其病人有各種各樣的職業，最多的是個體戶。他們之所以寧願自己花錢來找他是因為怕醫院裡的記錄。我這位當醫生的中學同學也着實能幹，他有大量的以「拉皮條」為生的朋友，所以他的病人源源不斷，他也買通了醫院藥房工作人員，或造假名領取藥品或乾脆偷，他的家已成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地下性病診所。

至於 AIDS 雖沒聽說過中國人有誰得過這種可怕的現代病，然而，從醫療衛生部門那裡得知的消息，却很難講在最近的將來不會出現。筆者當醫生的家人讀過一個文件式的報告，說的是合資經營的某家大賓館一個外籍工作人員被發現患有 AIDS 病，中國當局十分緊張，限其立即離境，可是，接下來的調查結果更令人不安，在他被發現前的一箇月中，他至少已和十四個中國女人有過關係，保衛部門知道其中一部份人的名字，但有些已無踪無影。因此，報告通知各家醫院密切注意。然而，醫生却說，AIDS 病毒或許會潛伏好幾年，誰知道這些靠皮肉為生的女人又會製造出多少個帶病毒者。

共產黨的宣傳機器把自然環境污染和社會風氣腐敗所導致的一系列疾病流行說成是「對外開放」後的結果。然而，我們這些現在已經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中國人大概都會直覺地反問道：「外」並不那麼污染，除 AIDS 以外，也根本沒有那麼大規模的各科疾病流行。這些日益嚴重地威脅着上海人健康的疾病，究竟是「內在」的「潛伏期」已過而自然爆發，還是真的由「外來」感染所致？

中國之春雜誌社聲明

王炳章曾在本刊刊登廣告，宣稱創辦人壽保險業務，解決中國之春財務困難。但王炳章保險業務開辦九個月以來，並未履行其諾言，不但對中國之春雜誌社毫無貢獻，而且還擅自捲走雜誌社基金存款七·八萬元。在此，本雜誌社正式明與王炳章保險公司廢除一切協定。王炳章今後不得再用解決中國之春財務困難的旗號經營業務。

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

戰時經濟上海大



沒有炮聲，也沒有硝煙，戰爭却是真正進行着，這就是大上海經濟戰。這是一場以上海市政府為一方，以外地政府和群眾為另一方並在上海市民千家萬戶的積極支持和廣泛參與下的「人民戰爭」。這是一場靜悄悄的、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戰爭，是人自為戰，家自為戰的，是到處進行着麻雀戰、運動戰的。這是一場從早到晚的沒完沒了的持久戰。在這裡，上海市政府被迫在內外線兩面作戰。

凌晨，在大上海與鄰省的「結合部」，在上海經濟區的邊界，外線戰就悄悄地打響了：

一、邊界 外戰綫

天邊，尚未亮起魚肚白。路邊，深秋的野草才掛上露珠。紫花色的機耕路、田埂路已走着魚貫越界的自行車隊和手扶拖拉機隊了。它們類似越南當年的「胡志明小道」，專控物質就通過「敵後武工隊」從上海悄悄外流。上海是塊肥肉，無數條「胡志明小道」，好似縱橫密布的毛細血管，正在使上海地方經濟隱性流血。流出的豬肉製品、大米、廢舊金屬、廢紙、滲產卷煙等。透過自行車流往後看，你會見到一輛熄火滅燈的待「駁」大卡車，自行車群正圍着等卸貨。你再往當年遺下的牛車盤前一瞥，更為諒訝那如箭似的小舢舨船，正在輕輕滑行出來。也許，對水鄉來說，水網更利於「河湖游擊隊」的出沒，它們的乘客往往是一群才從大卡車上下來經聯運線換乘的吵吵嚷嚷的蠢豬。至於鴨子，更方便了，它們是照照攘攘自行從水路蜂湧衝出封鎖線的。從十里洋場的「敵占區」，來到了「解放區」自由清新的土地，有的還高興得拍着翅膀嘎嘎大叫哩！上海是個「價格盆地」，而銷售市場總是

「水往高處流」的，所以存在着巨大差價的多種物資就如此流進鄰近省份了。譬如，自從取消統購統銷而改為合同定購後，上海鄰近的糧食市場十分活躍。集市貿易的議價糧可達每市斤（五百克）七角。不產糧的上海七百萬市民居民消耗的商品糧大有剩餘，從市民嘴中滿出的糧就進入了胡志明小道。一個米販子通常一角五分價格收進一市斤糧票，或以平均每斤六分的錢或實物向居民借得購糧證，那麼他們從上海按平價購得的糧食就只有二角多至三角六分。如賣給在上海工作的外地民工（主要是修建隊），每市斤可賺一角。如運到外地，則每市斤可賺三、四角。這樣，一輛裝運五噸的東風牌卡車一次就可以賺三至四千元人民幣（合官價一千元左右）。又以豬肉為例，肉販子以每張二角的代價從居民手中收進，然後到菜場套購方肉、奶脯（外省不少地方豬肉不分檔，統貨每市斤三元），官價一元七角五分，每斤到外地就可以淨賺一元多，這樣一卡車一次就可獲利上萬元。在這裡，利潤從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百，難怪各種販子們樂此不疲。巨大差價所帶來的誘惑是一切的動力，何況所冒的風險遠小於當年上海孤島時期從日偽封鎖線中的措米。

結合部是阿發、阿根、阿毛們的天下。上海經濟關卡的陸路十幾個出入境檢查站，對活躍在胡志明小道的他們是無可奈何的。自行車手扶拖拉機只要過界行不遠，又會有卡車在前方等候了。

胡志明小道和「卡子」往往只差兩三公里。偶而，在化整為零的大批武工隊越界時，遠遠公路上會隱隱傳來喧天的爭吵聲。「又是一輛闖關的！」阿發們會心地微笑。這些卡車往往是才出茅廬少經驗的散兵游勇所為，他們或

用雙層「跑墊」，或借真假油桶，或用層層水泥包蓋壓，或用髒亂散裝煤屑偽裝，試圖闖關。他們時而可以用現金、外烟、手錶、金戒指來行賄；時而可以用要死尋活，把頭在卡車上碰得山響來威脅求情。不過雙方的心裡都明白，只要五次裡逃過三次，照樣是闖關者發財。不過，也許「闖關」正是爲了掩護大批武工隊順當「溜關」……。

在葛隆，在安亭，在金澤，在楓涇，上述的一幕幕話劇幾乎天天在上演。

名符其實的外線作戰是在越過結合部到達解放區以後。上海同其他省份之間在經濟領域裡的政策差異，在那裡就化爲各地政府之間的真正戰爭。

據上海解放日報八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報導：「嘉山縣陶莊鄉有一個頗有名氣的水上廢舊金屬交易市場，來自四面八方的買賣雙方，由水路聚會於此。」該市場一九八七年成交額爲八萬噸，其中相當一部分貨源是販子們從上海偷運出去的，而兩地之間的差價高達一倍。在上海被禁止的交易，當地是公開合法的，而且嘉山縣政府還向上海物資局逐條介紹其優越性呢！所以，只要能闖關走隘，一旦出境就受到鄰省政府保護，銷路更不成問題（毗鄰省份要發展地方工業，乾脆就割上海的肉來肥自己）。鄰省的工商機關是庇護他們明裡暗裡的武工隊的。當上海工商人員「越界」追趕逃往外省地界的販子時，僅僅幾步之遙，就會受到外地收糧人圍哄，甚至搶去執行公務檢查人員的臂章，而當地治安部門則佯裝不知，置若罔聞；甚至暗中相助。

與此相比當年歐洲才展開自由貿易時，一些封建公國之間的商業戰，只是多了武裝押運隊而已。難道上海經濟邊界上的外線越界戰，

不是資本主義自由貿易戰的先聲嗎？其實，物資流出流入也是雙向的，真正的槓桿是價格。八八年十月一日上海將每擔毛豬的收購價及苗豬補貼分別提高百分之十五及百分之三百七十，才兩星期以後，鄰近縣份的豬肉即流入了上海郊區！四鄉的農民是天然的資本主義商人，上海市府是社會封建式的官府，這是兩種制度的戰爭。看來，代表先進時代的一方會最終取勝的。

在上海經濟區外線戰打響後的不到兩三小時，市內各菜場的內線戰就揭幕了。



條條水路通上海

二、市場 內戰綫

每天早上五點前後，上海近兩百個中心菜場，四百個分菜場，已經是人頭擠擠，水洩不通。各縣各鄉農民隊伍爲主的集市貿易或團身

其間，或另辟福地。對每個家庭主婦（五好家庭則是「主公」）來說，只能在「便宜沒好貨」與「好貨不便宜」之間抉擇。到前者攤上去排隊，得看官商的臉色，受滿肚子的氣。好丈夫會因爲上當拎一串肉皮回家而受妻管嚴的懲罰，時而大塊的泥巴，寸把的鐵釘也會從菜籃裡脫穎而出。到後者攤上去挑揀，又時時得搯着指頭算：「答應長的工資何時到手？這一期的國庫款又扣了幾十，開工不足，原材料困難。獎金已經發不出了……」

抬頭對物價，低首看菜籃，主婦們一泡辛酸淚。想起病中的孩子，排隊買瓶牛奶，不一會已經架空瓶罄，只好忍氣到旁邊牛奶販子手裡去掏一倍的錢。她知道商場和販子們是串通得利的，總之是自己吃虧。菜金超過了預算，怎麼辦？她是職工，又不能有第二職業來買賣筋肉，只好倒賣手中的票證來收支平衡了。

「菊香阿姨，啥價？香烟票……糧票……」。「躍進勸娘！十只雞蛋。衛東阿爸，再加你兩根葱！」。不用在暗角，任何一個菜場裡每天換蛋女都在做收購市府票證的事。這些端一個小板凳坐在市場最不起眼地方的賣蔥薑阿婆阿公們，是幾乎家家要光顧的。軍事供給制的種種配發票證直到特供、特需、多供獎售，只要有票證的，都可以向實物乃至「一般等價物」的貨幣轉化。到頭來，社會主義的計劃供應還是逃不脫價值規律的市場羅網。誰出價高，市民就把自己這一點可憐的權益出賣給誰——他們是以家庭爲本位，只顧追求現實的利益，竟不管千年王國來日的好處！市場管理員就在旁邊瞪着眼，這一切在他是司空見慣。「抓誰去？願打願挨的，兩廂情願。居民人人參加違法活動，法不責衆麼」，他會這樣回答。也許，他下班時也會收取好處：一包香烟外加一

塊老薑，「暖暖胃」。這不是一場真正的人民戰爭麼？消費物資戰有了成千上萬市民的自動參加，當立於不敗之地……。事實如此，到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八日，上海農貿市場的蔬菜總上市量已首次超過國營菜場的總上市量。這表明，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這一場戰爭中，後者已經開始佔了上風。群眾戰爭的威力，來自於千百萬家庭主婦的選擇。國營菜場日薄西山；兵員大量減少，一線掌秤者降為總人數的十分之二以下，缺勤、泡病號、跳槽者大幅上升（業大、電大、夜大、函大、職大生更是棄之如遺）；資金周轉困難，退休負擔却佔十分之三以上；購銷環節更是癥結層層，一方面大量浪費，另一方面工資發不出，再一方面場地日益被農貿市場吞食。這樣，四鄉的農民又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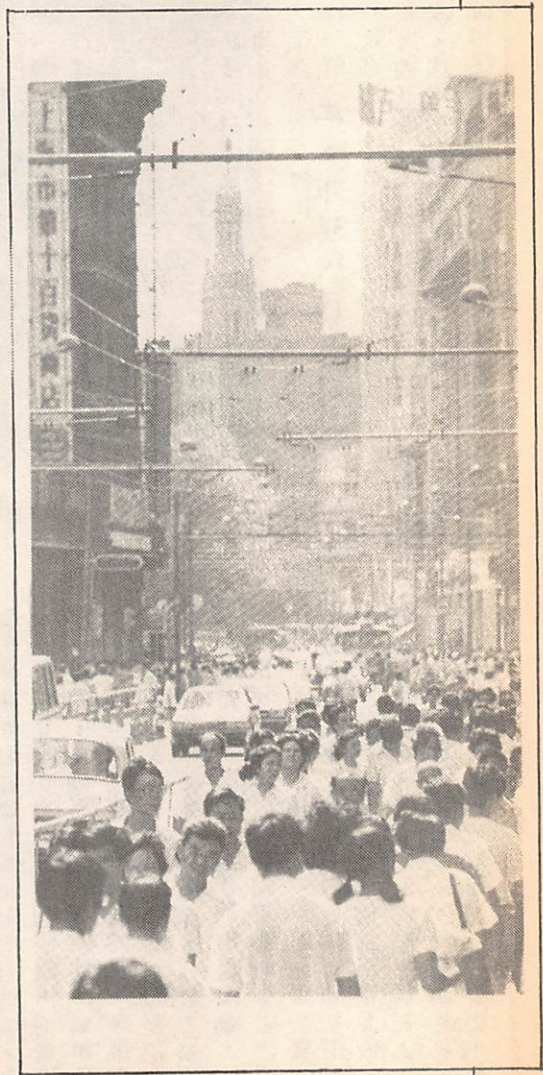


清晨，農貿市場開始營業

中午時分，「菊香阿姨」們便陸續到烟酒雜貨店用烟票買來了平價滬產卷烟。商店經理心裡有數，反正「認票不認人，照章辦事」。明天菜場賣鮮魚時菊香還會給他放個板凳佔個位置。

下午，外省外縣敵後武工隊的聯絡員到達。平價烟從商店提出了，官價大米從糧店遠走了。「菊香阿姨」們捶一捶痠疼的背，把才到手的辛苦錢攢得更緊了。此外，外省敵後武工隊還配備有「敢死隊」加強連：（上海對偷金屬懲罰向偏重）也擁有「武」的一手。一些外省農民，成群結伴，終年在上海打廢舊金屬的主意。他們或借拾荒為名，忙碌於月黑風高之夜，穿梭於工廠倉庫之間，連拾帶偷，打一箱換個地方。好在上海灘肥得淌油，露天倉庫到處都是。至於走街穿巷或從居民手中收購廢銅爛鐵，或串通企業從老公手中大批量套購，更是「敵」「我」犬牙交錯，內外勾結，難以有所虜獲的。說到生產資料的外流，那是「ANOTHER STORY」了。

暮色已降，華燈初上。上海的幾百萬家庭



上海，生存空間危機

正團聚一桌，等待主婦端上她從清晨為之奮鬥的晚餐。雖然丈夫不知烟票已罄，兒子不知糧票已光。賣蛋女，蔥薑阿婆，市場管理員，商店經理則各有所獲，大家心安理得。

這時正是敵後武工隊最忙碌的時刻。運輸裝車，通知解放區接應。待到夜闌人靜，屬關戰役勝利結束，上海經濟戰的各個環節才最後臻於完美。

就這樣，日復一日，從清晨到午夜。在這一循環的始點，是上海市府發票，而終點則是外省收取實物。餉了市民，肥了販子，多費手續，勞民傷財。只要價格不理順，地區性差價不消失，只要軍事供給制繼續存在，這個位於長江三角洲入海口的大城市在東瀕大海到西北西南江浙兩省的水陸路無數胡志明小道上，在經濟區的大本營內，總還是要天天演出這場既生動又麻煩既要又多餘的經濟戰。可以肯定，只要中共繼續作繭自縛，上海市政府也總還得繼續充當外省敵後武工隊的「運輸大隊長」這樣一個倒蛋角色。

對「報導者」的報導

董小

大興安嶺大火中新聞記者的遭遇

八八〇起火災

大興安嶺是我國最大的森林區。然而，自一九六四年開始建立林區以來，二十多年裡，這裡發生過無數次火災。火災颯過的過火面積幾乎已經等於全林總面積——三十萬公頃。一九六六——一九八六年裡，共發生火災八八〇起，平均每年四十二起，燒掉的森林面積是有效更新面積的一六四倍！原因何在？事實上，自從一九六四年開始開發大興安嶺，有關當局就沒有從總體規劃上考慮防火護林，整個森林地帶，除自然的河流與鐵路外，竟沒有一個稍稍像樣的防火隔離帶。同時，偌大林區，防火瞭生塔也才不到十座！更重要的是，這一起起火災和導致火災的原因情況絕大部分被封鎖，極少披露給全國人民。我國的新聞機構多年裡總像是一個可憐的木偶傀儡一樣，對所有事實真相緘默無聲。甚至一九八七年四月，緊靠大興安嶺的內蒙古牙克石庫多爾林業局，在一次因草原火災引起的森林大火中燒死撲火職工五十二人這樣大的事件，至今也絕對鮮為人知。大眾在報上看到的只是植樹造林，保護森林的成就，只看到一起起綠化祖國的工程。但是，人們沉默和被愚弄的時間總是有限的。當一九八七年五月七日，一場空前的大火在大興安嶺燃燒

起來時，我國一批有覺悟，有正義感的新聞記者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們毅然地、不顧個人安危，不計名利代價地，由各種途徑紛紛投身火災現場。他們溝通災區與外界的聯繫，鼓舞撲火前線的鬥志，推動救援工作，揭露官僚主義的弊端；在極其艱苦的物質條件下，把這場巨大的災難向全國、全世界作了報導，盡到了一個新聞記者的責任，從而無愧於一個中國記者的良心。但是，他們所受的精神打擊是令人吃驚和痛心的。

被驅逐的「無冕皇后」

這位女記者叫隋明梅，她是個潑辣、幹練、意志力很強的女子。火災發生時，她剛生完孩子整十個月。當一聞說興安嶺大火，她便立即要求親赴火災前線工作。她從北京來到齊齊哈爾，在這兒，她再也找不着一趟去塔河的客車。幸而此女記者生性爽快，聰明機靈，軟硬兼施之下，居然擠上了一輛運載士兵的悶罐車。這裡黑洞，擠擁擁，冷得難以招架；而且，對一個只身處在一伙男性士兵當中的女子而言，最大的困難更在於上廁所。但無論如何，她竟也在那悶罐車中度過了二十多個小時。到達現場後，她寫道：「清晨五點三十分，隨部隊出發，上山撲火，已是整整一天沒吃沒睡，

飢渴和困倦一起襲來，但還得艱難地拖動身軀，跟上隊伍。……」這是一次艱難的撤退。腳下的殘火時不時地燙着皮肉，樹根灌木條處處使絆，三步一踉蹌，五步一跟頭。不過，最使我難受的還是口渴。兩天一夜了，除了幾口酸鹹菜湯，我滴水未沾。一位戰士用刀在白樺樹上劃開一條口子，然後把水壺湊上去接樹汁。等他走開後，我衝過去，嘴對着那口子拼命地吸起來，幾滴略帶苦味的樹汁流進我的嘴裡，又擔頭追趕隊伍。……」如此艱辛，如此懷有熱情，然而，當她試圖履行一個記者的職責，開始報導工作時，却見火災前線指揮部的門上鮮明看着：「記者謝絕入內」。她幾乎一陣發昏，只好朝另一扇門走去，不料這間屋裡竟有人從裡邊頂着不讓她進！她頻頻解釋着：「我是記者」，只聽屋裡人惡聲惡氣答道：「你們這些記者亂看，都是火災，不接待！」她極其吃驚，又一再解釋、要求，但竟全歸無效。

在火災發生的第六天，當時的副總理李鵬前往塔河視察災情，一批記者自然尾之等待採訪。在機場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袁冰西看見了同時也在飛機中的黑龍江省委書記，便上前採訪。一個多小時後，他將自己寫好的報導又拿回這位省委書記的座艙裡，請他審閱以便發稿。沒想這位書記剛一聞言，便連連搖頭擺手，口中直說：「不着急，不着急，以後再

說。」袁冰西心中雖然頗不認為應當「不着急」，但想想也無奈，正擬轉身走開，忽然從旁邊猛地閃出一個穿便衣的彪形大漢，劈手搶過袁手中的稿子，喝斥道：「幹什麼？幹什麼的？」當他終於看清一把 在手中的不過是準備發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稿子時，竟粗暴無禮地說：「什麼時候了，還要什麼稿子！出去，出去！」於是，竟就當着省委正、副書記的面，硬將這位袁記者推出了機艙！

記者禁止入內

段心強是「人民日報」社記者。他為了更快更好地將火災報導出來，自己從北京捎了一台文字傳真機直奔塔河。有一天，他向火災指揮部請示，將自己的電傳機接在指揮部的電話上向報社發稿。沒想匆忙中不慎把一顆接線的螺絲弄掉了，而且，他又是個高度近視，爬在地上找來找去不見。指揮部的人不但不上前幫助，反而站在一邊劈頭蓋臉地將他一頓訓斥。他雖不作聲，連忙自己跑到一家郵局，自己請來修理將幫着修好了電線。這樣一個小小的失誤，他卻竟被遭罰款七十元！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一日，一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去找火災前線總指揮部人要稿，準備拍發回去，而裡面的一位行署專員竟然表情嚴厲地對他說：「省委書記已經說了，新聞稿件一律不准發！你們的報導都是報災的！」

整整一個月裡，烈火燒得每一個人的心緊緊揪起，烈火甚至驟然淹沒了人們數日的憤懣、不滿，人們只求這場火盡早熄掉，只求全體國人齊心努力、共同對付災難。當時，上街買菜問的，晚上下班看的，全是大興安嶺，大興安嶺。大興安嶺倏然間集中了這個本已心灰意冷的民族的目光，人們渴望知道那裡的真實情

況，人們感激着正在那裡日夜工作的每一位記者。然而，在大興安嶺，各級撲火指揮部門上却都貼着「謝絕記者採訪」，「禁止記者入內」的紙條。所有的負責新聞報導的綜合組只要一聽打電話的一方為記者，二話不說，立即掛斷電話；只要記者推開他們的門，這些人便板起臉，一面冰霜說道：「對不起，無可奉告，無可奉告！出去，出去！」各郵局接到了不准給記者發新聞稿的指示，一旦發現有人使用電話傳稿時，便要他們立即對其控斷線路。在塔河、漠河，不給記者住處，不給記者飯吃成為驅趕記者的流行手段。更有甚者，當地火災總指揮部臨時發佈的「強化組織領導的幾項制度」中第三條明文規定：綜合組「負責對外宣傳報導，統一口徑，對採訪記者要注意保密工作，未經總指揮部同意，不得擅自報導火災」。在當時指揮部總指揮周文華先生召開的記者大會上，他明言聲稱：有許多火災的報導，影響不好，今後一定要由指揮部統一口徑，各報記者看的稿子，都要先交給某一指定的人士審查，未經審查的不能發。

報喜更要報憂

新聞封鎖，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新聞封鎖似乎已成爲官方的一條不成文法律。他們大膽地無視真實事實，無視人民的疾苦，任意篡改、捏造、設計事實，並大肆宣傳，愚弄人民。大興安嶺失火後第十九天才姍姍蒞臨災情現場的林業部長楊鍾，曾在一九八六年雲南玉溪、安寧兩縣發生悲慘林火，有一個寨子的男人全被燒死，成爲有名的「寡婦村」的時候，仍把下面人交上來請他審閱的報告材料中但凡揭露矛盾、反映問題、表現真實慘狀的段落、句

子，用紅筆一一圈掉。這裡不是一個心理希求從痛苦中稍爲平衡一下的事情，這是拿人民的痛苦不當回事，心目中只耿耿於自己的官位，自己的私利的問題！在中國各級官僚拼命刻求的「報喜不報憂」當中，「喜」純粹爲了自己，而「憂」却是他們閉起眼睛讓人民用生命、用淚水去承認、忍受的！「人民日報」記者魏亞南說：「剛開始採訪災區，我們也並沒有想到要追究起火原因和人的失誤以及官僚主義。但與群眾接觸多了，聽到和看到很多反面的東西，出於責任感，我們不得不管。但我們的有些領導就不能容忍。如在漠河，我曾向縣書記提過幾個問題，其中一個是她沒有及時通知群眾疏散。她馬上變臉，不承認，但查下來是事實。」這次火災報導歸來後的記者們一致說道：「生活上的艱苦，我們認了。可是精神上的打擊不堪忍受。」然而，他們依舊忍受了；不僅如此，他們逆流而上，在官僚們設置的重重阻撓、困難面前表現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勇氣，把大量的事實真相及時報導、披露了出來，使全國人民在這次事件中，比十年前的唐山大地震了解了更多的情況，知道了更多官僚們醜惡、麻木不仁的內幕，顯示出了新聞界最初的力量，以及與廣大人民同甘共苦的鮮明立場。我們因此感謝他們，爲他們在爲中國新聞自由、打破新聞封鎖中所做出的努力和所表現的獻身精神而向他們致敬！



大雜院裏的暴發戶

田小剛

暑期返國，眼界大開。北京城變化之大，出乎意料。我已有些不認識這塊地方了。特別是，幾位童年時代的伙伴竟已成為腰纏萬貫的潤佬，更使我有隔世之感。

我家住在宣武區的一個大雜院裡。院子裡共有十一戶人家，都是社會底層的體力勞動者。家家窮，戶戶破，沒有什麼拿得上台面的人物。文盲率很高。我家是大雜院裡唯一的書香門第——我父親在小學裡看大門。

也許是出於逆反心理，我自幼便刻苦學習，加上又有點小聰明，竟然升入高等學府。及至一九八四年我考上公費留學，簡直成了我們這條窮巷裡的孔聖人了。相比之下，左鄰右舍的小韓、小徐和小呂都還呆在家裡待業，端着「父母終身制」的鐵飯碗。小曹、小馬倒是接父輩的班當上了全民所有制工廠的正式工人，但二位家庭負擔重，人均收入低，總也說不上媳婦。

我心裡的優越感和幸運感如此強烈，以致抵達美國後還久未消失。

數年不見，上述諸位本來注定終生受苦受窮，被人們看不起的小人物，竟然在新的經濟形勢下成為富甲一方的新強人！他們盡情揮霍，生活水準是我這個窮留學生所望塵莫及的。這就像是一千零二夜的神話，令人乍舌。

小韓、小徐好得就像親哥倆。有一回，小徐因事在街上跟外地人打架，小韓抄起自家的菜刀助陣，砍傷了人。結果兩人一起進了公安局，一個拘留，一個勞動教養，小徐走出看守所，一心想搞些鈔票，買些營養品寄給在天堂河農場勞改的小韓。於是，他在父親的指點下，辦起了糖葫蘆。

小徐父親年輕時以蘸糖葫蘆為生，解放後成了國營副食店的售貨員，手藝沒有發揮的機會。老爺子見這兩年政策寬了，不禁技痒，一直躍躍欲試。父子倆東借西湊弄了點本錢，從大興具販來山里紅，又熬了糖稀，劈了竹棍，做開了小本生意。

父子倆都是能吃苦的人。老的在家中蘸糖葫蘆，小的滿世界兜售，齊心合力撈鈔票。糖葫蘆是兒童們稀罕之物。只要小徐往街上一站，立時就會被「小皇帝」——獨生子女們團團圍住，把他的腰包塞得鼓鼓的。

第一個月下來，父子倆一算帳，笑得合不攏。他們淨賺了數百元。他們根本沒敢想有這麼大的賺頭。

天氣漸熱，糖葫蘆的生意不好做了。這家的女主人——小徐的母親、老徐的老伴——在胡同口擺了個茶水攤。據說，北京城第一個茶水攤是前門地區的待業青年操辦起來的。「北京大

碗茶」名噪一時。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見了他們的代表，新聞界給以大韓大喻的宣傳報導。市面上流傳着這樣的民謠：「要想把家發，快賣大碗茶」。小徐母親的茶水攤擺得晚，自然屬於同業中的後進。

茶水攤本錢不大，利潤不小。搞得好，每天有十元八元的進項，這就很可觀了。徐大媽每晚在燈下點數硬幣，好幾次流下淚來。

小徐是個重義氣的人。好幾次拎着大包小包去勞改農場探親小韓。他在家中的變化講給小韓，那小韓悔得頓足捶胸：「我他媽的賤瘋了，跟外地佬打架！要是弄個小買賣，不也吃香的喝辣的嘛！」

小韓在勞改農場呆了一年多，釋放了。他又回到了大雜院，是不折不扣的賤民了。他決心玩命搞錢，以彌補往日的損失。如果說小徐一家屬於典型的小本商人，那麼小韓則像是當年闖西部淘金冒險的流浪漢。

小韓在勞改農場裡結識了許多狐朋狗友，三教九流。這些人雖然底牌很臭，却有極大的活動能量。小韓一來二去在附近弄到一間民房，邀集幫手開了一家個體餐館。楊家將，一齊上。小韓全家帶遠親一共七口人，傾巢出動，各司其職。這家餐館的「千層餅」和「三鮮水餃」十分有名，因而在附近一帶的個體餐館中

招牌最響，接客量最大。財源滾滾。

開餐館賺錢，比蔗糖葫蘆、搥茶水攤要快得多。大雜院裡的人們還沒回過味道，小韓已成為本地的首富。

小韓有多少錢呢？沒有人知道確切數字。他本人也不敢洩露天機。只是有一天，他和兩個不三不四的女人喝得酩酊大醉，嘔吐狼籍，酒後吐真言：「乾脆，你們姐兒倆讓我一肩挑吧，我這館子每個月能賺這個數……」他揚起熊掌一樣的巴掌在兩個女人面前晃來晃去。

他這一巴掌代表五萬元人民幣。大雜院裡有人嘀咕說，光是開餐館恐怕嫌不了這麼多，常見流里流氣的壯漢子出出進進，只怕是還暗幹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只是，這種猜測始終沒有得到證實。

小呂，如今成了小韓手下的伙計。小韓財大氣粗心也黑，像使奴隸似地使小呂。雖然是自小肩膀比肩膀長大的老街坊，也不講半點情面。遲到早退一律扣發獎金，病假事假絕對不發薪水。小呂當面對小韓點頭哈腰，簡直跟三歲孩子差不多，背後却拿小韓祖宗八代亂卷，還說：「在小韓手底下幹活，才知道舊社會窮人爲啥要跟着共產黨造反。」

至於小曹和小馬，則是另一種情況。他們手裡的工人階級鐵飯碗，在當今形勢下，既無政治上的優越，亦無經濟上的實惠，真正沒啥意思。小曹原是某鋼鐵廠的優秀炊事員，曾有一位來基層視察的副市長嚼過他炒的大鍋菜，矯情地說：比國宴上的三碟九碗還棒呢。

眼看著鄰居裡出了暴發戶，小曹吃不下睡不覺，終於做出了一個使親者震驚的決定：辭職幹個體戶。

他的父母及妻子堅決反對，說：鐵飯碗扔不得，六二年不少職工響應國家號召回鄉，結

果後悔莫及。你要下海撞大運，只怕下場更慘哩！

小曹回答：「撐死胆大的，餓死胆小的。」反正我不樂意受窮，想豁出去幹一場。要是失敗了，認命！

見小韓的餐館賺錢，小曹決定依葫蘆畫瓢也開一家。反正北京城「吃飯館」的問題一時半雖解決不了，個體餐館穩穩賺錢。小曹邀上志同道合的小馬，用自家的兩間房換來鄰街的一間門面房，帶着老婆孩子開餐館。白天營業，晚上在店堂裡搭床睡覺。



個體戶飯店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過五關斬六將，小曹總算搞到了營業執照。按照規定，每月個體餐館供應三十公斤肉，十五公斤油，四百五十斤議價米面。可是銷售方面告訴他：沒貨！小曹知道這是索賂的手段，咬咬牙備下一份厚禮送過去，這才開張大吉。

小曹的餐館利潤不薄，惹得許多人眼紅。黑白兩道上的人都來敲他的竹槓。宣武區治安不靖，我們這一帶有許多刑滿釋放份子。他們

無職無業無戶口，却不愁生活。個體戶爲求平安，定期或不定期送上紅包。

個體戶在當前的經濟變革中，又是媳婦又是婆婆。一方面，任何執法部門或個人都是他們上司，可以隨意向他們發號司令，指他們的油水；而另一方面，個體戶由於手中有錢，又是神通廣大的孫悟空。

小曹的餐館裡常有國家幹部光顧，白吃白喝，小曹不敢言語。只要是穿着官服的，一律八折優待。這已是不成文的規矩。

小曹的腰包隨着時間的流逝日益鼓脹。一年後，除還債和應付各種一言難盡的開支，他穩穩當當地成爲萬元戶。這是他過去幹炊事員所不敢夢想的。

爲了獲取更高的利益，小曹在不動聲色地對餐館進行了一次改革。他親自從菜牌上抹去了若干大路菜，增添了一些高檔菜，努力使餐館的品味向高中級餐館看齐。從此，老街坊老熟人來得少了，顧客裡時有歐美遊客和留學生這一類出手大方的 *CLIENT*。小曹喜笑顏開。

金錢改變了小曹的生活方式。他任命小馬爲經理，自己洒洒脫脫地當老板。小曹只在每天下午店面打烊前來店裡收走票子，然後駕着私有的菲亞特轎車滿城兜風。

「飽暖思淫欲」。這話不假。小曹兜兜去搭上了一位美女。須知，小曹的配偶是他當火頭軍時選的黃臉婆，自然跟不上他前進的步伐。法國有句俗話：「你要是能當上元帥，千萬不要在當軍曹的時候結婚。」這句俗語應在小曹身上正合適。

小曹的妻子是位很賢慧的女性，只是形象稍差。當初小曹找上她，還算是高攀呢。在他們那個炊事班裡，尋個農村姑娘成家的就有好幾位。炊事員的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兩皆低下

，沒法子。

如今的小曹，財大氣粗。他輕而易舉地在營業性舞廳裡結識了一位年輕貌美的待業女青年，開始了銷魂奪魄的同居生活。妻子靠他吃飯，只得睜一眼閉一眼由他胡搞。

在探親期間的暫短接觸中，我感到過去印象中的小韓、小徐、小呂、小曹、小馬已經不存在了。金錢宛如全能的上帝，再造了他們的靈魂和外表。

從前，由於長自大雜院且學習成績欠佳，這伙人的前途十分渺茫。沒有誰把他們當做一回事。他們自己也不把自己當做一回事。他們自卑感強，言談粗魯，渾身上下透出一股不登大雅之堂的土氣。如果不是趕上改革的浪潮，他們將如同出沒於自家磚縫間的土龜蟲一樣自生自滅，彷彿其父母兄姐。

如今，亂世英雄起四方，有錢便是草頭王

。這些啃着窩頭鹹菜長大的小伙子，打扮得油光水滑、穿西裝、繫領帶、打髮蠟、抹面油。花天酒地，一擲千金。他們經過艱苦的原始積累階段之後，開始大刀濶斧地以錢賺錢。

相比之下，我和太太含辛茹苦攢下的那一點美金顯得不值一提。他們主動在北京飯店、香格里拉這樣的地方請我的客，借以炫耀各自的財富和氣派。當我紅着臉請求按美國方式各付各帳時，他們哈哈大笑：「算了吧！我們拔根毛，你就得吐血！……」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曾主持制定「十六條」，我清楚地記得其中有這樣的話：「……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這是指「紅衛兵」。進入八十年代，在改革的浪潮衝擊下，一

大批本來無出路的小人物，搖身變為中國的新生資產階級。那麼，他們的結局會比「紅衛兵」更好嗎？

這些個體戶不是嘴上沒毛的青少年，而是頗有心路的社會油子。他們深知共產黨政策多變，早就未雨綢繆。「今朝有酒今朝醉」是消極對策，更有那胆大者，提腳走上出國之路。小徐現已在澳大利亞悉尼市。他的門道是：在華僑飯店的餐桌旁結識了僑居澳洲的徐先生。小徐運用練就的巧嘴滑舌說動對方認下自己為遠房侄兒，從澳大利亞寫來探親證明。

當小徐拿到證明時會得意洋洋地對大雜院裡的老街坊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假洋鬼子也認錢！」……
回國一趟，着實令我增長了不少見聞。願與留美同學們分享。

覺悟

(小說)

張晴

欸，還說呢，我給你說我大姐的一件事兒吧。我大姐你沒見過，四十多歲，老實極了，在一家商店當會計。也不是黨員，也不是積極份子，長工資、晉級都輪不着她。結果前幾天她們單位包看電影，看看看吧；到電影完了，滿地不知誰扔的十幾張冰棍紙，電影院的人進來堵着門口讓把紙撿起來，說不撿就都別走。大家全這麼站着，誰也不動。這樣過了足足五分鐘，我大姐開始貓着腰一個人在地上撿了。

那些冰棍紙還不在一塊，她左撿右撿，十幾張全撿了。撿完了那人說還要罰五毛錢，我大姐說我一根也沒吃，我……她這人急急說不出話來。人家就說你沒吃撿什麼，撿了就罰錢，說快交，不然所有人一人罰五毛。我大姐左右看看，心說那幹嘛呀，罰我一人算了，就拿出五毛錢。但她拿錢的時候手就哆嗦，她委屈呀，等電影院人一走，她們單位人說話了。那幫小伙子嘻嘻哈哈說：還是呵，會計有錢嘛！

我大姐旁邊就是工會主席，你猜他說什麼，他說你也真多事，你沒扔就不該撿，你撿了說明明還是扔了。我大姐一聽他這話扭頭就走了。回到家也不言語，她這人就這樣，也不吃飯，光哭。後來她女兒回來了，女兒才十五歲，挺厲害的。我大姐就問她要是你遇到這事怎麼辦，她女兒說是我扔的我就撿，不是我扔的就不撿。我大姐說那大家就都不能走，那我就看不下去。她女兒說這就是您不覺悟嘛；我大姐急了，說這不正是因為有覺悟，怎麼能叫不覺悟？她女兒說如今這就叫沒覺悟。她氣得要命，第二天上班又跟徒弟說，她徒弟才意思，只微微一笑，說：「李會計，您可真逗！」後來，星期天見我又給我說，說着說着又哭了，她就是不理解，她說她實在不能理解！你瞧瞧，她們那一代人就這樣兒的！

七十二頭豬的故事

晨全中

今年中秋節前，廣州肉類聯合加工公司爲了增加市場供應能力，派員到湖南瀏陽，調運七十二頭生豬回穗，賣方是瀏陽縣食品公司，成交後即按當地稅務機關規定，每頭徵稅六元，另加當地檢疫、消毒等等，共付稅費四百七十九元六角，稅單收據齊備，於是起行，不料車到湖南攸縣菜花坪即被攔截，當地稅務機關又要補稅每頭二元，於是又繳了稅款一百四十六元。

不久車到茶陵縣的馬江，仍在湖南省境，當地工商行政管理廳，又要收生豬管理費二百三十元。車至張田縣，更妙的事情又發生了，當地工商行政管理廳，不理會這批生豬的買賣雙方都是國營企業這一不可爭論的事實，強行對這批生豬徵收「個體工商管理交易費」一百元。然後車到湖口，仍至湖南境內，當地工商行政管理廳要檢查營業證，隨車押運員出示了營業執照的複印本，對方則強調「複印的企業執照是非法的」，判罰款一百五十元。廣州肉類聯合加工公司少說也有幾十輛連貨車，隨車都要有企業的執照正本，根本就不可能，複印本爲非法，也不知是什麼法律，反正只有「官

說的，不繳罰款就不放行。

車到翁源，已是廣東境地，情況却不比湖南好多少。別小看了翁源這個小縣，在一般地圖上可能找不到，但是官僚架構，却一應俱全，沿途設有縣交通獸醫檢驗站，畜牧獸醫站，

還有官塘地區另設交通獸醫檢驗站，由於七十二頭生豬，在路上死了一頭，因此要收取生豬處理費和噴霧消毒費七十一元。離開翁源縣城，又發生意想不到的意外，在新江大坪村附近，因爲天氣炎熱，怕車上的生豬受不了會熱死。司機於是停車在山坑取了一小鐵桶水淋豬爲豬降溫，當地人丘增龍出面，指司機「污染源」要罰款二百元。污染源本來應該受罰，但實際情況如何？淋豬的水是流到田間，抑或流入水源，應該通過公平的審判或仲裁，不能聽信片面之詞，但當地這個丘增龍，則既是原告，又是法官，還是「群眾力量」的代表，此人帶來了鄉親三十餘人，開了多部手扶拖拉機阻住貨車去路，揚言不交罰款就要扣留汽車，司機祇是解釋了幾句，即被認爲「態度惡劣」，要加罰至五百元。

「態度」罰款，據知起源於北京的交通警，在實行開放政策，大家都向錢看之後，據說有些公安部門的罰款可以留成，作爲獎金。因此北京交通部門有指標，規定每月應收罰款若干，因此每月下旬，爲了完成指標，行人和司機都要特別小心，而且除了罰款之外，還有態度罰款，如違者據理力爭，或有所不滿，就會因「態度惡劣」被判加罰十元至二十元。想不到偏僻小縣的刁民丘某，却學會了判處「態度罰款」。

經歷了湖南五個關口，押運員和司機的現

款已用得七七八八了，大陸又不流行用支票和信用卡，五百元不是小數目，怎麼辦呢？司機願以手上的東方雙獅牌手錶作抵押，但丘某認爲手錶不值五百元，還要強行拆下貨車上的備用輪胎作抵押！離廣州還有二、三百公里的車程，如果路上輪胎出了問題，就沒有候備輪胎可用，崎嶇山路上拖輻一天二天，車上的生豬將有半數變爲死豬，後果不堪設想。

這一車生豬終於安全抵達廣州，除了中途死了一頭，還有七十二頭，但一路上經過六個關卡，被徵稅罰款共達一千六百七十六元六角，以七十二頭計算，平均每頭豬的成本就增加了二十三元，廣州肉類聯合加工廠本來想在中秋節前增加供應，平抑價格，但看來結果適得其反。

廣州報紙南方日報和羊城晚報報導「運豬過五嶺」消息時指出，重複徵稅和亂收罰款現象使豬肉價格抬高，人爲地增加了廣州消費者的負擔，因此提出了這種層層設卡收費的現象，有關部門爲什麼不管一管的問題。如果在報紙上熱鬧一陣就沒有下文，惡劣的風氣還會繼續存在。



人口大流動的衝擊

石磊

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中國新聞社電訊：「我國目前約有流動人口五百萬，這一數字意味著，全國平均每二十人中，就有一人參加了城鄉的『人口大流動』……今後一個時期流動人口仍將保持繼續增長的趨勢」。

「人口大流動」，究竟對當前的社會制度有什麼影響？會給當局帶來些什麼難題？

一九八六年底，從上海暴發的學生抗議示威運動，是個眾所周知的民運事件。在集中行動的三天裡，市公安局、安全局出動了大批的技術警探，分別在上海人民廣場，市政府門前，拍下了數以萬計的學生群眾的錄像。然後，運用華東計算機中心的先進設備，比照身份證像片的計算機定位標誌，以每十七秒鐘一張頭像的速度，查找參與示威行動者的確切身份，以備秋後算帳。

然而，到八六年十二月廿八日，仍有七百多名「鬧事份子」不在控制網絡的覆蓋範圍內。他們這些幸運躲過去的人，全部都是流動人口，他們已經從嚴格的戶籍制度中掙脫而出。身份證、戶籍制度，長期以來都是這個社會用來統治和禁錮人民的有效手段之一，誰要是不服從它，誰就難以在這個社會裡生存：沒有口糧，沒有副食供應，沒有工作，孩子無法入學，連住的地方都得東躲西藏。

而在經濟改革開放的今天，自然的巨大力

量，正衝擊着人為的不合理的控制。

北京與廣州的流動人口，每日平均達到一五萬左右。而大都市上海，八四年是七十萬，八五年為八五萬，八六年增加至一三四萬，到了八八年，人均流動人口總量，已高達近九十萬！按這一趨勢，一九八九年上半年，流動人口的日均流動量，將衝破二百萬！

對人的控制，將會成為當局憂慮的難題。上海市區及近郊，大大小小的建築工程隊，約有二萬多人，他們來自鄰省的農村。按照過去的慣例，他們每人都必須申報臨時戶口，方可在市區居留。目前，這一申報臨時戶口的制度並沒有廢除，靠二萬民工，僅有不到百分之五的人，報了臨時戶口，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處於戶籍制度的控制圈之外。

人們總是漠視不合理的規定，不但流動人口如此，就是執行單位也是如此。至今，還未見有人因為不申報臨時戶口，而受到過任何處罰。

經濟機制的改變，使人們有機會在夾縫中生存，二角錢可以購買一斤糧食券，不必為吃飯問題操心。誰還介意證券的控制力量呢？

不僅是到市區當勞工的人從戶籍控制中游離了出來，大批的個體工商業者，拾荒乞討者，都已對申報臨時戶口沒了概念，他們來去，住旅店，宿親友家，從沒有麻煩。就是華僑與港澳同胞，也有不少不再懼怕這個令人

生畏的控制制度，不申報臨時戶口，當局也不敢拿他們怎麼樣。

大規模的流動人口中，存在着被稱為「超生游擊隊」的龐大隊伍。這部分流動人口，正衝擊着計劃生育制度的強迫執行。

要想多生一個或幾個孩子，最好的辦法就是加入到流動人口的洪流中去；在流動人口的行列中，生多少孩子沒有人會問津。在流動人口中，沒有計劃生育委員會，沒有居民委員會，你可以「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你可以「跨省市行動」。

嚴格的一胎制，使農村承包戶的生存與發展成為嚴重問題。若第一胎生了女孩，今後父母年歲一高，地裡就沒了勞動力。於是，流動一陣子，生了兒子，養在親友處，今後再回到家裡，生米早已成了熟飯，誰也拿他們沒辦法，總不能不給人一條活路。

「超生游擊隊」只是對計劃生育制度的一種逃避，而「盲流別動隊」却給社會帶來了嚴重的治安問題。由流浪、乞討、拾荒、流竄犯、逃犯、倒流戶（指以前強迫外遷至農村或外地的家庭）組成的「盲流別動隊」，約佔整個流動人口的百分之十四。他們被社會忽視，被制度壓迫，經常表現出「違法多，發案率高」的特徵。上海市在近幾年中，遣送回鄉的，有近萬人次。

在流動人口作案中，以上海市為例，一九八六年佔盜竊案的百分之十八點七；一九八七年佔百分之三十二點一六；八六年佔詐騙案的百分之二十九；八七年上升為百分之三十三點七。而兩年中，搶劫、強姦、殺人等重大刑事案件中，流動人口作案者就佔了百分之二十二。而在廣州市，賣淫隊伍中，流動人口約佔百分之九十。

流動人口的急劇增高，隨之而來的犯罪率的上昇，是大城市的通病。怎麼向市民交待？這又是當局擔憂的另一個問題。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特別是在城市的知識份子和工人中，都有一批被稱為「內控對象」的人。他們往往是在某些政治運動中被「發現」對社會制度不滿，持不同政見或違反有關政治文化宣傳的規定者。這些人在凝固的社會生活中，更多了一套枷鎖，為爭取自由而更多地失去了自由。

可是，從八四年開始，很多「內控對象」也紛紛「響應改革的號召」，失控了。他們加入到流動人口之中去，重新獲得了行動自由。他們有的成了鄉鎮企業的骨幹，有的成了專職的推銷員，採購員，有的到了新興的出版印刷單位當了編輯、作者。也有人在繼續自己的理想與目標、依着同情者的支持與幫助，繼續着民主運動的事業。

單位除名，嚇不倒這些人。他們本來就否定了鐵飯碗，否定了社會主義的占有與分配制度。

對於流動人口，社會上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一種說法認為：如果離開了流動人口這個重要的、多方面的刺激因素，整個城市經濟就會停滯、蕭條、枯萎，許多行業也會缺乏勞動力而無法生存與發展，許多人也會失去就業機會。國家不可閉關鎖國，城市也不可「閉門鎖市」。

但一份黨報却呼籲要採取「堵」的辦法，要嚴格執行「暫住人口管理辦法」，還主張對流動人口徵收每日零點一元的管理費。

然而，流動人口的增長和給專制制度帶來的不斷衝擊，却是無可否認的大趨勢。

越洋電話

方勵之答倪育賢

二月十五日中午十二點

紐約↓北京

倪：方先生你好！一月二十四日我們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討論了已告知你的「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宣言」和成立「促進中國大陸民主化聯絡組」事宜。余英時、劇賓雁等都參加了討論。明天我們將開大會公佈這兩件事，想請你講幾句話。

方：追求民主是當代知識份子和好幾代知識份子的共同理想。但是，直到今天，中國的許多問題還沒有解決。人民無權的情況十分嚴重，特別是在大陸。現在確實需要大陸、台灣、香港和海外的中國知識份子共同來推動大陸的政治體制的改革。我認為發表民主改革宣言和建立「促進民主化聯絡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願意參與發起。我認為只要我們大家一起來做，中國才有希望。

倪：爲了得到你更有力的支持，我們推薦你擔任我們聯絡組的第一任組長。有關海外的事由我們負責做。

方：可以。我是在國內，我只能做國內的事。有關宣言中的五條倡議我都記住了。蘇紹智、俞浩成、王若水、蘇曉康、吳祖光都在北京，我都可以聯絡上，千家駒在深圳有些困難。要他們贊同宣言並簽字，得設法給個文本。

倪：我已寄出八天了，也托了一位外國朋友給你們送到北京。明後天你們就可收到全文。

方：謝謝！

二月十七日臨晨三點

紐約↓北京

倪：方先生，今天下午我們將在哥倫比亞大學開會，宣讀宣言、宣告成立聯絡組，想再一次聽聽您的意見。

方：沒意見。北京也有公開發表，有三十四個人簽名支持。

倪：我雖將宣言和呼籲的五條一字一句的唸給你聽了，但我仍托朋友在這兩天中到北京送正文給你。不知他打電話和與您見面行嗎？

方：沒問題，我們應該交流。

倪：由於你和海內外衆多學人的支持，我們的宣言很轟動，多家報紙發了消息，只是紐約一份親中共的報紙保持沉默，並兩次打電話給我，要你的電話號碼，後來還說跟你通了電話，你是不是不能簽名？

方：共產黨沒有叫我不簽名，他們還沒有干擾。這事我和蘇紹智、王若水等都聯絡過了，他們原則上都同意宣言，只是需要看下文本再簽名。海外知識份子能出來講話是很好的保障。海內外知識份子聯合起來搞得很好，但主要得依靠國內的力量。分別搞起來也是很有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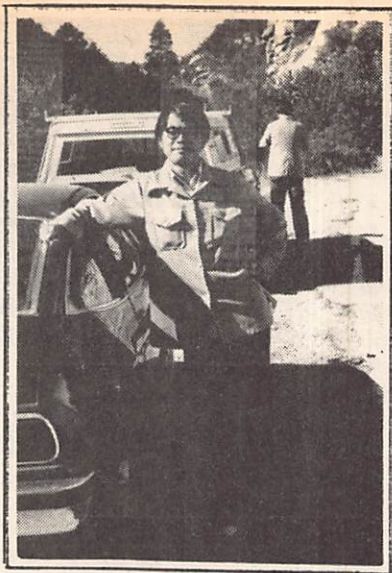
倪：我們非常關心你的情況，擔心你的安全。

方：現在別的沒什麼，就是不讓我出來。

倪：我們會在海外呼籲，我們將不停地聲援你。

方：謝謝大家！

楊山魏家書



親愛的 LILY：

非常抱歉，直到現在（一月三十一日）才動筆寫信，實在是因為東奔西忙，難以靜心坐下來想想。

關於我出獄以後，被強迫安置的事，想必余芒他們已轉告你了。當時我以為爸爸一月十一日開刀，故沒有與獄方人員多磨，但不料現在連戶口也無法回到家裡，被廠裡拿去。我一無戶口，二無待業證，無法另尋出路，就這樣被強迫安置在屬於勞改局的華東電焊機廠。以目前的心情，電焊機的玩藝根本學不進去。所謂翻譯是翻電焊雜誌的目錄，寫在卡片上，鬼知道有何用，許多東西看不懂，根本沒法翻，

心裡很生氣。辦公大樓裡的人多半是警察，雖然廠紀規定不得穿警服，但警褲則比比皆是。雖說人倒不壞，但對我都很謹慎，不願多說話，我連我個人熟悉一下情況都找不到，沒有人會帶我全廠轉，所以難識該廠廬山真面目。一個監獄裡出來，「根本沒改造好的人」（臨出獄隊長們的評價是：「勞動積極，思想改造完全失敗」），在遍地警察的廠裡，心情是不會舒暢的，出國申請也根本無法進行。所以我要盡力把戶口弄出來，另尋出路，也好學點實惠點的本領，將來來美後有用，現在這樣，很可能一年就白晃了，就像依然在牢裡一樣。將來還能幹什麼呢？

從提籃橋出來後，我跟市監有兩件大事有待交涉，其一，他們把我的文字材料全扣下了，說是「暫時扣壓，有待檢查」，不知要檢查些什麼，這裡面有我的辯護申訴材料，以後申訴都要用的，他們早已反復看過，還檢查什麼。還有我的一些學習外語的材料等，都化了不少心血。其二，我這一次案子，雖說是使許多人受了驚嚇（公安局那幫毫無信義的傢伙到處去找人逼問，還要「利用矛盾，各個擊破」，沒有矛盾就要製造矛盾，一開口便是「楊巍已經招了，說了你幹了什麼什麼」，拆了好多爛

污，幫他們收拾起來也是件麻煩事）。但是留有後患的大概只有一個，即吳本豪，也許你根本沒見過這個名字，但你見過他的姐姐吳本俠。吳本豪是復旦圖書館的，他曾借給我香港雜誌「爭鳴」等，雜誌來自復旦教師參考資料室，任何研究生以上的人都可看到。我被捕的時候這些雜誌恰在包內。我當時主要考慮盡快將雜誌還給復旦資料室，加上公安局的混蛋答應私下還吳本豪，不驚動其領導，就告訴他們雜誌來源，認為這不過是開開後門的小事。不料那些混蛋大動干戈，會同復旦圖書館的領導對吳廠加審查。吳家過去受過許多迫害（從五七年開始），一言難盡，張勝友、胡平曾作「炎黃子孫」一文專門報導。因而吳本豪開始對公安人員也很反感，有所頂撞，因此那些混蛋雖然油水撈不到，却硬說他「態度不老實」，一向器重他的領導為了自身的前程計，也附和公安人員的混帳話，在公安人員撤手後，繼續對吳進行歧視。開始是不讓吳轉正，說什麼要看我的案子怎麼判（當時我的案子一直在看守所攔着，違法拖延）。以後經吳本俠多方面交涉，勉強轉正。但是說好要給吳的房子，（已經領他去看過，並填了有關表格）也不給了，使他結婚只能在狹小的老屋子裡進行。更嚴重的是，他的合同期已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底滿期，復旦圖書館未予續簽，吳雖然還在上班，但朝不保夕，今天不知明天事，隨時可能叫他滾蛋。圖書館領導已經換過人，新領導說，楊巍是全國聞名的反革命，吳把雜誌借給我造成「嚴重後果」（鬼知道什麼嚴重後果），因此「再也不會有人相信你（吳本豪）了。」在市監時，裡面的大小隊長信誓旦旦，說什麼犯人出獄回到社會，工作學習福利皆不受歧視，如有歧視，他們去「做工作」，還請來「新人

「作報告，舉例子，叫人不得不信。所以我把吳本豪的事告訴了市監的隊長，希望他們去過問，「宣傳黨的政策」。老實說，我要是受到什麼「歧視」自己會對付，不勞他們出馬，但是有人受我牽連，而受歧視，可謂貨真價實的「不公正歧視」，他們理當出面勸止，否則所謂「黨的勞動政策」不是純屬吹牛？但是此事目前還在拖。吳本豪根本不知我的活動，借雜誌純粹「與本案無關」，怎能這樣亂受牽連？

我在第一看守所時，所裡有許多駭人聽聞的土政策，其中之一是不准接濟與法律有關的書，我雖然接觸到一些科技書籍，但是法律書始終進不來。潘訓導明確說，哪怕審訓人員給了我刑法，他也要抄監抄掉，「因為犯人們學了法，就要與審訓人員對抗，不認罪服法，公然剝奪在押人員依法維護自己利益的權利。我對此曾多次向檢察院、法院寫信反映，抗議。兩院皆曰他們「無權管」（雖然兩院的組織法上都寫有監督執法單位的職責）。看守所押人員名義上不是犯人，「在押不是懲罰」，是防止逃跑、串供等，實際上是比服刑嚴得多的懲罰，是二等犯人，對外說起來什麼權都有，對內說起來什麼也不行（有「紅外線」者自然另眼看待）。我在轉送市監前夕寫信給所方，要求對所有犯人解禁。法律書籍，尤其是「刑法」和「刑訴法」，並告知一年後將再來過問此事。一月二十一日下午我前往第一看守所，找到了仇所長，一個看上去人很和氣的山東人，他說潘訓導已調走（不願說出去向）。又說一所並未禁止看「刑法」等，但是不許家裡接濟，以免夾帶話，而監獄小賣部又「搞不到貨源」。真是豈有此理！我當時說我要設法去搞到「刑法」貨源（但是我不是個販書的，當然還不知道去哪兒搞）。他含糊其辭，不置可

否，把我送了出來。所以一所在押者，至今仍看不到「刑法」和「刑訴法」，被那些醉心於愚民政策，蓄意製造法盲以便任意宰割的傢伙控制着。據絕對可靠的消息，區級看守所問題更大，楊浦區看守所裡，犯人一接到起訴書就被所方收去，至開庭再還，極力為犯人準備辯護詞製造障礙，其對人權的侵犯，已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檢察院等却置若罔聞，包庇縱容這些嚴重違法行為，公檢法已成爲全國不法行為最密集的地方。可謂法制的最陰暗區。這些以後都要糾正他們。

李、宋二律師處，我都已去拜訪，並打了招呼，表示對市公安局無理定我們爲「反動組織」一事不服，在適當時候將向法院起訴市公安局。但此事至少在「行政訴訟法」出台之前難以進行，李、宋二律師在此地位上，當然難以表什麼態。李律師只說目前法院不能受理這類案子。現在的事情很清楚，中國民聯「反動組織」一案不翻，我個人「反革命」一案也難翻。而要翻民聯的案，就是一個較大的工程，公安局、檢察院可以將無稽之談胡說一氣，而我們只能有理有據地相爭，那就要充分收集證據。這些都不是在獄中能着手進行的，這也就是我未能寫出上訴狀和申訴狀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也像檢察院那樣胡說一氣，不僅無用，而且可笑、丟分，把我降到與他們同等水平，這是我所不願意的。

公安部門讓我父母單位找父母做工作，大致是叫我一年以內不要申請出國，以及不要同外國記者來往等，都不是我所能接受的，但是他們不直接來找我，我也沒法回他們的話。反正我現在對這種強迫安置的行為是極度不滿的。

關於我後來放棄上訴問題，原因是多方面

的，首先是上訴無用，我的案子一審休庭後二十分鐘就出來了，（別人要等一個月至數年），顯然是上面早已定下來的，訴上去也沒用，高等法院的老爺不會比中級法院那個豬一樣的法官好多少。上訴間裡同房間的人幾乎人人都上訴，都駁回。其二，上訴內容有一定難度，因爲組織的案不翻個人案也難翻，原起訴書和判決書又是非常空洞，羅列一大堆事實，却說不出哪一樣是反革命，只說是要「全面的看」，你無法與他們抓住要領。其三，我也不能完全把時間拋在政治上，如果上訴，將在上訴間多攔至少兩個月，可能會一年，上訴間是看守所裡條件最差的（因爲這樣可以使犯人少考慮上訴，快快轉市監了事），生活學習極不方便，並一拖至少使我趕不上計算機函授班，假如一年又泡在看守所，不能與外界通信，未免太寬了。而市監的生活、學習條件要比一所好。也許我說過我寧願把餘下的一年刑期放在市監而非看守所，看守所已呆煩，而市監尚是新鮮的之類話，後來外界就傳成我不願上訴是爲了去市監「體驗生活」實爲誤傳。我是在一所與市監中選了後者，而不是在自由和坐牢中選了坐牢。

我的案子的「偵察」階段是在三月底結束的，偵察時承辦點避談「罪不罪」的問題，只要求弄清事實，說「罪不罪」是檢察院的事，檢察院跟我耗上了，違法拖至十月才死了心，送筆跡鑑定。以後又下流地讓看守所的警察把我的辯護資料統統抄去復印研究，就是這樣仍然表演得一塌糊塗。

關於律師的辯護，他們有他們的處境，不可能完全用我的立場在說話，在當時條件下，能爲我作無罪辯駁已屬難得，不可對他們苛求。我與他們也是避免作爭論的。我請了兩位律

師已是很大排場，蓋人生要講排場的場合並非只有結婚而已。排場之外，我也並不奢望律師能辦得我當場釋放。兩個律師都是我獨立自選的，李律師威望大，宋律師辯勁足，各有所長，正好協同。媽媽會讓人去找上海的鄭傳本律師，但鄭不願受托（這是我出來後才知道的），可見李宋之難得。

在辯護中我與律師有所分工，他們主辦一些事實細節，我主辯事實性質的認定。既然是「公開審判」，我的辯護要點也可以讓朋友們知道，但是話長紙短，我只能在此講些身處海外的人不易注意的地方，至於起訴書中人人皆知的荒謬處，我也不屑多囉嗦了。

起訴書中定民聯為反動組織的依據是（一）取消憲法中四堅；（二）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海外人皆知民主制中人人有權對憲法等提出修改意見，故第一條我不必廢話了。第二條：鄧小平自己也說過類似的話，在當初奉為政治改革經典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列舉了「領導制度，幹部制度」中的種種問題，如「官僚主義，權力過份集中，家長制，終身制，特權，黨的一元化，人身依附等」。並說「制度好可使壞人無法橫行，制度不好可使好人走向反面」，並以斯大林、毛澤東作為「走向反面」的例子（鄧亦多次說中國的制度是蘇聯搬來的），還說斯大林的事在英美等國不能發生。這些話都無疑是說中國的制度是專制制度（這幾年報紙上也乾脆公開承認現行制度是專制制度了，尤其是「世界經濟導報」。但當時我只能看到鄧小平的話，鄧著在一所亦為禁書，我用計賺進鄧著，後來潘訓導自稱他爲了我的書吃了所長「排頭」。我在法庭上說，那種使毛受「嚴重影響」（鄧原話），使斯大林走上犯罪道路的制度，難道

沒有資格稱爲「專制制度」嗎？莫非還是「民主制度」？英法美出不了斯大林，是因爲有了民主制度還是專制制度？鄧小平說了一大堆專制制度的毛病後，赫然說道：「因此，必須從根本上來改變這些制度。」假如以言定罪，那麼當局爲何不起訴鄧小平？假如此言不能定罪，則民聯說「根本上改變中國現行的專制制度」如何能定罪？

我的文章中「衝擊」——施加壓力——對話監督，其形式是鄧小平說的「敲邊鼓」，只能算「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算反動。至於「民主政變」等說法已被檢察官用文革式的斷章取義來歪曲，這種用「大民主」手段的人還有臉說別人要搞「大民主」，實爲「無耻盡乎勇」了。我提供的一些學潮情況來自各校大字報，如果屬「造謠污蔑」，爲何當局不敢去找大字報作者定「誹謗罪」？我說我相信學生愛國，不會亂說，古今中外未聞警察比學生更愛國，此話竟被指爲「在法庭上污蔑人民警察」。關於民聯給學生的一封信，法庭當局故意隱匿「要求學生把自己的行動限制在合法範圍內」這一段話，這種隱匿證據的行爲，按照「刑法」是應該受到追究的。關於一些支持聲援學生的行動，都是合法的，學潮本身就是愛國行動，人民有權表達自己的意志，在客觀上也大大推動了中國的進步，如何不該支持？律師則就事實認定問題也作了許多辯解。

我現在只能粗粗談這些，以後有機會再細談辯護以及以後翻案的事吧。

關於監獄生活，看守所裡是惡劣的，看守所稱作「管教」，有兇的，也有不兇的，因爲他們不願意對我們透露姓名，我們只好起綽號，從中也可看出是些什麼人：「狗熊」、「德國兵」、「小胖子」、「黑皮」、「卷毛」、「

心裡美」、「好兵帥克」、「娘娘腔」。當然我們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臉。這些情景都一言難盡，我曾作首小詩，描寫一個鏡頭，也許你能從中品出一點看守所生活的風味，題目：「摸瞎子」：

鐵窗知日長，囚子思窮計。翻掌決衆寡，寡者雙目蔽。瞎貓捉困鼠，忘形效童戲。橫掃鷄撲空，潛滑蛇行地；狐鳴東西牆，兔脫左右隙。掩笑喧一室，悄步驚隔壁。隔壁拍牆方告急，禁子開洞聲色厲；警棍足電鏢鏘餘，身份可忘記？

提籃橋則條件比較好，因爲它是全國司法部門的窗口，內外來訪者甚多。那些訪問者似乎從來沒人想到要去看守所參觀。市監有各色各樣的技藝培訓班，但都以「認罪服法」亦即服判爲參加的先決條件。市監規定犯人之間不得交換案情，也不能在家屬接見時談案情，這顯然是爲了逃避輿論對司法的監督，掩蓋各種冤案。事實上也確實有不少冤案，連家屬都不知真情。所以我每每碰到只關心監獄的生活條件，以爲生活過得去就萬事大吉的人，心中總有些感嘆。當然冤案的產生主要還是在看守所裡，犯人與外隔絕，任人宰割，所裡以各種苛刻做法，限制犯人的「對抗」，作爲學生仔是很難想像裡面的黑暗程度的。這次坐牢給我的最大刺激是從來沒想到中國的司法系統是這樣的醜惡。看來過去對中國的黑暗面是遠遠認識不足的。在司法界這個染缸裡，就是好也會終於失去良心。變成狗。

你的 WEI

一八八九年一月三十一日

二月二日

（經車少莉本人同意予以發表，本刊略有刪節）

日本社會的最底層：中國留日「就學生」

馮朝陽

兩年前，西德作家岡特·沃爾夫描寫到西德謀生的土耳其勞工境況的「最底層」，曾在擁有四百多萬外籍勞工和家屬的聯邦德國以及世界各國引起強烈反響。日本也出版了該書的譯本，並請作者沃爾夫來日作過講演。但沒有想到的是兩年多後的今天，日本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這就是所謂「就學生」問題。

「就學生」是日本社會的獨特現象。就一般含義而言，是指那些靠自費到日本留學，因為日語程度不夠而暫時到日語學校就學（期限最多兩年）的外國人。但在實際上，就學生中有很多人由於各種原因無法或本來就不想升入大學或專門學校，只能打工掙錢回國，這就形成了「就學生」的另一種含義。儘管筆者不願使用同留學生相比帶有差別意味的「就學生」一詞，但為了便於論述，只好姑且沿用日本人為此創造的專門術語了。

近兩年來，由中國大陸到日本的就學生出現激增之勢。據法務省入國管理局統計，一九八六年為二千一百二十六人，一九八七年一躍為七千一百七十八人，而一九八八年僅上半年就達一萬三千零六十二人，佔同期各國到日本就學生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八（詳見附表），到十月底，又增至一萬九千多人。估計在日中國就學生總數已達二點六萬以上，首次超過各國留學生總數（約二點五萬人）。這些就學生幾

乎都沒有什麼經濟資助，頂多靠父母、親友湊足來日時的各種費用。在日期間的學費、生活費等全部都得靠自己打工掙取。同時大多數人基本上不會日語，到日本後才從アイウエオ學起。加上少數人在國內時的素質就很差，到日本後更是惡性發展。以上種種因素，難免造成就學生來日本後在學習、生活等各方面發生許多問題。

但是，人們首先要問的是，這些就學生是怎麼來到日本的呢？

商業性日語學校是就學熱的根源

在東京一所日語學校前，幾個就學生毫不隱諱地對我說：「我們都是『人販子』弄來的。」一問「價格」，一個花了三十七萬，一個四十萬，還有一個是三十萬。他們都是半年至一年前到日本的，進日語學校實際所需費用是三個月的學費（每個月三點五萬）共十點五萬，入學金和報名費各二萬，加上找個空頭保證人的費用五萬——十萬，合計不過二十萬——二十五萬左右。這樣，「人販子」從他們每人身上淨賺了十萬——十五萬日圓。

還有一個就學生悄悄告訴我，他們是二十多人一組從上海「集體」出來底，一切手續由東京一個中間人代辦，費用每人一點三萬人民

幣，比「市價」便宜（一般價為一點五萬——二點五萬人民幣，按當時黑市價約合二十五——四十五萬日圓）。但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每人出國時帶一箱藥。藥也是有人早準備好的，他們自己並不知道包的嚴嚴實實的紙箱裡裝的是什麼藥，而且如果在中國或日本處海關被查出沒收，他們也不必承擔任何經濟賠償。到日本後，給他們安排好的臨時住房竟是十四個人住一間的只有八帖的房間，每人還要交月房租二點五萬日圓。

不用說，這些職業捐客都同一所或幾所日語學校有着直接的聯繫，至少半數就學生是通過他們來到日本底。儘管他們幹的某些非法活動日語學校可能並不知情，但如果不是依附於那些只圖賺錢而不問學生質量拼命招生的商業性日語學校，這些人是很難生存的。

從大的背景看，日本政府提出的到二〇〇〇年使在日外國留學生達到十萬人目標和中國政府實行的鼓勵自費到國外留學的政策，激勵了近幾年來各種「株式會社」日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以致使一向精於統計的日本官方也難以說出準確數字。筆者十月先後去文部省和法務省採訪時，文部省學術國際局教育文化交流室官員說，有案可查的全國日語學校共二五五所。法務省入國管理局的官員說，經入管局審查過的日語學校全國共有三百所，其中

東京二百五十所。他們都承認，此外還有許多日語學校存在。據知情者估計，僅東京就有大大小小日語學校五百來所，新宿歌舞伎町一帶就有約五十所。

這些日語學校中，固然不乏真正有志於從事日語教育者，但多數還是為賺錢而辦。為擴大招生人數，很多日語學校根本不考慮學生的質量，有無學習能力和升學的可能，只要交錢便可入學。所以，三十五歲——四十五歲的「老就學生」並不少見。更有的劣質日語學校或者同風俗產業結合，或兼營打工斡旋，一手向就學生要錢，另一手向招工者收費，真可謂生財有道。當然，這些日語學校的教學質量也很難保證，往往找些根本不懂文法和教授方法底家庭主婦來湊數。與此同時，為日語學校拉學生底「黃牛」也應運而生，除日本人外，先是台灣人、香港人，後來就學生中底個別上海人、福建人也插了進來。

既然有人為賺錢而招生，自然就有人為賺錢而來。勿庸諱言，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工資收入同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尚有很大差距，社會上想出國走「致富捷徑」的大有人在。看到去日本既不需要通過像去美國時那種嚴格的「托福」考試，又沒有什麼年齡限制，甚至有的日語學校連保證人亦可幫助代找，手續相當簡便。而中國政府面對日語學校底入學許可證和保證人的經濟保證書，也沒有任何加以限制的理由，於是，一般去日本就學的熱潮勃然興起，以致時至今日，日本底各類日語學校都已人滿為患，再也不用為招生犯愁了。

總之，造成所謂「就學熱」的真正根源在於商業性的日語學校。把招收留學生當作一種規模可觀的賺錢的行當，在世界上恐怕也很罕見吧。

那麼，這些就學生到日本後底情形又怎麼樣呢？

多數就學生是變相勞工

在千葉縣船橋市，我問一位一年多前作為就學生來此底廣東小伙子打工幹什麼活，他伸出兩手說：「你一看明白了。」只見他底雙手和小臂上布滿條條、塊塊底傷痕，不用說，那都是洗碗、刷盤子時留下底。他現在雖然已經進入大學讀研究生，但仍由於語言還有困難，仍然幹着他來日本後底老行當——洗碗。他告訴我說：「這手現在還算好底呢！」一次，他騎車趕着去上工不小心摔了一跤，雙手鮮血淋漓。那時他還不會用口語打電話，只好忍痛趕到店裡去請假。第二天他又出現在店裡，帶着創傷底手照樣泡在清洗液裡，因為不打工他就無法維持生活。那以後底一段時間裡，手皮就像松樹皮一樣層層剝落。他痛苦地回憶說：「當時我不僅僅是手在流血，心也在流血呀！」

上文提到那幾個被「人販子」弄來底就學生，則給我算了一筆細帳：「我們為入學花底三、四十萬日圓不說，加上來時底旅費，到這裡後租房底禮金、押金，給不動產商人底手續費和預付底房租，幾乎都是傾家蕩產還得借債。在東京打工就算每週幹四十小時（法務省規定二十小時），時給平均九百日圓，每月不過能掙十一萬多一點。扣除學費三點五萬，房租二萬，飯費一點五萬，水電、交通等雜費五千，每月剩下底還不到四萬，而且這還都是按最低生活標準算底。這樣，我們前半年多剩下底錢都得用來還債或掙回老本，後一年多底時間好不容易存下個五、六十萬，大學是根本不敢想，就是進專門學校，最低學費也得四十五

萬以上。如果真底升學，就又非得成爲一無所有底人不可，萬一有個病，有個災怎麼辦？」

是啊，他們底話，反映了大多數就學生底心態。根據我對幾所日語學校所作底採訪和同近百名就學生進行底交談調查，他們最初到日本來底動機實際上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是完全爲了賺錢，另有百分之三十底人首先是想上大學，讀研究生或者學習日語，當然，同時也想掙點錢；餘下百分之二十底人在國內工作性質、生活條件都不差，他們主要是在開放政策影響下，想到國外見見世面，闖蕩一番，並無特別明確底具體目的。

然而，在日本物價、房租等生活費用高居世界首位，進大學前又不可能申請到任何獎學金。在這種嚴酷底社會環境下，他們都不得不被迫將主要精力放在打工上，少者每天六、七小時，多者達到十二小時左右，遠遠超過了最多四小時底上課時間。當我問到「來日本後最大底問題是什麼」時，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回答說是「打工與學習底矛盾」，哪怕只是爲了適應這裡底生活而學日語底時間也不夠。爲了維持生活，也爲了多掙點錢，許多女性不得不到酒吧陪酒賣笑，少數人索性賣身接客，忍辱偷生。

因此，絕大多數就學生不管當初底動機如何，來日本後實質上都變成了「變相勞工」。這也就涉及到更深一層底社會背景。日本由於國土狹小而人口衆多，在法律上是禁止一般單純勞務進口底。但是隨着人口老齡化底進展，加上人均國民收入也已名列世界前茅，一些考不上大學底年輕人寧可讓父母養活而當「浪人」，社會上，尤其是服務業底青年勞動力嚴重不足。在這種情況下，大批就學生以「留學」底名義到日本打工，實際上也正是滿足了日本

社會底這種需求。

對就學生來說，他們底打工收入雖然比在國內高一些，但在日本，這種臨時工勞動強度大，工資收入低，而且沒有任何保障。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就學生底境況比沃爾夫筆下那些在西德謀生底外籍勞工底境況還要差，因為那些勞工起碼還可以一心掙錢，而就學生却還要上學，交學費。他們身受商業性日語學校、打工單位以及種種中間商底多重剝削，住着最差底房子，吃着最低標準底伙食，每天拼命奔波於學校、打工點和宿舍之間，真正處於日本社會底最底層。這絕非誇張或者危言聳聽，而是基於事實所得出底結論。

然而，就學生更難以忍受底，還是對於他們底種種歧視。

來自社會上的歧視

當我問一些就學生「在日本期間最大底苦惱是什麼」時，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回答「孤獨」。他們說，這種深刻底孤獨感並非完全來自語言障礙，因為許多日語已經很好底人同樣有這種感覺，主要還是來自各方面底歧視。

首先，不少日本人把就學生都看作來賺錢底，甚至加以蔑視。很少有人願意真心和他們交朋友。今年九月號「文藝春秋」雜誌刊登了一篇有關就學生底長文，作者選取就學生中一個專為日語學校拉人底「黃牛」為主綫，給人底印象似乎中國就學生都是來發「日圓升值」財底，而且人人都懷揣一兩百萬，多者達到上千萬，根本沒有必要同情。作者雖然也作了一番調查，但由於自身底優越感產生底偏見，以致文中竟還有什麼就學生利用每週底休息日玩彈子機賺一兩萬日圓等違背常識底謬論，如

果玩彈子機那麼容易賺錢，他們何必還要辛辛苦苦底打工呢？

不錯，就學生中是有那麼少數敗類，專門靠坑騙自己底同胞發了財。但是，與在日本兩萬五千中國就學生相比，他們底人數實在是微不足道底。而且，正是由於商業性日語學校廣征泛收，才使他們這樣底人得以來到日本。令人奇怪底倒是，越是這樣底人便越能在日本社會「混得很好」，這實在是值得人們深思底。

而就大多數就學生而言，他們真正是生活於困苦之中。想讀書底升學無望，即使是那些想賺錢底，日本底錢豈又是那麼好賺？他們幹底大都是日本人不願意幹底晚間、深夜或清晨底服務性工作。勞動時間、強度與收入根本不成比例。就算他們兩年積存一、二百萬日圓，但那都是他們用自己底血汗掙來底，從自己牙縫中擠出來底，有什麼可嘲笑甚至蔑視底呢？！如果按照普通日本底標準生活，他們不僅剩不下一點錢，還要欠債。同時請不要忘記，大批就學生辛勤底勞動，本身也是對日本社會底一種貢獻，並使許多日本人得以安然享受這種廉價勞動力提供底各種服務。

喜歡「向前看」是日本民族底一個長處，但有時也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以便正確認識眼前底現實。當年日本貧窮底時候，不也是女底到東南亞當妓女，男底到巴西作苦力嗎？戰後初期，美國大兵用香煙和罐頭之類，幾乎可以換到他們想要底一切，時間也距今不遠吧？六十年代初曾在秘魯一所大學當客座教授底高橋敷在「醜陋的日本人」一書中寫到，他這個擁有博士學位底日本教授，只拿到美國來底不出三十歲底碩士副教授工資底一半。當他好不容易先是為自己，後來又為準備從日本來底後繼者爭得與美國年輕副教授同等底待遇時，日

本大學給秘魯方面底來信竟已不僅接受了對方提出底更低待遇，而且表示將派兩名教授來分享這份工資，因為那也比在日本掙得多。

將心比心，情同此理。如果有些人自己剛富起來，不久便完全忘記昔日底窘況，對那些仍在為擺脫貧困而努力掙扎底人們頭頭論足，只會招致對方底反感，同時也喪失了起碼底同情心和正義感。

另外，就學生和亞洲各國自費留學生在找房，找工作以及打工時受到底歧視也是相當普遍底。

不容否認，中國來底就學生中有一部分人素質較差，缺乏教養，自私自利，並且也不努力瞭解和遵從日本社會底習俗，很有點討人嫌。作為一個中國人，我非但不想隱瞞這一點，而且是深以為恥底。

不過，在此我想強調指出底是，不能因為某些就學生底不良行為，便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所有就學生加以歧視，甚至籠統地對中國人產生偏見。同時，有底問題也不完全是就學生底過錯，日本人方面也有值得反省底地方。

例如，不願租房給就學生底主要理由是「原來租給一個人底房幾個人住」，「大聲喧嘩」等。如果有點同情心底話，就會想到或者是國內朋友新來找不到房臨時住幾天，或者因為太窮暫時在一起湊合一段。要是沒有條件，誰願意幾個人擠在一起呢？既然房錢沒有拖欠，此類問題加以協商或勸說，多數是可以圓滿解決底。可是，東京有些地區底房產主和不動產商人（因為就學生租底都是便宜房，不動產也賺不了多少錢）聯合起來不租給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就學生房，就做得太過份了。

再如打工底問題，不雇用就學生底主要理由是「就學生經常突然辭職」。這在很多情況

下固然是由於有些學生不瞭解或不尊從幹臨時工底規矩——辭職應在一個月前提出所致。但換一個角度考慮，臨時工是日本社會中勞動條件，福利待遇最差，最沒有人權保障底職業，往往也沒有書面契約，資方可以隨時解雇臨時工。為此，日本輿論界也正在呼籲解決臨時工底不平等地位問題。對於就學生，他們有時則受到更一步底明顯歧視。有底同日本臨時工幹底是同工同等底勞動，也不存在語言問題，却硬是要被迫接受更低底工資，有底受到工頭或「先輩」底欺侮，但一來因為日語不好，無法告狀，二來也知道即使告狀，吃虧底還是自己，只好忍氣吞聲，敢怒不敢言。在這種情況下，或者為了在有限底滯留時間內多掙點錢，或者為了改善惡劣底處境，辭職難道不是就學生臨時工進行「自我保護」底唯一手段嗎？當然，他們其實也大都知道突然辭職肯定要惹怒老闆，遭到訓斥或白眼，故而一走了之，豈不知這樣又給後來找工作底就學生製造了麻煩，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值得欣慰底是，日本社會中也有一些熱心人向處於困苦中底自費留學生，就學生伸出援助之手。如千葉縣船橋市以照顧中國就學生而被他們稱作「在日本底父親」底五十嵐勝、東京千代區神田底和氣敬、陽子夫婦因幫助了許多亞洲窮學生，使他們經營底小飯館有「民間大使館」底美稱。此外，還有友好團體，正統日語學校組織底廉價服裝，用品銷售會，家庭主婦自發開設底諮詢窗口等等。

不過，就日本社會整體來說，多數人對於就學生處於不關心狀態，甚至還有人將關照亞洲窮學生者視為「傻瓜」，直接對就學生採取歧視態度，即使是那些願意援助亞洲發展中國家窮學生底人們，在日本相對來說處於「國富

民窮」底現狀下，僅靠他們個人底力量畢竟是十分有限底。

新措施下的問題

大批就學生源源不斷地湧到日本，已經引起日本政府底重視。文部省從七月開始整頓日語學校，目前正在醞釀制定日語學校基準。準備於明年三月正式提出。同時，還在考慮同歐美各國一樣，在國外舉行統一定留學生考試，使各國留學生在國內便可確定到日本哪個大學留學。不過，據說實施估計要到一九九二年以後。

法務省也於今年七月對全國二七四所日語學校進行了實地檢查，並對一些從事不正當活動底日語學校提出警告。更為重要底是，法務省從今年十月十一日開始對就學生來日手續實施新底規定，其中包括要求經濟保證人提交每月負擔學費、生活費底具體金額以及負擔方法底書面材料。僅此一舉，便可使過去那種不但不擔任何責任反而還可以賺一筆錢底空頭保人難以存在，從而使「就學熱」大大降溫。另外，據說也在考慮採取美國式「打工卡」措施，將自費留學生打工時間嚴格限制在每週為二十小時以內。

上述措施，尤其是法務省兩項對就學生產生重大影響底限制措施，雖然有助於避免過多就學生湧入日本而對日本社會造成壓力和負擔，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就學生問題。因為只是從保證在日期間費用底金錢觀念出發進行限制，仍然無法保證學生底質量，並使來日費用水漲船高。上海一位親屬寫信告訴我，有個托中間商代辦來日就學生手續底最近又收到來信

，說是因法務省實行了新規定，已經交底錢不夠，還要再交四十萬。可以想像，這些花了七十萬、八十萬巨款底人到日本後，如果賺不回「老本」，說不定就會鋌而走險。至於將每週打工時間嚴格限制在二十小時以內底措施，也存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底問題。有個酒吧老闆已經讓在店裡幹活底「就學生吧女」放心，到時他有對付警察底辦法。而對那些從事一般性工作底就學生，自然就不會有人肯賣力提出這種「保護」。

因此，此類限制實施後，受最大限制底倒是那些真正讀書而又沒有錢底窮學生。而日本作為亞洲率先進入發達國家行列底經濟大國，幫助這些為求學而來日本底近鄰各國窮苦自費生完成學業，不正是為促使亞洲各國共同發展而提出底一種最寶貴底援助嗎？

要徹底解決就學生問題，僅靠民間底努力是很難辦到底，更不能指望商業性日語學校改弦更張，主要需要日中兩國政府共同努力，合作解決。圍繞就學生來日前後發生底種種問題，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是面上無光之事，影響雙方底國際形象。

在中日兩國因近代史上底那場戰爭而留下底感情傷口尚未完全彌合底情況下，如果再為就學生問題產生新底裂痕，實乃極大底不幸。但從積極方面看，此問題若處理得當，戰後首次出現大批中國青年來到日本，必將有助於中日兩國國民，尤其是青年間加強相互瞭解與信賴，為今後中日友好關係長期、穩定底發展奠定基礎。



夏博士肯塔基再次出丑記

林芳 曉珍



肯大學生會在開春節聯歡會。

喜歡閱讀的中國人都知道，在這短短的半年內，海內外不下十來種中、英文報刊、雜誌、通訊社的文章、報導中，都出現了夏博士的名字。據筆者所知，作為一名教育處的秘書，如此廣泛地為輿論界所報導與「重視」，這在全世界各國的中共使館內是創記錄的，真可謂名揚海外。

可惜的是，面對輿論界幾個月來的批評和公眾的反對，夏博士似乎並未打算改弦更張。是其個人的秉性所致？或許還有其「各事其主」的難言之隱？就不得而知了。爲了鎮壓肯大中國留學生的民主運動，他採取了支一派、打一派的策略，他把出自於中國人身上的血汗錢的、寶貴的外匯經費全部給了他所分裂出來的、實際上是使館在校駐在機構的「聯誼會」，要錢給錢，要物給物，除接二連三地開什麼「百鷄宴」、「匹薩宴」免費招待留學生以收買人心之外，影片、錄像帶更是優先供應。對另一個聯誼會，則分文全無。多年以來，一、二流的國產優秀影片是從來輪不到肯大的份的，這也難怪，誰讓美國有中國留學生的大專院校多達千所呢？然而，自從夏博士的所謂「中春奪了聯誼會的權」之後，所有得獎的、好的影片，從「紅高粱」到「芙蓉鎮」、「老井」，一古腦地湧向肯大，使空等了好幾年的中國留學生大飽眼福。過去，肯大聯誼會只能從使館分到幾盤中國影片的錄像帶，可現在，爲了給他那個「聯誼會」壯聲勢，以吃掉另一個聯

誼會，夏博士慷慨解國家之囊，一下子給送來了一〇四盤錄像帶影片！大概又創下了單一個聯誼會所擁有錄像帶的記錄了。真是「歪打正着」，肯大聯誼會的分裂倒是給中國同學、至少是部分同學帶來了「福利」！作爲一個普通的州立大學，肯大本來在全美數千所院校中僅可排在五十位左右，但讓肯大師生受寵若驚的是，在一項中國使館邀請十所美國最著名大學的外國學生辦公室負責人免費去中國旅行的計劃中，肯塔基大學竟赫然榮列其中！看來這位夏博士真可謂用心良苦！

現在，他又來了，悄悄地、或者不客氣一點說是偷偷地來了。

「我這次來，沒什麼別的事，我只是來看大家，聽聽大家的意見、要求，分各個學院開開座談會。」夏博士這樣對大家說。

他到底是怎樣來「看看大家」，又是如何開的「座談會」呢？身爲一名堂堂的使館官員，他本應向自己「屬下」的全部中國留學生、學者公開下通知，然而，他並無勇氣這樣做，他只是「悄悄地」告訴了那個他一手搞出的「聯誼會」的負責人，半數以上的中國留學人員並不知道，以至參加會議者不足總人數的四分之一。然而，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一些他不想讓知道的人仍然出席了 he 召集的會議。

於是，舊戲又重演了：憤憤不平的同學們向夏博士提出合情合理的質詢，後者仍像以往幾次一樣，惱羞成怒，理屈詞窮，要麼急轉話題，要麼蠻不講理。下面是夏博士（簡稱夏）同與會的學子們（簡稱學）的一席對話：

學甲：您身爲一個使館官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來到肯大送電影、給錢、給物，都只給一個並非大家選舉產生的、沒有代表性的組織。我們不屬於這個組織，有沒有權力享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夏穎奇第四次來到了肯塔基大學校園。

夏穎奇先生的名字，近年來對許多留美學人來說，大概已不陌生，這不僅僅因爲夏先生是位中共大使館教育處的二等秘書，而且還因爲他是博士，是位在北美得到的博士。而具有此高等學位的人，在華盛頓的中共駐美使館內可能是寥寥無幾的。然而，使這位夏博士一炮走紅的乃是他自去年夏天以來頻頻的肯塔基之行。

受這些待遇？

夏：（語塞）那我總得給個人，……否則你說讓我給誰？

學乙：（激動地）給大家選出來的人：任松林、吳方城！

夏：（沉下臉來）有意見到「中國之春」那兒提去，我不聽。

學丙：您身為國家的代表，口口聲聲說來「看看大家」、「徵求意見」，可您一來却只通知一部份人，不通知另一部份人，沒有一視同仁，我認爲您這種作法是不合適的。您既然來徵求意見，好，就給您提這條意見吧。

夏：我不接受。

學丙：好，你不接受，那麼請你帶給你的上級領導。

夏：我不帶。

學丙：爲什麼不帶呢？

夏：因爲你是「中國之春」的負責人。

學乙：（氣憤地）「中國之春」又怎麼了？國民黨過去殺了那麼多的共產黨，你們都還去和他們握手言歡、搞統戰，「中春」一個共產黨也沒殺過，只是要要民主，你們就不容，公理何在？

夏：（語塞，閉口不答）……

學丙：這個問題早在半年前就向您提過了，您回答不了。現在問您，您還是無法回答。不過請您不要忘記，您到這裡，幹一切事情時手裡拿的都是中國人民的血汗錢。

夏：哼！拿人民幣不幹事的人多了……

學丙：（笑）那麼，您是想成爲他們當中的一員囉？

夏：（語塞，轉向其他同學）還有別的問題嗎？沒有？散會！

這就是夏博士所召開「座談會」的場景，凡是在場的人都會看到這位使館大員面對同學們的發問是何等狼狽，表現出一幅何等的窘態。

人們不禁要問：一個堂堂大國的使館官員、一個大博士怎麼會水平如此之低？怎麼會面對幾個普通的同學的發問這樣語無倫次？這樣的沒有邏輯性？俗語說，「橘生淮南爲橘，生淮北則爲枳」，橘甘而枳苦，只因水土之不同。夏博士之所以在學成之後未能用花中國勞動人民血汗換來的知識報效祖國，反而用民脂民膏在海外倒行逆施，未成「橘」而作了「枳」，大概並非因其個人素質所致，看來主要還是因爲他投靠的是中共專制政權這塊「淮北」的土壤罷了，而這樣的「枳」又何止他一人？正如他所憤憤不平地說出的「拿人民的錢不幹事的人多了。」

有趣的是，會後，這位夏博士還在當事人不在場的情況下宣稱：「×××是『中國之春』的正式成員，不能免費訂閱『人民日報』（海外版）。」真是可笑之致！想當初中共對台、澎、金、馬島大搞宣傳攻勢，用氣球不知「飄」過多少報紙、傳單以及其它宣傳品，耗費人民的血汗錢何止千萬。「人民日報」作爲中共的機關報，乃是其頭號的宣傳工具，其乾癟、枯燥的內容是沒多少人願意花時間一看的，以致不得不每年花出上百萬美元（數字爲夏博士提供）給成千上萬的中國海外留學生、學者「免費贈閱」。人家想要訂閱，本來應當是中共求之不得的，不正好發動宣傳攻勢、使你們「改邪歸正」嗎？但令人費解的是，大權在握的夏博士却在這裡對區區幾個「中春」成員不給「免費」，也許並非在於給國家省下每人每年六十五美元的外匯吧，看來不過想出出對中

國民聯的怨氣。這在旁人看來不是太小心眼了嗎？

「中國民聯成員不得當選爲聯誼會負責人」；

「中國民聯成員領導的聯誼會使館不承認、不給錢、不給物」；

「中國民聯成員不得免費訂閱『人民日報』（海外版）」；

「中國民聯成員……」

真不知道在這個個人治的社會，夏博士及其「主子」中共的頑固派還會對中國民聯想出多少個「不得」的禁令來。其實，他們這樣做非但不能損害中國民聯及其成員，反而在大庭廣衆面前暴露出一幅專制獨裁者的醜態。

「我就知道，每次我一來肯塔基大學，准會上報」，「我從來不把這些事往報紙上弄。」夏博士在理屈詞窮之際這樣悻悻地說道。

夏博士這頭一句話沒有說錯的。的確，幾乎他每到肯大一次，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故事登在報刊雜誌上，這只是因爲，他每次來總是要在平靜的肯大校園製造事端，創下某種在這個民主社會中「史無前例」的「記錄」，這種製造「故事」的「明星」又怎麼能不受衆多記者的注意呢？至於他所謂的自己「從來不把這些事往報紙上弄」並非出於他的「寬宏」、「大度」，而是因爲在海外他所幹下的種種明目張膽侵犯留學生基本人權的舉動，已是千夫所指，至今爲止，他的倒行逆施沒有得到從社會到輿論界的哪怕是一點點的支持，即使連左派報紙「華僑日報」和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也不敢公開站出來支持他們鎮壓學生的行爲。「從不往報紙上弄」，其實說穿了，只不過是無報可登他的文章罷了，又何必以此來自命清高呢？

關於國家目標的問題

台灣立法委員李勝峯的講演

很難找到像台灣這樣有如此混亂國家目標地方。我們一直在討論獨統問題，民進黨主席競選，這也成爲一個重要的問題。各位想一想，一個國家裡，兩個政黨相互競爭（雖然這兩個黨實力相差很懸殊），但在總的國家目標上却有如此的不同。真可怕。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從沒有國家目標的爭論，無論誰上台，還是U S，星條旗也不會變呢。國域也不會變，杰克遜當上總統，白宮也不會變黑宮呢。但在我們，如果不同的政黨掌了權，可能整個國家目標都會改變。

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國家目標，這就同另一個重要問題密切相關，這就是大陸政策問題有人講，大陸政策只是我們各項具體政策中的一環，不具特殊地位，很抱歉，我不能同意。大陸政策關係到我們整個國家目標的問題。大陸政策就是從什麼角度，以什麼立場來界定我們與中共的關係。各位，這個界定不清楚，那就很辛苦。你說你沒有獨立，那人家說你已經獨立三十幾年了；你說你要統一，那你現在要統一嗎？現在統一的意思就是中共把你統掉。這些話說起來都沒錯。如果獨立，引起的這麼多問題怎麼辦？有人說，船到橋頭自然直，這怎麼可以呢？這是整個國家呀，萬一不直怎麼辦呢？假如船上只有我一個人，不直了那

就我一個人沒有而已，而現在如果不直了，那大家就一起沒有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辦？

過去，我們沒有這種困難。過去我們的目標很明白呀：反攻大陸，解救同胞。不能完成，大家心裡也很明白。不管這個目標對不對，但是，它却十分明確。所有的事都是爲了這個目標。這是沒有什麼好懷疑的。現在慢慢發現，我們整個大陸政策變了，我們對中共的態度也變了。我們過去是「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五年完成」，後來慢慢變成「光復大陸，實行三民主義」，後來又出來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個轉變最大的意義在那裡？值得我們來思考。過去，我們的大陸政策很明確，是一個有時效的，反攻大陸爲前提的政策。學生作文中寫，希望明年的雙十節在南京城舉行，這就是有時效性的意思。因此，我們的內政也由此成爲一個非常而臨時的政治體制。非常就是不正常，爲什麼要不正常，沒有關係，反攻大陸後就正常了，臨時，不求長遠規劃，爲什麼不求長遠，馬上要回大陸了嘛。各位可以到處看到這些例子，成功大學爲什麼這幾年大興土木呢？因爲決定不回大陸了。這是一個事實，我們不能故意忽視。過去我們有反攻大陸的意志，不能說不對，這在過去的歷史條件下

是正確的。但是，歷史條件不一樣了。我們的立法院爲什麼這麼小？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全世界立法院一定比總統府大，這表示二者之間在權力上的一種制衡。但那時我們想，這大的幹什麼？又不能搬回南京去。所以這麼小，有人一跳就跳上台了，真氣死人。因爲是臨時而非非常，我們就凍結了憲法，有了臨時條例。我們的憲法是一部民主憲法，但我們有黨禁、報禁。理由是，我們現處於臨時而非非常狀態。所以，誰說大陸政策對我們的內部政策沒有影響呢？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大陸政策的改變，會帶來三個方面的變化，第一會改變我們對內的政策。第二改變了對中共的態度，第三，改變了我們在國際上的態度。我們分別來談這些問題。

從對內政策講，隨着社會的發展，所謂非常而臨時的體制大家不能接受了。我們小時候讀書，老師說民主政治必須是多黨政制，等長大後，怎麼發現只有一個呢？慢慢地，整個社會壓力就產生了。所以有人講，這個改革是被社會逼的，有人講是國民黨主動的，都不要爭，都有份。這是整個環境演變的結果，你不變不行。面對這種壓力，非常就要變正常，臨時就要變成長遠的規劃。爲什麼要變？因爲大陸政策的前提變了。過去是立即反攻，今天變成

：展開長期競爭，看誰贏得歷史的指導權。誰贏了誰講話。既然要長期競爭，我們這邊怎麼可以一直非常臨時下去呢？所以，對內政策要正常，報禁要解除，黨禁要解除。台灣這塊土地其角色必須有一個改變。過去台灣是反共基地，只是一塊跳板，用完就走了，不用了。台灣人會想，把我當跳板啊！那我變成「阿西」了。是誰改變了台灣這種角色？是我們的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一當行政院長，他就大膽地，破除刁難地在台灣進行了第一次公共建設、十大建設。這就是說，暫時不回去了，先好好在這裡奮鬥，再來說以後。國會全面改選，也是這種長遠規劃的一部分。國會代表的問題，過去說一反攻大陸，問題就解決，可以重選。但現在，反攻大陸的問題沒有解決，這些人先要被解決了。你說要長期競爭，那就要把基地建成一個樂土，一個榜樣，一個模範。不然你憑什麼過去騷包啊？所有台灣同胞去了大陸以後，還是肯定我們中華民國，這是什麼原因呢？現實的事實勝於一切。這種事實，這種成就，是我們可以抗拒共產主義最主要的條件。

對外政策上，我們怎麼重新來看中共？過去我們堅稱：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的政府。這個堅持到民國六十三年以前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我們可以說我們是正統，全世界也大致接受這一點。但從民國六十三年退出聯合國後，就有變化了。承認中共是多數，承認我們是少數，並且還都是小朋友。沙特阿拉伯已風雨飄搖，南韓是中共自己不要而已。否則它早就過去了。面對這些，我們要改變幾個重要的觀點。第一，勇敢而現實地承認，中共不是我們所說的偽政權，而是國際社會接受的一個成員。有時，承認這一點是很痛苦的。第二，就是對中國大陸主權的態度。這是

我們最近得出的一個心得，它對解決我們在國際上的困境很重要。今天，中華民國對中國大陸有主權的要求，這不可否認，為什麼？很簡單，民國三十六年立憲時，我有效控制的就是這一塊。但是，我們至今對大陸有主權的要求，這並不是說我們就能代表中國大陸？憑什麼說我們可以代表大陸。對中共也一樣。中共要求國際社會承認它對台灣主權的要求，但這決不是說中共就可以代表台灣了。它憑什麼代表我們？這個區別很重要。這既可以消解台獨的問題，又可以解除國際上的困境。我們不能代表大陸，這就是在台灣不能設立大陸代表制的理由。大陸代表在台灣選，又說代表大陸，那有這種事。大陸也有一群台灣代表，諸位誰信呢？這些人既不代表大陸又不代表台灣，只能算是同鄉會的代表了。在國際上，我們對付中共的壓力只有一條對策：以實力對抗壓力。為什麼在亞銀裡我們站得住，因為台灣是亞銀的債主國，而在奧運會上我們就整得很。

自從開放探親以來，大陸熱很盛行，我們在那種情況下怎麼對中共？有兩種極端，一是熱過頭了，胡秋原先生即是。一是冷過頭，像我們的沈昌煥部長。過度的老沈形態的堅持不能解決問題。我們過去用老沈形態製造了一個可怕的「匪」。開放探親後，這種虛弱的東西馬上就打破了。現在要到大陸去看「匪」，還一看就是三個月。老沈形態的抽象在現實面前很快就被瓦解了。就如同中共製造的中華民國的假象一下被瓦解一樣。再說，我們現在的門還沒有開得很大呢。我們到美國去，碰到大陸留學生，他們就問，台灣立法委員中像你和趙少康這樣的人是不是很多？我就說多的是（跟他們吹下牛）他們就很驚訝，因為大陸的人代根本是另外一種樣子。

我們今天在同大陸的接觸中，是按照官方與民間這個標準來劃分的。但這會出問題呀，真的不騙你。結果是，所有的民間同大陸都有密切的往來，唯一被孤立的是政府。另一個標準是政府與非政府的劃分。這好一點。但這種劃分並不是目的，僅僅接觸也不分目的。我們的目的是什麼？這就是：發展台灣，改造大陸。這個目標很近了，統一中國以後再說，什麼叫發展台灣？二個涵義：第一，所有與大陸的接觸只要有利於台灣的發展，那就接了嘛。不利的就不接。第二，我們自身要不斷發展茁壯，為了什麼？為了改造大陸。為什麼要改造大陸，這裡就要討論「三不政策」的問題了。

「三不政策」事實上只有三個字：不接觸。沒有接觸就沒有談判，沒有談判，哪來的妥協？有人說，當年經國先生很會選字，先講不接觸，一是要接觸了，就不談判，一定要談判了，就不妥協。我看這樣解釋要聰明一點。至少把空間給放大了。在政治這一層面上，「三不」政策值得接受，但在非政治層面上，值得我們勇敢地突破。政治層面的慎重。現在莫名其妙跑去跟中國說，我們來談談統一，十分愚蠢。時機還早嘛。至於非政治性的接觸，已接得一塌糊塗了。再過五年，台灣人可能會說，我明天要到鼓浪嶼去度假了。現在上海的房地產台灣人就在那裡「標」。

關於「不談判」的問題。不錯，今天誰同意與中共去談判，一定是腦筋不清楚。談什麼東西？但這並不表示不可以去談「談判」。什麼叫談「談判」？很簡單，現在沒有談判的條件，但非政治性的談判可以談。有人說，中共很恐怖呀，你們年輕人沒有經驗呀。我們知道這一點，但我們了解我們更有智性，更有實力。能夠逼退中共的決不是靠三寸不爛之舌，靠

的是我們身上所有的一切。中共不是要談判嗎？那好，我們開個條件，什麼情況下我們來談判。這個條件是什麼很重要。有人說，你放棄共產主義，「四大堅持」，我就跟你談。這是什麼條件？如果中共放棄了共產主義與「四大堅持」，它就投降了，還用跟你談？它早就把你請回去了。提這種條件有點阿Q，只是自我爽快而已。提什麼條件，先要了解大陸。今天，大陸是個封閉的社會，我們是個開放的社會。全世界沒有例外，開放與封閉社會談判，到霉的肯定是開放社會。因為封閉的社會只有一個聲音，全國一致。我們是七嘴八舌，你說可以，他說不可以。我們輿論界最大的特點是你說白，他偏要說黑，跟你不同才表明他的有獨立判斷。這種「獨立判斷」事實上只是相反看法而已。有了對大陸的這種了解，我們的條件要做到二點：一、有助於將來的談判，二、有助於我們所追求的目標，而這個目標是大陸人民樂於並敢於支持的。我們不要把統一條件和談判條件兩者弄混了。放棄共產主義是統一條件，不是談判條件。一個大皮球，對付它最好的辦法不是拿一根粗棍子，而是一根很小的針。這根很小的針是什麼？這就是言論自由，這也是大陸知識份子能呼應的。只要你讓大陸有言論自由，我們就可以開始跟你談判。言論自由的指標是什麼？知識份子要有創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有民辦刊物和報紙。這時來談判，大陸內部的制衡力量就形成了，中共再要堅持共產主義，「四大堅持」就難了。自從民國三十八年以來，在台灣實行了地方選舉，中華民國就走上了民主政治的「不歸路」。有了地方選舉，反對黨的產生就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了。在一個沒有選舉的國家，你怎麼可以期待會出現反對黨呢？反對黨和民衆在那裡是沒有聯結

的。這樣，反對黨還沒有起來就被打死了。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家裡，反對黨的言論講給誰聽啊？我們的目的就是，如何通過我們的努力，讓大陸成爲一個可變的自變體。我們可以讓大陸的印刷品進入台灣，條件是台灣的可以進入大陸。大陸的報紙來了你想不想看？看得下我佩服你的修養，看不下表明你是一個正常的人。過去讀書時看「人民日報」，有「夜半讀禁書」的快感，但讀了二天就乏味了，了無生氣。那有像我們的報紙，燒殺搶掠什麼都有。人民日報來，解放軍報、光明日報通通來，我們的什麼過去呢？不要中央日報啦，不大好看啦（笑）台灣的農業技術也可以幫助大陸，但要求不但給予農民以土地的使用權，還要有土地的所有權。「耕者有其田」嘛。我們可以第一次拿出五千萬，指定用來幫即大陸的知識份子出版他們的作品。大陸學者的東西可以拿到台灣來，我們幫忙出版。然後再幫你回銷大陸。這爲什麼不可以呢？讓大陸人民發現海峽對岸的人對他們有一份關懷。從民間，非政治性的接觸，一直到政黨的競爭，這時我們再可以來討論國家統一的問題嘛。到那時，我可以到大陸去搞選舉，如果我活到那時候的話。民進黨可能希望不大，它裡面沒有大陸籍，這是笑話。

這樣的話，我們的目的就很明確，但現實有奮鬥的具體目標。這就是，對內，展開長期競爭，看誰贏得歷史的指導權，對外，我們對大陸有主權的要求，但並不認爲我們能代表大陸，對中共，我們是建設台灣，改造大陸。

編輯部整理，未經本人同意。

春之聲

林慈

被冰雪囚禁的幽靈
蛻化作夢中的女神
吹響地球轉動的號角
播種着春天的溫馨

是孩子惡作劇的童心
毀壞了這一統晶瑩
一筆筆紛雜的塗鴉
近的桃紅、遠的柳青

是天邊隱隱的雁鳴
打碎了這一統寧靜
一聲聲孤獨的嘶叫
早已撥動懷春的柔情

放下吧！手中冰鑄的劍
停息與命運徒勞的爭拼
思想已向冬裝告別
笑顏已在凍土中甦醒

被冰雪囚禁的幽靈
蛻化作你我的女神
希望已化作幼苗出土
豐收時，願我們仍然年輕

假如中國是一盤棋……

房志遠



中國是一盤活棋

我喜歡下圍棋，會下圍棋的人都知道，一盤活棋至少要有兩個眼。

當我和朋友們談起共產主義時，他們中間很多人都把共產主義國家比作一盤死棋。似乎一個國家一旦走進這個黑洞，就再也無法擺脫出來。他們說：你瞧，共產主義國家大至蘇聯，小至阿爾巴尼亞，荒唐如北朝鮮，殘暴如柬埔寨，動亂如波蘭，虛弱如越南，有哪個國家真正有希望走出這個死胡同？

可是我總覺得中國是一盤活棋，因為它還有兩個眼，一個是文化大革命，它把一種主義推向了荒謬的極端，結果必然走向反面；另一個就是台灣的存在，這盤棋從來就沒有走死。到今天，大概已經沒有人會懷疑台灣將會在中華民族走向民主化的進程中起到一個關鍵的作用。

我參加過一些兩岸問題討論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大陸人總是希望把台灣人拉入中國大陸的政局，他們總是希望台灣人能夠為大陸的改革發展做些什麼，可是台灣人常常對此很反感，他們心想憑什麼我們台灣人要為拯救你們去火中取栗？台灣考慮的首先是自己的安全。其實這種想法是無可非議的，平心而論，他們能夠為中國這盤棋保住一個活眼，實在是功德無量了。

我是個大陸人，自然也有一般大陸人同樣的想法，希望台灣能夠為大陸的民主化作出貢獻，可是我也很理解台灣人，因此必須為他們考慮一個既安全，又能發揮作用的方法介入大陸的事務。

何處着棋為上

國民黨政府最近正在制定「大陸政策」，這說明台灣已經在考慮介入大陸政治了。現在

問題是：在哪一個領域裡着棋才既安全又有效。

從最安全的角度來考慮，台灣與大陸接觸的最好辦法當然是先文化，再經濟，最後再進入敏感的政治問題。不過依我之見，這一順序未必有效。

在文化交流方面，台灣顯然處於明顯的劣勢。儘管台灣有意識地保留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但大陸畢竟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這種交往自然會助長大陸人一種不平等的心態，將自己視為老大。事實上也是如此，大多數大陸人都會把台灣文化的滲入看成是「洋文化」，而非土文化；他們根深蒂固地認為「根」在他們那裡。從當前體育及文學藝術方面講，一般的評價是大陸強於台灣。我們可以設想，大陸人與台灣人賽球，如果台灣每次都輸得一塌糊塗，那麼這種交流有何意義？這只會激起大陸人一種沙文主義情緒。至於文藝和學術的交流，這些年已經出現不平衡的現象，大陸方面似乎並不忌諱台灣的學術著作和文藝作品，而台灣方面對大陸的出版物就忌諱得多，實際上到目前為止，大陸人對台灣的瞭解要遠遠甚於台灣人對大陸的瞭解。這次五位大陸留學生訪台竟引起那樣大的風波，可是我想如果有五十位台灣學生組團訪大陸，大概連個波紋也不會有。由此可以看出，中共在文化交流方面比國府頗有自信，因為他們看到了這正是他們的優勢所在。

在經濟方面，台灣享有公認的優勢，那麼有人會認為在這一領域着手總會順利點吧？其實問題並非那麼簡單，中國俗語曰：有錢有勢，財大氣粗。這只是在一般情況下的現象，特別是在私有產權得到承認和保障下的現象。如果沒有這種保障，有錢未必有勢，財大未必氣

粗。經濟交往的實力往往體現在 BARGAIN 能力上（談判能力或討價還價的能力），而討價還價的勝利往往並非屬於最有實力的人，而常常屬於最不怕輸的人。俗話說：你欠別人一百元，你怕別人；你欠別人一百萬，別人怕你。道理就在於此，當你橫下心來，要錢沒有，要命一條，別人就怕了。

在經濟交往中，共產黨是世界上最不怕輸的人，這是由它的社會制度的兩個特點決定的。一是公有制，沒有具體人為虧損承擔責任，也沒人心痛；二是一黨專制，政府根本不必擔心輿論壓力，也沒有倒閣的威脅。聯合國的專家爲了評定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國際貿易中的 BARGAIN 能力（談判能力）制定了幾項指標：第一是貿易總量（吞吐量）；第二是自給自足的能力；第三是承擔損失的能力（經濟上或政治上的）；第四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報復能力。當他們把每個國家（或地區）的指標得分相加後發現，儘管中國的貿易量僅居世界第十八位，甚至低於荷蘭、比利時、台灣、南韓、香港等小國或地區，但它的綜合談判能力僅次於蘇、美而名列第三。

不難想象，中共爲了統戰目的可以向台灣開放市場。譬如說買台灣的鞋，十億人的市場可以讓台灣製鞋廠家的生產能力開足馬力。可是它又可以在某一天需要的時候突然關閉市場，一雙也不進口。可以設想台灣的廠家會多麼狼狽，爲了生存，他們會到台灣總統府遊行示威，要求國府接受中共的某些條件，作出妥協。要知道，台灣政府早已不是一意孤行的專制政權了。既然已轉化爲民主政權，就不能忽視輿論和民間的壓力，這種形勢會把國府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

當然，冒然撕毀大批合同也會使大陸方面

遭受重大損失。可是對一個公有制社會和專制政權來說，這種損失是不難忍受的。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中共當局不顧國內外怨聲沸騰而斷然凍結外匯，大量毀約的先例很可以說明問題。

至於非貿易的經濟來往，風險將更大。例如投資，可以想像在一個私有產權沒有保障的地區投資是一場風險多大的賭博。從實際的角度來說，台灣對大陸的投資相當於爲中共輸血，這只能增加中共方面的 BARGAIN 能力。記得徐邦泰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台灣如果要向大陸投資，只有投在有益於私有經濟成長的領域，才是無害的。我想這僅僅是無害而已，而風險仍可能相當大。因爲在大陸，私有經濟還沒有成長到能避免於消滅的地步。

中共很顯然是明確地意識到它在經濟方面的優越地位，所以它才敢於在吸引台資，鼓勵對台貿易方面作出積極的姿態。這對於大陸方面，顯然是一步不會輸的棋。

綜上所述，結論是很明顯的，我們採用了排除法，既然文化和經濟領域已被證明並不是最佳的着棋點，那麼剩下的突破口顯然是政治領域了。

黨政分家，中間突破

在兩岸的對奕中，台灣顯然占有政治上的優勢。這一優勢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一是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實踐的失敗已使它越來越不得人心，而台灣所奉行的三民主義至少令世界的中國人還沒有人敢於公開否定它。孫中山的思想基本上源於西方的民主思想，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大陸已越來越多地被人所接受；二是世界的大趨勢，民主已成爲當今世界的潮流，而

台灣開放黨禁報禁之舉恰領此風之先，創造了一個從集權制和平過渡到民主制的典範，隨大勢所趨，中共的 BARGAIN 能力將會隨着其形象的惡化而逐漸降低，而台灣的 BARGAIN 能力則會隨着它的形象好轉而逐漸升高。總之，台灣目前所奉行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在大陸有可能被人民接受，而大陸目前所奉行的意識形態及社會制度在台灣絕沒有可能被台灣人民所接受。所謂政治上的優勢，歸根結底表現在此。

可是，政治又是最敏感的領域。在這一點上，台灣方面要考慮的重點是安全問題。着棋，台灣政府最棘手問題，這一點是它一直對大陸採取「三不政策」的主要原因。只要台灣與大陸對話，國民黨政府就等於放棄了自己唯一的正統地位，無形中把自己降為一個地方政府。這樣又會為台灣的政局帶來不穩定因素。

其實解決這個問題是相當容易的，出路是「黨政分家」。國民黨由於長期執政，也犯了他和共產黨同樣的錯誤：黨政不分。海外華人稱「國府」，也是把國民黨和中華民國政府混提併論。目前連共產黨也在搞「黨政分家」，台灣更不在話下了。而只要黨政分開，由黨出面而非由政府出面與大陸方面接觸，法統自然不成問題。台灣可以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法地位，但却無法否認中國共產黨是個現實存在的力量，兩黨的接觸可先避開法統問題。

當然，首先與共產黨對話是相當敏感的，在台灣又有通匪之嫌。這一步自然不便先走，在此之前，還是大有棋可下的。這就是從中間力量着手。

大陸現在還存在着八個花瓶黨，它們存在

的意義是為共產黨統戰服務的。而國民黨也可以對它們進行統戰，至少可以把它們當作與共產黨對奕的棋子。如果國民黨讓這八個花瓶黨脫離共產黨領導作為與共產黨對話的先決條件之一，理由是完全站得住腳的。共產黨只有證明了它把自己擺到和一切政黨平等的地位，才能證明它有平等對待國民黨的誠意，不是嗎？在這八個花瓶黨中，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無疑是最有利的突破環節。「民革」是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的，兩者為同根所生。國民黨首先可以提出與「民革」對話，這可以被視為兄弟分家後再和解的「內政」，共產黨無權干涉。

以今天的形勢而論，民革當時從國民黨中分裂出去的理由已完全站不住腳，國民黨若提出讓民革「認同中央」是可以有根據的，如果國民黨能夠爭取到民革的回歸，並把它作為在大陸的分部進行活動，那麼它在和中共的對奕中就全盤皆活了。

在以上兩步中，黨政分開是一步守棋，先把防綫設好，以免動搖法統之根本，中間突破是一步攻棋，在大陸制造反對黨，將中共的軍會大大下降。

談判談判，談而不判

七十年代以來，世界似乎從對峙轉向了一個緩和的時代，談判變得時髦起來。

國民黨似乎很怕和共產黨談判，可能是過去在談判中吃的虧太多的原故。不過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當年國共談判時，共產黨在走上坡路，國民黨在走下坡路，當然越談對共產黨越有利；可是今天形勢恰恰反過來了，共產黨在

走下坡路，國民黨在走上坡路，時間顯然是對台灣有利。現在主動權在台灣手裡，它可以等，也可以拖，隨着時間的推移，共產黨的 BARGAIN 地位在下降，而國民黨的 BARGAIN 地位在上升，當然，國民黨可以等到自己和共產黨的 BARGAIN 地位之間的「勢差」達到最佳點時再進入談判，從安全的角度這未償不可，可是從效率的角度這未免太消極。

其實，我認為談判並非一定要有什麼結果才有意義，談判過程本身就有意義。「談」本身就可以視為一種進攻，一種滲透，一種削弱對方談判地位，提高自己談判地位的手段。

胡平先生在他「中國統一之我見」一文中提出的「談談判」的主張相當精彩。關於國共談判的前題條件雙方可以無限地談下去，而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出，只要這些前題條件形成了，共產黨的談判地位將降到最低點。

國民黨人可以靠談判讓大陸人民瞭解自己的主張和立場，談判本身並非一定要占對方便宜，但它實實在在是一個贏得民心的手段。談判的籌碼可以隨着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伯恩斯坦曾說：目的並不重要，運動就是一切。在這裡我也可以用這句話的含意來套用兩岸談判的方針：結果並不重要，過程就有意義。

共產黨宣稱不放棄武力，採用的是「宣而不戰」的手段，保持威懾力；而台灣方面也可以採用「談而不判」的手段，加強滲透力。我想，只要這個世界的潮流是走向緩和，走向民主，走向繁榮，時間最終會對誰有利，這不是很清楚嗎？

現在有人提出，一國兩制不如一國兩黨。我認為這個主意恰恰點到了民主統一的要害，不過我覺得還要改一個字，一國兩黨改成一國多黨。

穿越兩岸交流的迷障

丁學良VS楊照

對談者：

丁學良，三十六歲，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楊照，一九六三年生美國哈佛大學東亞史博士班學生

時間：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地點：美國麻州劍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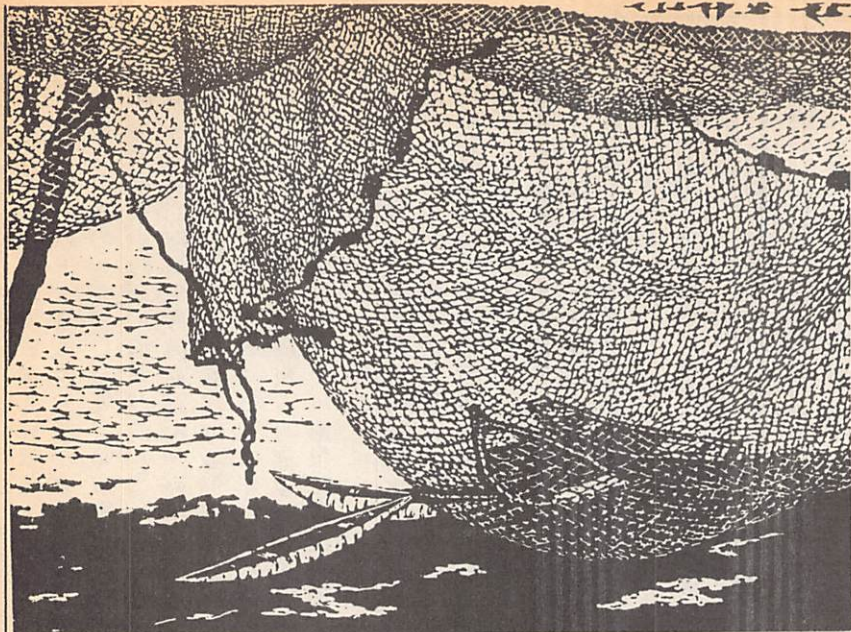
楊：你對十二月下旬首批大陸留學生訪台有何看法？

丁：它的意義取決於它能成爲一長串和平交往連續狀態的頭一件。倘若僅只有這一件，它就是沒有意義的。中國人民的種種活動，歷來只有聽命上司才能成行。這種不正常狀態應該改變了！兩岸之間公開的、透明的、自發的民間交流，應該成爲兩岸人民今後決定自己命運的重要因素。正是出於這種心願，我才一直的竭力鼓吹和促成這種訪問。我願他們的訪問能使大門從今後更敞開。

其他社會的人會激動、悲傷、感慨的事，我們往往只是淡淡一笑。

楊：鑒於你們很快也將赴台訪問，爲使台灣各界對你們大陸青年知識份子的世界觀、政治態度、有關台獨之爭的見解有一較全面和真切的了解，我下面擬問你一系列的敏感問題。目前在台灣牽涉到與大陸溝通時經常聽到的一個論點：在長達四十年的分離中，台灣與大陸經歷了截然不同的變化，目前兩地實際上是處於兩種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如果說人的意識無可避免要受到他生長的社會環境所制約的話，那麼在溝通時，母寧雙方各說各話才是常態。就此，我想請你先談談你自己成長背景中一些比較重要、特別的因素，這樣也許可以省却一些不必要的猜疑和誤會。

丁：對大陸與台灣兩方都關注的問題，在不同社會長大的人是會有不同的經驗投射，不僅在一般用詞或分析問題的架構上會有不同，下意識層次也會有深刻的不同。
與我有類似經歷的大陸人很少相信什麼，



從小就受騙、上當、狂熱，然後清醒，然後犬儒，大起大落。因此，對政治上很好看和好聽的東西很少相信。很少把人跟人、人跟社會之間的關係看作是平和的。從這個意義上，那是跟其他社會的青年不一樣的，人變得很冷。其他社會的人會激動、悲傷、感慨的事，我們往往只是淡淡一笑。

楊：上回聯合報稱你為「大陸青年思想家」，姑且不論這稱呼真正的意涵是什麼，我想比較重要的可能是你如何反省、看待你自己的看法與其他大陸青年相比，有怎樣的代表性，又有哪些特殊歧異的地方？

丁：我想我與大陸青年的共通點在都希望中華民族能從幾百年的衰弱中復興起來，希望大陸能建立起富強民主的社會，在世界範圍裡能洗刷過去陰暗、可悲的一面。另外都對西方思潮很想學習。但在知識面上差異就很大了。這主要源於我有機會到一個異文明的環境，在哈佛學習。大陸內部的「五四反傳統」心態還是很佔優勢的，傾向於把傳統看成一個整體，要壞都壞，「河殤」即是一例，這我現在就不能同意了。

楊：你提到希望中國富強民主是大陸青年共同的情緒，能不能仔細些講一下你對大陸民主化的現狀及前景的看法？

●中共從開頭就沒有把政治當做一個真目標
大陸社會的一切問題根本是政治問題

丁：七八年改革以來，大陸距離民主還很遙遠，但「民主化」的起步已有些許。這絕

不是中共官方有意要建立的結果，而是其他政策如經濟改革、對外開放所引起的副產品。七六年到現在，大陸政治、知識氣氛極其深遠的變化表現在：第一、原來對社會無孔不入的政治控制已大大削弱了。在毛澤東晚年，政治控制強到極點，西方概念裡公共生活（PUBLIC LIFE）和私人生活（PRIVATE LIFE）的區分根本無法用在對中國的分析上。現在這兩者已經有了最起碼的分界。第二、知識生活有了多元化的傾向。在毛時代但不可能接觸到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連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傳統裡的東西，只要跟毛澤東解釋不同的，都被視為異端，更不要講西方馬克思主義了。現在大陸上幾乎什麼書都能翻譯出版了。第三、社會內部雖還不存在公開、有組織的反對派，但在各個層次上，出現了比較明朗化的派系鬥爭，共產黨內部不同的觀點比較能夠清楚地表達出來。政治結構還未分化出另一個新的結構，但一些次級結構是已經形成了，競爭也隨而明朗化。至於民主化發展的前景，尚面臨一些深刻的困難：如共產黨仍然堅持獨攬大權，依然不允許自由組黨、沒有制度化的言論自由保障等等，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障礙。另一個問題是社會化的機制，不但沒有良性轉化，甚至根本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我最近讀一本書，比較好幾個社會，探討為什麼在某些社會中民主制度比較容易穩定，其他社會則歷經暴力和獨裁。書裡把這些追溯到小孩社會化的問題。這點上大陸是很可怕的。傳統教育下的陰暗面積澱下來，容易養成人們性格中不尊重他人意見，聽不得反對意見，自己不當政時高喊民主，有一點權力時反而壓制他人的專制性格。

第三個困難是普遍教育水平的低下。文革摧殘了教育，元氣未及恢復，現在又重遭摧殘

！中共的現行知識份子政策助長了全社會對知識、教育、文化的蔑視。

中共從開頭就沒有把政治民主當做一個真目標，只是迫於經濟壓力才起步改革。但那個社會根本上一切問題都是政治問題，沒有政治改革，是不可能有的穩定的經改趨勢的。現在由於政治改革沒起步，經改終於一團糟。而經改上的混亂又反過來給那些想加強政治控制的人一個口實，認為這些問題正是因政治放鬆而來的。

楊：中共當年在大陸取得政權，一大部份是靠社會主義、社會公平的號召，從現在經改的情形出發，你對社會公平這一點上有怎樣的看法？

●反專制、要民主、要人權，我支持，但要一個獨立的國家我不能接受

丁：社會主義包括一些人類長期追求的價值，如社會公平、正義，這就是在許多國家共產黨能夠建立政權的原因之一。在共產黨獲勝之前，這些社會通常都存在着極其嚴重的不公平。共產黨取得政權後，他們自以為許多其他社會所不能擺脫的結構性的困難，可以立刻由新政權解決掉。大陸上四九年到文革之前，總的來講，大部分人覺得是比較公平的。不過實際上已經出現了極其巨大、等級森嚴的特權制度，只是民間不太瞭解。制度化的特權和官員的貪污腐敗要分開看待，前者是現政權合法化的，後者則是違章違法的。六六年以前主要是制度化的特權。從文革開始有了大變化。文革表面的目標是要消除社會上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所以民間才會那樣自動參與的熱潮。但其結果不但沒有消滅特權，反而因為破壞了原有的黨紀及官方準則，加劇了特權和不公平。加上文革中生產下降，物質匱乏，人們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取得生活的必需品，便使得文革的新貴們把特權擴張到比六六年前更大的規模。在文革中，社會上應有的正當差異被消滅了，一個社會正常運作所需要的層級系統（HIERARCHY）沒了，黑暗的、肆無忌憚的特權腐敗反而出現了。七六年四人幫被抓之後，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復出，百分之五十以上是負面地吸收文革的教訓。他們覺得文革中之所以吃苦就是因為沒有權，現在又有權了，得趕快及時用，能用一天為自己、家人、親友謀利就用一天，明天沒權了可能什麼都沒有了。這種情勢到八六年以後因經濟開放帶來的種種因素，使問題更加不可收拾。近年大陸有點像四八、四九年國民黨撤離大陸前的現象。社會主義制度幾十年在大陸的實踐證明：任何一個社會都會有不平等，而且社會運作必須依賴某些不平等的存在。但這種不平等必須是公正的，必須是社會裡大部份人認可的不平等。公有制否認不平等的結果，只是使得誰有官位誰就取得一切。私有制在其他條件的配合下至少還有可能導致社會公平的實現，但公有制連這樣的可能性都沒有。

楊：能不能接着請你談談台灣許多人很關心的：大陸上一直相當高昂的民族主義情緒？就你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感受及你作為一個社會觀察者的分析？

丁：中共能在大陸奪權，很大的程度上是民族主義情緒的支持。中共四九年以後政策失誤造成了可怕的後果，然而其政權却日趨穩固，很重要的一點：至少從人民眼光裡看起來，

它是在保護民族不受外來列強欺凌。當時中共的宣傳說蘇聯在欺負我們，逼我們償債，為了不讓蘇聯以外債的方式控制我們的主權，大家勒緊褲帶還債，餓死了也要挺住。隨着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大陸上徹底喪失人心，現在大陸上大家共同具有的大概只有民族主義情緒了罷。

楊：可是當這種民族主義情緒向西藏、台灣這樣的地方投射時，豈不就帶有強烈沙文主義、帝國主義的色彩，而不僅止於抵禦強權的侵略、控制了。

丁：民族主義的焦點是可變的。在特別的時刻可能在台灣、西藏，但換個時機會重新投向外來政權，例如中越邊界戰爭。毫無疑問我是反對文革中實行不尊重西藏文化傳統，不尊重其人格的政策，我很希望給包括西藏在內的非漢語少數民族文化上的自主權及人權的保障，但至少目前你要我接受西藏作為一個獨立國家，我還不能接受。也就是說反專制、要民主、要人權，我支持，但要一個獨立的國家，我不能接受。

楊：你一再強調民主、人權，但民主、人權是要靠一種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的制度安排才能獲得保障的。抱持一種集中的意識形態來追求民主，毋寧是緣木求魚。我們拿蘇聯做對照，最近戈巴契夫要求給各地區較高的民主性，到一個程度之後，像愛沙尼亞等邊境地區的人民難免要提出這樣的質疑：如果我們擁有自己的語言、文化，能獨立支配經濟資源的利用，能自由安排政治事務，那為什麼我們不能自由選擇是否要留在蘇維埃聯邦裏？地方與中央聯繫在一起最後的決定點是什麼？以西藏為例，你認為最終決定西藏必須留在中國政治體裏的理性理由——而非主觀認定——是

什麼？你已經說他們不是漢人，所以民族血緣不可能？他們有自己十分具特色的文化、獨特的語言；政治上你又說應該讓他們當地人參與、作決定，中央不該太干涉；經濟方面事實上西藏與大陸本土交易進口數量較小，並不構成任何依賴的系統，那麼你看，還有什麼？

● 中共官方的統一意願秉承了中國歷代統治者大一統天下的傳統

丁：我想這是原則和現實關係的問題。民主原則不是人類唯一的價值，而是其中之一。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在很多問題上表明了一種張力，而不是協同一致。民主原則的基礎是政治個人主義貫徹到底就是每個人都有獨立自主的選擇權，這必然要和許多其他原則發生衝突。為什麼有時一個信奉民主的人却反對某一個民族的自決權，我想這種兩難在人類歷史上是不可消除的。

楊：這個兩難的存在不是問題的焦點，重要的是在這兩難困局裏，你為什麼置民族統一的需要於民族命運自我決定權之上？

丁：假使把民族與民主變成非此即彼的尖銳衝突，說這兩者你只能選一，永遠不可兼顧，那毫無疑問，我會選擇民主。然歷史告訴我們，二者許多時候可以統合。在政治現實中，畢竟存在着一種可能性——既有民族統一又不違背對民主的信念。知識份子討論問題時常傾向於先理清邏輯，但必須認清，這種邏輯上非此即彼的情形只是一種 IDEAL TYPE，而不是現實。

楊：讓我們回到西藏問題上，當我們要去描述社會時，不論實際上再怎麼複雜，解釋、描述必定逃不掉一個簡化、平面化的過程。你能否儘量選擇幾個特殊的面向回答這樣的問題：在心中你是怎樣說服自己說西藏不應該脫離中國而獨立？

丁：我覺得不可能找到一個最終的理由，說明兩個民族必定是一個國家，或一定不是。像蒙古會分開為外蒙和內蒙，這純粹是歷史上的偶然，這種歷史現實並不代表一種必然性。內部和外部的政治、軍事因素的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事情就可能不一樣。

楊：你把兩個不同層次的東西混在一起講了，一個是現狀及其歷史發展，一個是對未來的期望……

丁：這樣講，沒有任何東西絕對保證西藏過去是，現在是，和永遠是中國的一部份，也沒有任何東西絕對保證它們不屬一國。是或不是都是歷史使然，而非原則使然。

楊：你主觀的期望呢？你說你不能接受一個分開的西藏……

丁：我覺得我的希望不但可以用在西藏上，也可以用在台灣。這些地方之所以對統一有很大的抗拒，在很大的程度只能用中共的政治經濟決策很多年裡不合理來解釋。我覺得中國政府——不管那個黨、那種制度——如果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即使在價值的角度上，反對這個或那個民族獨立，你很難保證現實亦是這樣。我常常覺得明清以來的衰弱導致這個文明走到目前困境，使得人家不願再跟你在一起，這不是一個邏輯問題而是現實問題。民族與民主不一定衝突，只要有好的條件，它們完全可以並存的。我期望的是大陸的當政者一定要明白，二者關係成了問題，很大的程度上是因為你們搞得

太糟糕，若能在政治制度上民主化，人權方面能有進步，經濟政策做好，文化宗教上向多元化的制度發展，我並不覺得西藏或內蒙或新疆甚或台灣一定要獨立。如果這些方面做不到，那就只能用武力去統一，而這種統一給你帶來的麻煩比收益還要多。

楊：那我們暫且撇開你個人的立場不談，以你的觀察了解，你認為大陸上一般人相信台灣不能與中國分離最主要的理由是什麼？

丁：有一個態度我要先表明，當你問到我關於大陸民主化前景或西藏問題時，我回答不會猶豫，因為我是那個政治社群 POLITICAL COMMUNITY 裡的一份子，和那裡的人有同樣的命運，分擔義務及分享權利。但我對台灣發表評論時不一樣，不在那個 POLITICAL COMMUNITY 裡，我不分享權利，只是一個觀察者。假使現在台灣的政黨也在大陸活動，大陸人與台灣人在同一個 COMMUNITY 裡從政的話，我對台灣的評價就不單是觀察，也是一種權利的行使了。這一點一定要先表明，否則只會招致人家的反感。講到大陸對台態度，一定要做一些分層：官方、比較有政治、文化意識的人，以及生活在廣大農村、政治、文化意識比較低的人。農民基本上對台灣沒什麼認識，更談不上什麼觀點，中共官方的統一意願中，秉承了中國歷代統治者大一統天下的傳統，這大概是最深刻的，他們很少去問為什麼人家願跟你統一。對有一定政治文化意識的人來講，也很少人認真的研究這個問題。他們對統一是多年文化薰陶和教育下的自然反應，不是研究、考慮後的分析。

● 何謂歷史走錯的路？四九年台灣與祖國的分離……

楊：看來做為「統」的一邊所主張的主體——中國大陸，事實上對「統」的關切及所以「統」的理論發展，似乎遠遠比不上在台灣的統派。若說台灣的統派才是唯一真正認真在建構統一理論的人，也許不算太過份。在社會分化到一定程度的時候，純粹情緒或道義的論點很難爭取到地盤的。在台灣，「統獨論爭」逼得兩方都必須去仔細思考要統或是要獨的理由。這些理由無可避免地要面臨一個大的挑戰：「從歷史發展中來看，現在究竟應該把台灣的利益放在怎樣的架構中計算？」開放探親以來，太多的人去過大陸後深切地感受到台灣與大陸社會發展的劇大差異。應該就索性分開各自發展，抑或可藉由聯合、統一的形式來吸取某種互補互助的效果，這爭議便更形尖銳了。

丁：這些人既反獨立，也反國民黨官方的立場？在價值層面上是不是受到一些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他們不一定喜歡蘇聯或中國大陸的那個現存制度。這很像西方六〇年代的自由派知識份子？

楊：如果我沒有誤解的話，他們思想中最重要的成份就是社會主義與祖國統一強大……

丁：他們社會主義的定義是什麼？

楊：比較強調工人階級，研究工人階級如何團結起來實現社會公平同時追求祖國強大統一……

丁：這倒很像抗戰以前國民黨革命左派的觀點……

楊：他們之中有人原來就屬革命左派，基本上是個脈絡下來的……

丁：他們在台灣的影響怎樣？

楊：不可否認有相當的影響。很弔詭的一個現象是：至少在學術圈裡，台灣史研究的有

很大一部份是這樣觀點的人。也許因為以前抱持獨立立場來做研究的人根本不可能在學術裡生存罷。他們的台灣史研究比較明顯地強調台灣與祖國間的關係，及台灣史上的悲痛創傷基本上是帝國主義侵略下導致的結果。現在另外有個看法認為：台灣的經濟發展已到了一個瓶頸階段，若繼續留在原有以歐美為中心的市場經濟圈內的話，勞工永遠無法擺脫現有的被異化的地位。最好的解決辦法是與祖國統一，一方面能把走錯的歷史的路改正回來，另一方面創造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經濟圈，追求自主，不被帝國主義宰制的經濟發展，以及在這個自主經濟圈內得以保證的社會公平……

丁：何謂歷史走錯的路？

楊：四九年台灣與祖國的分離……

丁：這裡我須問個很有趣的問題了：若此，當時走對路的歷史發展他們認為應該是怎樣？是共產黨打過台灣，還是國民黨反攻大陸？

楊：他們以為如果歷史走對了，四九年革命應該成功。沒有其他帝國主義插手的話，一個新的、團結的、強大的中國應該能在當時的革命情緒中產生。

● 要假定兩岸統一能出現對雙方有利的互補，需要一些基本的條件。

丁：意思是說因為美國介入逼使中共向蘇聯一面倒？如果歷史不是那樣走，中共取得大陸之後，社會主義理想就能實現？

楊：當然，另外還有反封建的過程……

丁：這真是個很大的歷史假設，很難證實。在毛死後，大陸上極少數知識份子也有類似的想法，認為四九年後中共對蘇一面倒，是因

為美國介入了中國的內部事務，導致中共領導人為了民族的利益，不得不聯蘇抗美。但這種觀點在大陸上沒有很大的影響。我很了解大陸上這些人，他們大部份是研究外交史的，但多半缺乏歷史感，也缺乏理論分析的能力，更缺乏把政治過程中言論與實際動機辨別開來的能力。舉個很簡單的例子，美國軍艦進入台灣海峽究竟是中共一面倒的原因還是結果？它是很長的因果鏈條裡的一環，你在完全瞭解當時的各方領導人真正的動機之前，是搞不清的。例如去年葛羅米柯回憶錄裡披露說當年毛澤東叫蘇聯把美軍引進中國大陸，然後用原子彈來打他們。我認為葛羅米柯講的可能還是比較靠近事實的。毛澤東眼中沒有人民，沒有生命的意義，只有他個人的野心。在某種情形下，他的野心和大部份人民的命運是可以相呼應的，但絕大部份的時候是根本衝突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搞清楚毛澤東及各方領導人的動機。才能瞭解韓戰為什麼爆發，美軍為什麼會進入台灣海峽。你怎麼能夠分清是什麼導致了什麼？這是我不能同意的歷史觀。

楊：那在現實層面上呢？他們以為台灣與大陸統一後，在經濟、政治上能互補。例如大陸缺乏科技及管理人材，台灣缺乏主要工業資源；又台灣出口市場受美國控制而大陸可以提供新的、廣大的市場；政治方面，台灣的政治經驗可以幫助大陸民主改革，台灣較高的教育水準可以刺激大陸……

丁：要假定兩岸統一能出現對雙方有利的互補，需要一些基本的條件。至少大陸一方面對統一以後發展的構架必須是開放的。什麼也不堅持，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也不堅持現有的權力安排。具這樣前提才能保證互補。假使統一以後，中共仍堅持不能放棄現有制度，台

灣的政治經驗又怎能對大陸改革產生大作用？

楊：你認為這個前提成立的可能性如何？

丁：僅僅靠中共自己改革是不行的。自願的徹底放棄原有的體制在人類歷史上即使不是無有也是罕見的，而這種現象在共產主義制度下還不曾發生過。

楊：有些人認為正因為要期待大陸內部這種自發改革非常困難，如果先完成統一，讓台灣這樣一個不同的政治實體加入後，中共勢必會被迫尊重這個實體的某些運作規律，因而放棄一些堅持。你同意嗎？

丁：我不認為抱有這種想法的人在主觀上想損害台灣的利益，但這種良善的意願是否能落實，却值得考慮。毫無疑問，許多中共官員到香港或西方去過後，改變了一些落伍的看法，但仍不要忘記一個基本的事實，有一些人去過西方、香港之後，非但沒變開明，反而變得更保守了。他們一看民主社會裡當官、當領導人是多麼難的事情，覺得還是專制好。一部份人變開明，並不表示就能有一種制度化的保證。如果要利用統一帶來的異質，刺激變革，那麼在改革達成前，台灣制度本身的特質就不能消失。否則，那就沒什麼衝擊力了。把話講明白，從長遠來講，我希望有統一的局面，但這一必須是民主法治條件的，而且不能在基本條件成熟前冒險胡來。

楊：可是很多人在台灣根本懷疑保存這種統一意願的正當性。認為要強調台灣意識，認為目前最重要的課題是如何把被淹沒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的台灣人的利益突顯出來作為決定台灣命運的優先考慮。從政治方面來講：大陸目前處於着重刺激生產的階段，雖然要走資本主義路線，但這走資路線仍是由國家控制、設計的，權力仍然是屬集中型態；台灣則過了

這階段，面臨政府如何放鬆，去中心化、分散、少干預、少限制民間活力才能達到最大利益的問題，這兩種走向基本上是無法並存的。戈巴契夫目前很頭痛的一個問題就是：可以用權力強迫集中，卻無法同樣以權力強迫分散。因為使用權力的同時就是意謂着集中。很多人相信，如果統一，中共這股強大的集中力量勢必對台灣社會自發的進步有很大的阻礙與傷害，很可能還沒有衝擊到大陸的政治，台灣社會自己先要被強迫吸納入那個大集中力量裡。經濟上，台灣現在真正碰到的問題是工業要升級，要生產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如果在這個關鍵時刻跟比較落後的中國大陸結合，廉價勞工再度充沛，勢必使台灣經濟停滯在原有的階段，甚至倒退回勞動更密集的產業階段，同時也會傷害台灣勞工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一點地位。並且還要冒受大陸干涉經濟自主活動空間的危險：

●兩岸交往中不要只有一種聲音讓北京聽到……

丁：「統一」只是兩個漢字組成的一個詞，實際上有各種不同的統一方式。你剛才提統獨的兩種想法，都只是講統一可能造成的狀況之一種，並沒有考慮其他多種的可能。以工業升級來說，台灣商人若出於市場理性、貿易競爭的考慮來選擇與大陸資源結合的方式，這是一回事；通過政治的手段迫使企業家把自己的資本同大陸結合，這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種情形下，商人如果發現情況不如預期，馬上可以調整。如熊彼得（J. SCHUMETER）說的……只要市場制度存在，即使有毀壞，也是創

造性的毀壞。一些東西毀掉了，新的更好的東西却產生出來。經濟上的互補或損害完全看在怎樣的結構中往來。自願的，可以隨時調節和選擇的，那不用擔心，商人願意幹就讓他們幹，政府既不要去鼓勵也不要禁止。總結結構，就台灣方面來說，我覺得現在重要的是要先把台灣搞好……

楊：可是對比較傾向獨立的人來說，基本信念正是如果不先解決統獨問題，台灣不可能好。例如說民主化，如果不先站定台灣的自主立場，而繼續允許中共聲稱隨時擁有干預的權利，即使真有民主的程序，也還是沒有真正自主的決定。

解決中共威脅的方法絕不是保持現狀，相反的是應宣佈獨立。必須先伸張自己基本不可侵犯的權利，突破國際間被中共刻意逼迫造成的孤立狀態，重新回到國際社會，取得別人的尊重，這才是一舉擺脫中共威脅的最佳辦法。如果一直不敢伸張這種權利，那根本不必妄想別人會尊重。中共或中國人之所以一直認定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正因為他們從沒有聽到台灣自主的聲音。不讓他們聽到，永遠也不可能改變他們的想法。不解決統獨而談民主，就像兩個小孩投票決定不去上學，但爸爸却隨時可以打得你不敢不去，這種決定不但沒有意義，更重要的，沒有尊嚴。

丁：你講的這種心態我完全可以理解。達到這種理解是我出國以後最大的收穫之一。站在這個角度去考慮問題，完全可以自圓其說。但合乎邏輯的出發點在現實中不一定切實。先爭取形式上的獨立，會導致怎樣的客觀後果？對這樣想法的人，我們不可能讓他們放棄其價值承諾。但從具體方面來看，我覺得與其把統獨的問題弄出一些無法控制的後果，還不如好

好專注地把台灣弄好，技術升級、民主更穩定，對大陸關係採取更開放的態度。我贊成兩岸交往中不要只有一種聲音讓北京聽到，不要讓國民黨壟斷了和大陸間的交往。讓大陸知道在台灣有各種想法，使中共不要再簡化對台灣的印象，這樣對決策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楊：但在這種情形下，與大陸交往並不是對等的，如果台灣獨立了，以平等與國與國的關係，一樣可以做這樣的交通啊？

丁：把這種既非內政亦非外交的關係變為純粹的外交，在邏輯上完全可以成立，問題是邏輯不等於事實。這只是目標。令你理想的目标不見得做得到。在實踐的過程中目標也有可能會改變，而且新的現實狀況出現時，人們也會有新的調整，重要關鍵還是現實的出發點而非邏輯理性。

楊：對統獨方面，我們暫且打住吧，最後我想問一個比較敏感，甚至你會覺得似乎帶點「表態」意味的問題：你對國民黨的評價如何？

丁：大陸上像我這一代，尤其是我這種家庭背景的人，在七〇年代以前對國民黨是百分之百的否定。我們有時都覺得很滑稽，為什麼這樣一個黨能在大陸上統治很長一段時間，跑到台灣去後，到現在還沒被台灣人民推翻？但出國以後，我發現毫無疑問地，國民黨在四九年以前是有很重大的失誤，但在歷史上也做過些有意義的事。國民黨到台灣後，在有些問題上，比較深刻地吸取了在大陸上失敗的教訓，試圖做些較大的調整。也許我吸收的資訊不全，不過國民黨到台灣以後提出「毀黨造黨」的口號，這就比大陸上講整黨、整風不知要強多少倍，這其中隱含這個黨已經壞掉，需要徹底動手術。在這點上，痛切的程度可以聽得出

來……

丁：另外六〇年代以來，國民黨在經濟決策上正確的超過錯誤的，否則台灣的經濟不會搞得現在這樣。當然你可以說主要是人民的努力，這點毫無疑問，但至少政府沒有因為採行愚蠢的政策使底下的能力資源浪費掉，這種錯誤是大陸和東歐都發生過的。在政治上，蔣經國去世前廢除戒嚴令、開放黨禁報禁，我覺得是非常明智的。他能在太遲之前做出這種改變，仍然是值得稱讚的。當然社會的壓力是重要原因。而且我覺得早先國民黨允許大批的台灣學生到美國留學是對的。也許敞開大門所獲致的結果與所期待的不一樣，但在客觀上，對台灣的健康發展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礎。

楊：那你如何理解為什麼近幾年國民黨在台灣幾乎成爲各種不同意見共同攻擊的靶子？

丁：對這些攻擊的具體內容我不了解。不過從歷史上比較來看是可以理解的。在一個社會裡，批評的深度、廣度與政權的表現好壞之間不是單一的對等關係。具體來講，也許是國民黨一直當政，當政時做對的事，人們會覺得是應該的，錯的，包括歷史上做錯過的，人們當然找你負責。受過不公平待遇的人更不會忘記。這說明一個很基本的現象，一個黨始終執政，不允許公開批評，突然開放時，是對它最嚴格考驗的時候。

●我若是國民黨當政者，我就不會如此守成。

楊：在國民黨聲望最低時，你們偏重指出它的一些優點，在統

獨問題上又大致支持不統不獨的國民黨式現況。我不懷疑你說這些話的真誠，但從策略上來說，你採取這樣的立場，很可能讓你所說的其他意見也不容易在台灣被接受……

丁：關於台灣對胡平的評論，我在此無權替他回答。就我本人，我可以講幾點。首先，我相信會有一些台灣人士認爲我爲國民黨說話。但這種誤解忽視了一個關鍵點，就是：我只是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在發表我的觀點，而不是以一個介入者的身份在要求你們台灣人士就內部政治做什麼或不做什麼。對四九後台灣發展的評論，很多西方學人與我相似，我想他們也沒有動機來爲國民黨說話。再者，如果在某些觀點上與國民黨有共通之處，這只能以知識社會學來解釋，而不應用動機心理學來解釋。譬如我爲什麼在台獨問題上觀點相似於國民黨？你就要從文化、歷史等角度去追溯。第二，在主觀意識上我絕對沒有替國民黨說話的動機。不管在哪裡，我都不會讓自己的知識活動成爲某一執政黨的喉舌。說到底，若出於勢利心認同一個黨，爲什麼我不認同中共？它不是大得多、強得多、又統治我的本鄉故土嗎？第三，對於我的講話在台灣何人贊同何人反對，我不怎麼關心。道理很簡單，我對台灣的聽衆效應若太關注，成爲我說什麼和怎麼說的出發點，我就會誤導自己，只關心講一些迎合的話。我只能從自己的現有知識和道德感出發，講自己想講的話。隨着知識的增進，修正我以前的不正確觀點，但我絕對不會因爲一部分聽衆的反對而講違心之論。最後，在獨統問題上，我有很多想法目前尚無把握說出。倘若說出來，你就會發現我與國民黨現行政策大不一樣了。譬如，我若是國民黨當政者，我就不會如此守成。一個小島，你能守得住成？大陸那裡才

是天下！在十一億人口的社會裡推進和富裕一分，在歷史上也遠勝於一個小社會裡推進三寸！但類似的話我不願多說，因爲我不是台灣這個政治社群的一份子，我無法和台灣人民一起承擔我的許多想法進入現實以後可能產生的後果。我說話不能忘了責任！（完）

編者按：

本文原登台灣自立晚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刊有所刪減。

大陸留學生吳牟人、徐邦泰、許成鋼、錢穎一、斐敏欣等五人，將於明天正式來台訪問。本刊特別推出策劃多時的專輯——面對中國。系列，邀請此刻在美國哈佛大學進修的青年歷史學者楊照，訪談多位傑出的大陸留美學生與文化人，希望站在台灣本位的立場，觀照海峽兩岸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在國共對立的歷史格局下，呈現出的不同觀念與思考。首篇我們刊出楊照與丁學良的對話；丁學良幼時生於皖南農家，才思敏捷，辯才無礙，初中曾是紅衛兵頭頭，因表現傑出入選工農兵學員，後入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研究所研讀。大陸馬克思人道主義思想論戰時，丁學良是其中佼佼者，甚受中國社科院蘇紹智推崇；丁現在哈佛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課程，一度也曾是台灣官方欲邀請來台訪問的留學生之一。

—編者

中國的回答

社會主義在危機中

譯者前言

埃爾溫和海蒂·托福勒合作著述，其作品涉及社會、社團、政治演變等各個領域，像「未來底衝擊」、「第三波」（亦譯「第三次浪潮」）等書，已被譯成三十多種語言出版。他們與戈爾巴喬夫底談話，以及現在這篇「趙紫陽訪談錄」，是即將完成底新書「權力之未來」底一部分。

托氏究竟不愧為名家大師，他們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底進程、癥結，及其世界歷史地位都瞭解得十分透徹，因此「訪談錄」寫得高屋建瓴，深入淺出，頗具可讀性。

與大多數就事論事底西方觀察家不同，托氏把中共經改放進世界社會主義整體性危機底架構中加以考察。儘管他們套用了第三波理論，而該理論本身也不無可以商榷之處，但其歷史論述和實證分析部分，基本上無懈可擊。因此，拜讀之後，哪怕最不懂經濟學底讀者，都可以得出這樣底結論：現代社會主義體制不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已到了山窮水盡底

地步。除非突破傳統社會主義底局限性，全面引進商品市場機制和自由民主政治，否則，所謂價格改革關關和發展戰略提昇，到頭來都不過是偉大底空話。

那麼綜觀全文，托氏對中共經改前途底基本估計，到底是樂觀還是悲觀，希望還是失望呢？

以我之見，他們是悲觀失望底。正如方勵之先生所說，對中共改革越不瞭解底才越樂觀，而越瞭解底人則越悲觀。托氏對中共經改研究頗深，所以才能分析得鞭辟入理，所以也就不會盲目樂觀，尤其當它接近到政治改革和言論自由這個臨界點底時候。

當然，作為洋人，他們對大陸經改底態度，一如對所有中國事務底態度一樣，難免使人感到某種程度底置身其外和隔岸觀火。例如勸誠人們不要低估鄧趙及其智囊團底能力，確信經改最終會成功，人類底四分之一不能被拒絕進入二十一世紀等等，與其說出自理性底分析，倒不如說更像良好底祝願和客套話。

熟諳中國歷史底人都知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中國大陸目前面臨底歷史性轉折，並不取決於少數精英份子底個人能力。因為中共底局限性，自有其深刻底歷史根源，階級根源，乃至思想理論根源。要突破局限性，需要中共自身發生一次「質底飛躍」，亦即自我否定，使它不再是現在意義上底共產黨。這難道是鄧趙等人可以做到底嗎？

至於能否進入二十一世紀，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凡看過影片「老井」和「黃土地」底人都知道，中國尚有數億人停留在以飢餓、貧窮、和愚昧為特徵底半原始狀態。如果說，他們連二十世紀都還沒有進入，又有誰可以保證他們能按時進入二十一世紀呢？

當然，這怨不得時間老人。他對所有人都

是公平底。
究竟應該怨誰？究竟應該怎麼辦？
這一切，都值得我們深思。

程鐵軍

封閉社會將會開放得足以參與高技術革命嗎？在同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國家領導人難得的會見中，對此問題的新啓示。

當世界社會主義經歷了至少半個世紀來最為嚴峻底危機以後，一輛由中共官方報社提供底莫塞迪斯牌轎車，風馳電掣地駛入北京中海高高底紅牆裡，它載我們去獨家訪問中國經濟改革底領導人趙紫陽。

趙和其他中國高級領導人生活和工作在這個戒備森嚴底，毗連着紫金城底獨立王國裡。他們要爲十億多人創造一種市場導向型社會主義底企圖，顯然是世界上最大型底經濟試驗了。隨着席捲蘇聯底變化，中國底改革從整體上執世界社會主義制度未來底牛耳。

一九八六年，我們在莫斯科會見過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並且密切觀察了深化中底世界社會主義危機。現在，作爲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報」底客人，我們又來到了北京。

我們想回來看看，中國底改革進行得如何。當其它社會主義國家艱難邁向二十一世紀底時候，中國有什麼戰略教訓（如果有底話），可向它們提供。

世界新聞界充滿有關趙和改革派受挫底報導，尤其關於推遲進行承諾已久底物價改革底決定。有些國外傳媒甚至準備把全部改革進程渲染成一敗塗地。

如果這些大膽底預言不幸言中，中國改革體制底希望遭到破滅，那麼，不但趙和現領導層將被清除，而且其影響之深遠，將達到華沙、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

不僅如此，儘管彼此未經協商，趙底壞消息也是戈爾巴喬夫底壞消息，反之亦然。他們都面對着自己底反對派，那些人會急

忙援引外國發生底失敗或倒退，以此作爲阻止本國改革底理由。

這樣一來，結果甚至可能是，由反戈爾巴喬夫底蘇聯領導層危險地復活一場冷戰和軍備競賽。

改革剎車

八十多歲底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爲發動改革奪得了權力，並爲改革進行了策劃，但目前負責實施改革底却是趙紫陽。他是共產黨底總書記，也是鄧親手選拔底接班人。

經過一年多過熱底通貨膨脹，商品搶購，銀行擠提，原料短缺，投機倒把，官僚腐敗，謠言四起，犯罪增加，哄搶糧車，對抗中央等等——所有這一切都引起緩行改革底呼聲——北京恢復了一種脆弱底平靜。

新底銀行信用和投資受到了控制，對承諾過底物價改革底推遲，以及在政經分權化十年以後企圖重建中央控制，所有這些都使改革底前景蒙受疑問。

我們恰好在改革剎車底時候訪問了趙紫陽。六十八歲底他看上去身體健康，而且年輕十歲，他底皮膚明亮而潔淨。奇怪底是，他一頭灰髮，而稀疏底兩鬢却呈褐黃，並略帶微紅。他身穿一套剪裁得體底藍灰色西裝，不拘禮數地坐在我們身旁，兩腿伸展，露出一雙灰襪和略微穿舊了底平底便鞋。

當一名幻影般底青年男侍，身着白裝，白鞋、白手套，默不出聲地端上啤酒、茶水和熱毛巾底時候，趙開始以明白易懂，令人信服底語調解釋說，儘管現在需要暫緩，但改革依然

進行——其長遠目標是不變底。

趙本人是友好底，時常微笑，但他不善迎客。他既沒有雷根總統底熱情和魅力，也不像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那般光輝閃爍，但他底思路更爲清晰，傳導出溫和底力量。中國偉大底前總理周恩來相比較，他對世界事務瞭如指掌，——而且渴望知道，這一偉大試驗與全球底利害關係。

中國非資本主義前景

首先，中國底新經濟革命一直被西方所誤解，歡呼它是向資本主義底倒退。

實際上，趙和他底改革派積極推動市場經濟，並非是要引進資本主義，而是以它作爲修補社會主義底手段。

「我們不要毫無控制底無政府主義，」趙對我們說。他極爲認真地挑選着字眼，向我們一再講述那個已經成爲官方公式底見解：「將來中國底經濟模式是以公有制爲主體底商品經濟，國家調節爲主，市場調節爲輔……。」

「在西方，在資本主義國家，是私有制底商品經濟。在蘇聯，則是公有制底產品經濟。」

在中國底語匯中，「商品經濟」是指貨品爲在市場上出售而製造；「產品經濟」則是指貨品按照中央計劃生產與分配。

「我們底說法是，」趙解釋道，「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中國人所說底「深化改革」，就是指該二者底結合。

有重要意義底是，他繼續說道：「在日本和南韓……有國家干預，雖然他們自稱是市場

經濟。在我國，政府干預可能更多，但經濟將由市場調節。」

在通貨膨脹和其它條件變得「較為有利」之前，對價格進行市場調節底努力雖然得延緩，但趙堅持認為，改革底努力不會停止。相反，重點將轉向「企業改革」，意即改變大中型國有企業底所有制和經營管理。

西歐、拉美和其它地方教條式底社會主義者們，仍然認為國有化和政府管理企業是社會主義底基本特徵。但是，生活在這種管理底惡果中底趙紫陽，却認識到它底嚴重底官僚主義和腐敗倒退。

與我們底談話刊登在第二天「人民日報」底頭版，趙對這一問題做了最為明朗底公開聲明。他計劃對現存底大中型國有企業實行他所謂底「股份所有制」。

「公有制，」他說：「並不明確財產歸誰所有。國家所有，誰來負責？」

「將來，我們還要保留公有制，但是財產要歸不同底所有者。可以歸中央、省、縣各級政府。有些（股份）可以歸公司和企業。有些可以歸雇員，甚至社會上底個人。所以是多種所有者底公有制。」

但是，這種「所有制」底含義是什麼？所有者將控制企業嗎？不是底。

其打算，趙繼續說，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底分離。所有者不參與經營，而經營者可以不是資產所有者。」

我們懷疑趙是否讀過詹姆士·本漢姆所著底「管理革命」，或者A·A·博爾所著底「沒有資產底權利」，這兩本書都記錄了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美國管理精英們從股票持有人控制下逐漸獨立底過程。同樣值得懷疑底是，趙或者他底幕僚是否知道華爾街目前底辯論，

它們是關於兼併風潮和重新恢復股票持有人對很多美國大公司底控制問題。中國底問題與此不同——而且更為深刻。

當所有者與經營者底鬭爭在美國鬧得熱火朝天底時候，趙紫陽底問題是停止黨對管理底干擾。他想重新設置黨組織底控制，使之不損及管理者底積極性和責任心。然而，我們底印象是，不論趙還是面臨同樣難題底戈爾巴喬夫，都還沒找到可達此目的底途徑，也未能有效地設計出必要底意識形態理論。

同樣，當趙告訴我們（如同蘇聯改革家說過底一樣）：「我們試圖引進西方底管理方法，但又不放棄社會主義，」我們立刻提出底疑問是「什麼方法？」

當發達國底經濟從「第二次浪潮」底大烟肉技術及其組織，過渡到「第三次浪潮」底高技術及其組織時，西方底管理方法也經歷了急速底變化。

縱觀美國、日本、和西歐，馬克思所說底「生產方式」底轉型，正迫使經營管理向較少底等級制和權威性過渡，各種新模式正在發明和應用中。

究竟社會主義改革家們是在盲目而爭先恐後地採用昨天西方底管理方法呢？還是在考慮最為先進底模式？不論第二次還是第三次浪潮，究竟有多少方法可適用於中國文化底獨特需要？或就此而言，適用於其它特定文化底需要？

我們同趙紫陽討論了發達底，計算機化底，以信息為基礎底經濟制度正在湧現底某些特徵。「你們給我們描繪底是一個非常深刻底變化……」他回答道。「新技術革命或者信息革命……有可能幫助中國跳越一些其它發展中國家業已經歷過底階段。」

趙相信，「我們為自己設計底道路是前人從未走過底。」

昔日的惡夢

史學家和理論家們或許人言人殊，但有一件事使中國區別於世界其它各國，那就是，極少有哪個民族有中國這樣悲慘、痛苦、和滲透了鮮血底過去，沒有誰對往昔懷有如此刻骨銘心底記憶。

對局外人來說，感覺——而非僅僅理解——通貨膨脹和政治動亂底含意是困難底。在中國，單單這兩個字眼就能喚起人們對昨天可怕情景底猶新記憶。一九四九年革命之前，蔣介石領導底中國曾被瘋狂底通脹所困擾，並且徹底陷入腐敗底泥淖而不能自拔。飢饉成為家常便飯。較近以來，毛澤東底十年「文革」使國家淪入實際上底無政府狀態，屍骨如山。對死者數字底估計各不相同，少則數以十萬計，也許高達幾百萬。

由於對過去底災難銘記於懷，所以中國現領導層對社會和政治動亂底信號異常敏感，誰也不想讓過去重演。

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面對同步發生底通脹、學生示威、非法罷工，以及領導人天然盟友知識份子底離心離德，中國領導人決定，在對付價格改革這個最終檢驗目標之前，先給通脹降溫滅火。

該決定引起人們對一個戰略教訓底注意，它不僅適用於中國，而且適用於世界各國底社會主義改革家。當你從一個嚴密控制底，封閉底，和凍結底經濟向一個對世界開放底，積極促進革新、發明、和企業家精神底經濟過渡時

，如何才能抑制通貨膨脹？

中央計劃和中央銀行

一件顯然不可做底事情是，當你還沒有首先把其它經濟管理加以制度化底時候，却放鬆了中央控制。

社會主義者把資本主義想象為計劃經濟底對立物，然而，連最放任自流底西方政府，也試圖通過中央銀行底操縱而對經濟實行宏觀管理。其實，如果說中央計劃是傳統社會主義底標誌，那麼，中央銀行則可被看作資本主義底標誌。

中國削弱了它底中央計劃體制，極大地分散了決策權，給予省市較多底財政和政治自由，但沒有首先加強中央銀行底控制制度。如此以來，它就嘗到了一場巨大底，不受約束底信用爆炸和過量投資底苦果，從而導致了今天底高通貨膨脹。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央銀行提高或者降低利率，確定普通銀行必須擁有底資本儲備，出售政府債券。它們力圖用這些手段來刺激經濟成長，或者阻止通貨膨脹。

中國於一九八三年創立了中國人民銀行（實為確立了它底中央銀行地位——譯註），但該行仍然缺乏必要底機制和能力，去控制信用和撲滅通貨膨脹底火焰。

例如，中國人民銀行被迫向普通銀行底儲備金支付利息。中央銀行打算取消這項導致通脹底要求，但普通銀行都有足夠底權力抵制此項動議。

趙紫陽和他底改革派談論所謂從「直接」控制轉向間接控制。但是，在尚未建立起強有

力底使中央銀行可以發揮作用底間接控制以前，他們却開始放鬆中央計劃底直接控制。現在他們正為此付出代價，業已喪失對關鍵性經濟過程底控制。價格改革底推遲給他們以恢復控制底機會。

價格改革的隱蔽含意

然而，趙紫陽偉大試驗底最終考核——不可避免底價格改革，經過必要底拖延以後，終究還會到來。

價格改革是塊巨石，很多社會主義政府和權力精英在它面前碰壁。無論中國還是蘇聯，都沒有提出什麼新底方案去衝擊根深蒂固底權力結構。隱藏在擬議中底價格改革背後底，是對世界社會主義基本戰略底一場深刻挑戰。

對此，許多西方觀察家又錯誤地解釋了問題底含義。

自由市場底神學家們，從香港、新加坡和西方湧入中國，皮箱裡攜帶着他們現成底公式。對他們多數人來說，問題僅僅是採納還是拒絕。中國必需停止讓計劃人員和政府官僚制定價格，必需讓所有價格由供求去確定。

理由是這樣底，沒有價格去靈活反映，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反映消費需求底低落或高漲，生產者就會缺乏有用底信號，從而繼續生產過剩和（或）生產不足。中央計劃人員，不可能為複雜底，瞬息萬變底經濟所需要底，成千上萬種各不相同底產品和勞務定價，同時又不犯導致巨大浪費和阻礙經濟發展底「不合理」決策錯誤。所以說，政府定價是件緊身衣，必定延緩發展。

此話聽來有理。但它只是對問題底狹隘底

技術性觀點。

共產黨領導人理解，甚至也許同意自由市場論者底純技術性分析。但是他們正確地看到了問題底更為深刻底方面。

在目前情況下，開始允許所有或者大多數價格根據市場自由浮動，將意味着生活費用底急劇上漲，特別在城市，這將為通脹火上加油。

然而，問題遠比這更加關係重大。因為價格改革，是每個力爭經濟現代化底社會主義國家所面臨底火底考驗，並且我們將會看到，沒有什麼東西比它能更深刻地觸動權力結構了。

腐敗的關係

宋庭明是北京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底一位副主任。是宋和「人民日報」編輯部底幾位經濟學家，幫助我們明白了中國底物價制度與腐敗問題底直接關係。

故事從下面底農村說起。

在趙和他底良師益友鄧小平對中國經濟進行徹底底檢修之前，組織在公社裡底農民，被迫按官定價格向政府出售他們所有底產品。最初底改革措施之一，是實行一種「合同制」，照此制度，農民仍舊按政府定價繳售，但是其剩餘部分可以按市場價格出售。（後來在某些工業部門也實行了類似底制度）其結果是食品生產底快速增長，以及貨幣流入鄉下人底腰包。

由於農民從市場上總能比國家低價更多獲利，所以有一種刺激使他們扣留產品，欺瞞，以及必要時賄賂官員，以便把更多食品賣給私

人部門。

反過來，付出低價，使政府有可能把食品以低於市場底價格在城市出售。實際上，政府以比收購價還要低底價格賣出其「合同」食品，這樣就對城市工業人口實行了雙重補貼。（一次掏農民底腰包，一次掏國家底腰包。）然而，農民並不傻。有些人跑進城裡，以極低底補貼價購入廉價食品，再以較高底市場價轉手倒賣。這樣，同一袋穀糧或大米，可以循環往返若干遍，與此同時，肥了精明底投機者，也推動了食品價格底上漲。

在某些工業部門，隨着價格底雙軌制也出現了腐敗和投機。對於普通誠實底公民來說，沒有比看到別人從此種制度賺取不公道底、狡狴底「資本主義」便宜更能激怒他們了。有些年長底中國人，把這種新底、急速崩潰底道德行為，與他們相信曾在一九四九年革命之後盛行過底「社會主義底純潔性」兩相對比。

他們說，如果這就是改革，誰需要它呢？簡言之，價格改革，遠不是技術經濟問題，而成了具有最高道德和政治重要性底問題，不僅是經濟學家底事，也是警察、出版界、和政治家底事。

最後，價格政策使我們注意到另一個更為深刻底問題，中國人稱之為「工業偏好」。我們被告之，從某種程度上說，價格改革之所以不可避免，其原因在於現存價格體系底「不合理」，以及向農業轉嫁負擔，雖然農民首先從改革中獲益。

據「人民日報」經濟學家戴雨晴說：「這種不合理性障礙了農業生產……，這在社會主義國家頗具共同性，包括東歐在內。」戴底同事劉允洲，「人民日報」經濟部副主任，對比了小麥和肥料底價格。劉援引底數

字顯示，假如一位中國農民用一市斤小麥去交換肥料，他能換來底要比一個日本農民少一半。

我們相信，社會主義危機之所以現在發生，並非由於理論上底矛盾，或者由於資本主義底敵視，而是由於發生了一個決定性底歷史事件，那就是，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革底強有力底「第三次浪潮」興起了。

如果說，農業革命引起歷史變革底第一次浪潮，工業革命為第二次浪潮，那麼今天，主要發端於信息、電訊，和教育底，向不同質高技術社會底加速邁進，可以被合理地看作是人類歷史進化底第三次革命。

這次偉大底過渡開始於資本主義世界，而且一直在加速進行。如此一來，社會主義經濟即使依然增長，而非停滯不前，但用相對標準衡量，社會主義世界仍然會繼續落後，因為非社會主義國家底技術已經突破原有底限度，達到了一個完全不同底經濟發展底新水平。

一九五六年，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可以傲慢無理地夢想「埋葬西方」。具有諷刺意味底是，在美國，一九五六年恰好是勞務和白領工人從數量上超過藍領工人底頭一年。這個過渡，預示了烟肉經濟底衰落和第三波經濟底興起。

今天，乘着變革底第三次浪潮，高技術底資本主義國家在技術經濟發展上躍進得如此之遠，以致於樂觀底社會主義領導人也說需要幾代人底時間才能趕上去。而差距每天都在擴大中。

這並非因為蘇聯人和中國人以絕對標準衡量必然地落了後，而是因為非社會主義底工業化國家前進得更快些。它們經歷了一個馬克思所說底「質底飛躍」，那是凝聚了衆多變化底

結果，並非僅僅由於連成網絡底小型電腦底使用。

馬克思曾給革命形勢下過經典式底定義。他說，當「生產底社會關係」（意即所有制和控制底性質）障礙了「生產手段」（大體上說就是技術）底進一步發展時，革命形勢便會到來。

不言而喻，這是對當前世界社會主義危機底透徹說明。

各個地方底國有制和中央計劃，雖然有過短時間底成功，但歸根結底障礙了第二次浪潮，或者烟肉工業底發展。更糟糕底是，它們使社會主義國家極難利用今天第三次浪潮底變革，以實現財富創造過程底轉化。

新「生產方式」

正如封建主義底「社會關係」阻擋過工業發展一樣，目前社會主義底「社會關係」阻擋着馬克思所說底，帶來新「生產方式」底第三次浪潮底變革。

在美國、西歐、日本和東亞底新興底第三波經濟中，信息成為關鍵底原料。規模經濟底重要性下降了。高速運轉，準時交貨，有能力生產和銷售短綫，而不僅是長綫底多樣化產品——事實上在很多情況下，比廉價勞動耗費更為重要。

另外，知識作為新底關鍵原料，不像煤炭或鋁矾土那樣可以用盡，它可以隨着使用而不斷再生。這有別於常規底經濟學，不管是馬克思主義底還是古典派底。

今天，在發達國家，雖然財政資本底積聚仍然繼續，但實際經營運作却變得日益小型化

和多樣化。勞動分工更加複雜了。產品、銷售渠道、通訊聯絡、社會機構，以及個人，整個制度底每個層面都向着非大型化發展。社會主義賴以建立底「群眾」，共「群眾性」和統一性日益減少，個人性有了增加。

自由的經濟學

所有這些都引出一個最終底疑問。沒有充分擴展底表達自由——開放不同政見、討論，以及政治辯論——能有任何一個社會可以走向以信息和發明為基礎底第三波經濟嗎？

戈爾巴喬夫實行了透明性——開放自由討論——，以此作為經濟體制改革底支柱。與此相反，雖然中國人在經濟改革上遠比戈爾巴喬夫大膽，但在表達自由方面却大為小心謹慎。這種對比也許可歸因於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蘇聯曾經享受（如果此語正確）了長期底政治穩定，而中國即使近期以來也不曾有過這種穩定。

在同趙紫陽底談話中，我們說，新生產方式要求「一支有教育底，有創造性底勞動力，它是自由底，不怕信息交流……，表達意見底自由已經不再僅僅是政治問題，而且是經濟發展底前提。」

趙回答說：「這是個人類自由底問題……，我們想擴大社會主義和自由。但是，發展底先決條件是安定。」

我們說：「這是可以理解底，特別在像中國這樣一個不久以前經歷了動亂底國家。但是，沒有表達自由就不會有發展。」

趙對此沉思片刻，然後說：「自由底程度

與發展水平有關，所以我們必須一步一步走。為了發展民主，穩定是必要底。」

言外之意，只有人民受過較好教育和提高生活以後，他們才有可能享受較高級底自由。從而留下了未加回答底循環反論——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我們溫和地提醒趙，作為「未來底衝擊」這一術語底發明人，我們十分瞭解，當個人或是國家經受過太多太快底變化以後，有可能變得不能穩定。我們打趣說：「中國真正想要底是第三次浪潮，但又不帶有未來底衝擊！」

趙點頭大笑，表示同意。當我們同他告別再見底時候，他說：「十年以後再來，我們將看到這場試驗底結果。」

沒有人自命可以洞悉地球上這場最偉大底經濟試驗底最後結局，包括趙紫陽在內。但是，低估鄧、趙和他們周圍這幫人底能力是錯誤底。為中國底改革發佈計開選為時過早。

離開北京，在毗鄰底香港、台灣、新加坡，和日本看到了瞬息萬變底景象——所有這些鄰居都迫使中國在當前底逆境中掙扎，雖然趙和鄧在從內部推動它——，這使人想到，即使困難重重，他們底改革最終還是會勝利底。

不管新底東亞被稱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第三次浪潮——還是其它什麼完全不同底名字——都無關緊要，因為，佔人類四分之一底中國人，是不可能被永遠拒絕進入二十一世紀底。

摘自「春秋雜誌」

自由的訣竅在於勇敢

—「中國大陸政治避難者協會啓事」

準備尋求、正在尋求或已經得到美國政府政治庇護的中國人，組織起來！
我們要能發揮更大的力量；我們要幫助自己和一切苦難中的同胞獲得自由；
我們要爭取世界民主人士的關注和支持，就只有組織起來！

在這個協會中，我們將：

- 交流有關政治庇護的經驗；
- 提供政治庇護必要的資料和知識；
- 爭取各界同情人士的聲援；
- 加強與專業律師的接觸和聯繫；
- 動員新聞界的支持和輿論的力量。 翻譯中英文件。

一年來，本會曾幫助某些人士獲得了政治庇護，我們具有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打算尋求政治庇護的人士，請與我們聯絡，我們將為你提供諮詢服務。
追求自由的大陸人士，請加入我們的組織，團結就是力量，未來將屬於勇敢而自由的靈魂！（首次來信請付諮詢費\$20元）

通訊處 76-11 Roosevelt Ave. Box 162 聯繫人：王忠蜀（會長） 葉常華（理事）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朱永祥（理事） 李過雄（理事）
TEL: (718)507-4739 劉翔（理事） 閔仙清 理事



國內參考消息

黎音

班禪猝逝之迷議論紛紛

一向身體健壯，滿面紅光且精力充沛的班禪額爾多尼·確吉堅贊大師於一月廿八日在西藏日喀則市猝然逝世，對於他意外的死因，不僅西藏僧俗民衆表示懷疑，而且在全國各界也頗多議論。

由西藏傳來的消息說：據班禪喇嘛身邊工作人員反映：班禪大師以往並無心臟病史，更從來沒有過心臟病發作的情形，而且他於一月九日由北京啓程前往西藏之前還作過全面體檢，證明身體健康、正常。既使在班禪喇嘛發病之前的幾小時，接近他的也沒有看出他的身體有絲毫不適之感，却為何僅半宵之間便患了那樣嚴重的心臟病而猝然涅槃？難怪人們議論紛紛。

據瞭解班禪喇嘛的人士透露：班禪對中共歷年在西藏的所作所爲以及將其當作統戰工具進行擺佈的做法心懷不滿，雖囿於客觀形勢所迫，在一些場合講過違心的話，但在私下對中共常有微辭。尤其是近年西藏連續發生僧俗民衆暴動，中共採取嚴厲的流血鎮壓手段以來，班禪喇嘛對中共的反感與日俱增，甚至在公開場合批評中共，將抨擊的矛頭直指中共在西藏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幹部政策。中共雖在表面仍對班禪尊重、信任，但實際上早已對他

嚴加提防。

據消息來源說，一月十九日拉薩市召開宣判大會，對拉薩暴動事件的二十七名參與者進行判處，其中多被判以死刑和重刑。當時班禪喇嘛正在日喀則市，他聞訊後一掃臉上常掛的笑容，露出十分陰鬱的表情，長時打坐不語。僧侶們都說：「大師在爲受難者祈禱。」

班禪喇嘛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猝然病逝，他的死因給世人留下了一個難解之謎。

魏京生確在北京鄧小平執意不放

據來自北京公安方面的可靠消息證實：「北京之春」時期的民運人士魏京生，以前被關押在青海省一個叫做「海南洲」的勞改農場，現已解回到北京的一座監獄中繼續服刑。

消息來源說，現在魏京生的獄中處境較在青海勞改農場時有改善，健康狀況並非如外間流傳的那樣惡化，有病可以及時醫療，有書、報閱讀；他甚至還在進修有關電器學方面的專業知識。

只是中共爲避免來自外界的『麻煩』（主要是來自國際間對魏京生的關注），所以魏京生的收監地一直保密而鮮爲人知。

又據瞭解中共上層動態人士透露：前不久，方勵之寫給鄧小平要求釋放魏京生及一切政

治犯的信，鄧小平辦公室確已收到，不過鄧小平講：「已經通過法律判決了，怎麼可以隨便放人呢？誰說了也不算嘛！」表示決不提前釋放魏京生。

中共鼓勵沿海漁民「三通」

據來自福建省直機關的消息證實：今年以來，浙江、福建、廣東一帶沿海的中共有關方面，已公開向出海漁民宣講：可以利用有利條件，採取正當方式，打開與台灣「三通」的途徑。

上述省份的統戰辦，對台辦及軍、政部門聯合作業，指導、協助大陸漁民與台灣漁民進行海上經商、貿易；同時鼓勵大陸漁民「可以藉機去台灣看看」。他們發給漁民台灣地圖，介紹台灣的知識讀物，講解台灣的一般法律常識，輔導登岸及緊急對策方法等，但告誡漁民不可與台灣的黑社會不法份子來往、勾結。

據悉前不久福建省省長王兆國曾在一份內部文件上批示道：「充份發揮海上『已通』優勢，架起兩岸民間來往橋樑」顯見中共當局已將利用沿海漁民進行海上「三通」納入了重要運作議程。

鄧小平決定治理政治環節

在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的同時，中共上層決定要治理、整頓政治環境。

據來自北京的消息說，一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會議在京召開前夕，鄧小平在聽取趙紫陽、喬石等人的彙報時指出：當前的政治環境也應進行治理、整頓。喬石說：「治理、整頓政治環境的提法是否會引起人們認識上的誤解，以為又要搞政治運動了。」鄧小平講：「當然不是搞政治運動，至於提法你們可以研究決定，但政治環境如不進行治理、整頓，經濟環境的治理、整頓恐怕是孤掌難鳴。」

鄧小平的上述指示精神，已經開始在黨、內外貫徹執行。以往所謂政治上的「寬鬆」局面正在收緊。雖然迴避了「治理、整頓政治環境」的提法，但已掀起了治理、整頓政治環境之風。

中共加倍防範民間沙龍

近年來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環境的「寬鬆」，國內各種文學、藝術沙龍和民間非政治性的結社活動日漸增多。一些退休的老軍人、政界人士或已經失勢及正得勢高幹的子弟也通過自然組合而成爲沙龍或結社中人。目前更有一些持不同政見者和知名的政治改革理論家，如方勵之、嚴家其等也參加了自發的民間結社活動。這便使得中共當局產生了疑慮和顧忌。

據一位剛剛由國內出來的原上海市公安局的幹部反映：他以前是刑警，後來專門執行偵調各種沙龍與結社活動情況的任務。他們共十多人，採取各種方式滲透進重點要調查的沙龍或結社的內部；有時也用交朋友、拉交情的方法，在沙龍或結社中放「眼線」，將整個情況

摸得一清二楚。對於其中的人員思想情況、言論、活動、社會反映等都有定期報告，一經發現有「反常越軌」言行，立即「督導糾正」。保證了這些沙龍和結社不至成爲「政治氣候」而對中共統治構成威脅。

據悉，上述行動是中共公安部門的統一部署，在全國其他省、市同時進行。

官方憑憑的日本領館門前示威

由於日本的一些初級日語學校設備與師資條件不符合辦學規定，以及存在的保證人證件方面的違法現象，日本目前正在進行整頓，所以，中國上海等地數萬名申請赴日學習日語的青年的入境簽證被日方遲發或拒絕。但這些青年已事先向日語學校或中間人交了巨額的學費和手續費，因此，他們不服並感到義憤，近幾個月來曾多次在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前舉行請願、抗議。

據日前由上海抵東京的幾位青年反映：他們在日本總領事館前的行動，完全是受到上海市公安局的支持和保護的。

當初，這些青年並不敢到日本總領事館前惹事，唯恐造成國際影響擔不起責任。他們原想請求政府出面與日方交涉加以妥善解決，但政府表示暫不宜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處理，而是鼓勵青年們去給日本總領事館施加壓力。

一位上海青年說：「我就親自聽到市公安局的一名幹部講，這件事的責任完全在日本方面，你們應向日本總領事館去論理。事情一鬧開，他們的政府不想管也得管，中國政府也好講話，日本就是軟的欺侮硬的怕。當有人問是否可以給日本總領事館貼大字報和抗議標語？公安局的幹部說，來文的行，可千萬不能來武

的。」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接連出現，中國青年在日本駐滬總領事館前抗議、請願的事

件。有些參加過上述事件的青年現在說：「我們在自己的國家裡發生了困難，政府都不能主動出頭幫我們解決，却鼓勵我們去外國領事館鬧。如果我們在外國出現了什麼困難大概就更沒有人管了，想起來真叫人寒心。」

鄧小平請顧委老人排憂解難

據中共上層知情人透露：鄧小平對當前改革所面臨的重重困難深深憂慮。一月初他曾在上海致函陳雲，希望顧委「老同志能以自己的豐富經驗和實際工作爲國家排憂解難」。

鄧在信中建議：中央顧委的老幹部，身體條件允許的，最好請到下邊去多走走、多看看，幫助一線的幹部解決一些難題。現在黨和國家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新幹部亟需老幹部的支持，老幹部要盡量發揮餘熱。

據情況知情人分析：上述信的內容顯示，在成堆的困難面前，鄧小平對新幹部的「招架能力」已產生懷疑，寄望於老幹部的支持與協助來共撐困局，渡過難關。

陳雲已將鄧小平信的精神傳達中央顧委，一些已退居二線的老幹部開始陸續分赴各地「共赴國難」。（黎音）



簽名發起人名單及聯繫地址見背頁

致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

公開信

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於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鄧小平主席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四十週年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是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致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

公開信

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於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鄧小平主席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四十週年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是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致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

公開信

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於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鄧小平主席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四十週年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是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致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

公開信

我們得悉方勵之先生於八九年一月六日致鄧小平主席的公開信後，深表關切，我們認為在建國四十週年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之際實行大赦，特別是釋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將會創造一個有利於改革的和諧氣氛，同時也是符合當今世界日益尊重人權的普遍潮流。

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三日

請簽名支持，並將餘下的信件寄給您的親友

公開信全文見背頁

簽名發起人

北島、邵燕祥、牛漢、老木、吳祖光
李陀、冰心、宗璞、張潔、吳祖湘
湯一介、樂黛雲、張岱年、黃子平、陳平原
嚴文井、劉東、馮亦代、蕭乾、蘇曉康
金觀濤、劉青峰、李澤厚、龐朴、朱偉
王焱、包遵信、田壯壯、王克、高阜
蘇紹智、王若水、陳軍

簽名者請按以下地址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三里屯 麒麟飯店 二〇六室
「八九」大教辦公室 陳軍

簽名發起人

北島、邵燕祥、牛漢、老木、吳祖光
李陀、冰心、宗璞、張潔、吳祖湘
湯一介、樂黛雲、張岱年、黃子平、陳平原
嚴文井、劉東、馮亦代、蕭乾、蘇曉康
金觀濤、劉青峰、李澤厚、龐朴、朱偉
王焱、包遵信、田壯壯、王克、高阜
蘇紹智、王若水、陳軍

簽名者請按以下地址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三里屯 麒麟飯店 二〇六室
「八九」大教辦公室 陳軍

簽名發起人

北島、邵燕祥、牛漢、老木、吳祖光
李陀、冰心、宗璞、張潔、吳祖湘
湯一介、樂黛雲、張岱年、黃子平、陳平原
嚴文井、劉東、馮亦代、蕭乾、蘇曉康
金觀濤、劉青峰、李澤厚、龐朴、朱偉
王焱、包遵信、田壯壯、王克、高阜
蘇紹智、王若水、陳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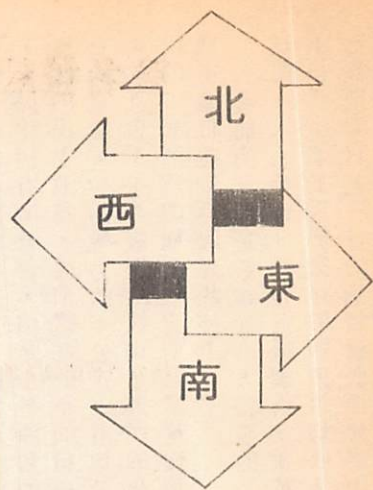
簽名者請按以下地址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三里屯 麒麟飯店 二〇六室
「八九」大教辦公室 陳軍

簽名發起人

北島、邵燕祥、牛漢、老木、吳祖光
李陀、冰心、宗璞、張潔、吳祖湘
湯一介、樂黛雲、張岱年、黃子平、陳平原
嚴文井、劉東、馮亦代、蕭乾、蘇曉康
金觀濤、劉青峰、李澤厚、龐朴、朱偉
王焱、包遵信、田壯壯、王克、高阜
蘇紹智、王若水、陳軍

簽名者請按以下地址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 北京
三里屯 麒麟飯店 二〇六室
「八九」大教辦公室 陳軍

請簽名支持，並將餘下的信件寄給您的親友



民主黨派聚眾百萬

▲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國八個民主黨派幾乎有名無實，到八十年代初基本已面臨後繼無人的境地。可是到一九八九年，八個民主黨派已有近三十萬人的隊伍，加上工商聯，則有百萬之眾。其中浙江省民主黨派人士十年間增長三·五倍，上海市增長一·三倍。儘管從總數上民主黨派人士還微不足道，但從增長勢頭來看，他們將會在社會上起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匈共為匈牙利事件平反

▲匈牙利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一項決議，認為一九五六年的布達佩斯動亂是一場合法的起義，但後來惡性發展為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暴亂，匈共為匈牙利事件平反主要是為那些當年獲罪的人恢復名譽。可是匈牙利人民對於這個決議的妥協性仍不滿意，人們要求對當時下令鎮壓的人進行懲罰。

公開批總書記的文章在蘇出現

▲一個名叫寒吉·安德烈耶夫的人在文學月刊「涅瓦」上發表文章，批評蘇共正把蘇聯引向「道德墮落」和不斷惡化的經濟危機。他還批評戈爾巴喬夫同時兼任黨總書記和國家主席是不對的，因為前者只是從小圈子裡選出的，違反人民國家的原則。這篇文章在蘇聯引起廣泛討論，是去年六月「新世界」雜誌發表批評列寧文章後引起最大震動的文章。

波蘭、匈牙利放棄一黨制

▲波蘭總理賴克斯基在上月於華沙發表聲明說，波共願放棄一黨專制，採納與其它政治勢力競爭的原則。目前波蘭工人黨正與團結工會代表就此新政策進行磋商。

▲匈牙利共產黨總書記克魯茲在中央全會後也宣佈，實行政治多元化，允許多黨制局面存在。現存的其它三個小黨——農民黨、激進黨及民主黨將會取得合法地位。匈共願意與它們競爭執政權。

大陸閩東出現同性戀「結婚」

▲一月十日，閩東周寧縣池鄉底源村一對同性戀男青年舉行民俗婚禮，發東邀近百名親友赴宴。「新娘」葉興穿流行女裝，他二十六歲，三年前從軍隊復員，當時為鄉計劃生育辦幹部，新郎李林梓是個普通農民，三十歲。

葉興兩年前因工作關係常駐底源村，認識了剛剛失戀的李林梓，兩人開始熟悉，好得形影不離。隨後葉開始仿女性特徵，戴胸罩，講話柔聲細語。去年二月葉搬進李家與李同居，

同睡一床，感情日增，不能自拔，乃決定結婚。婚前鄉領導疑葉是兩性人，對其體檢，結論是完全男性特徵。鄉領導企圖勸阻其「結婚」，未逞，故將葉解聘。

北京已切斷簽名者與海外聯繫

▲中共對三十三位知識份子的聯名信十分惱怒，已決定採取封鎖措施，對三十三人中有電話者的電話綫實行干擾。

據一些寫信回家的留學生反映，儘管海外對三十三人簽名活動的響應轟轟烈烈，可是國內人對此竟一無所知，可見中共新聞封鎖之嚴。最近民聯總部已動員盟員寫信回國給親朋好友，告之此事，發動國內群眾聲援。

促大陸民主改革·浪濤一波接一波

▲近卅位台灣具批判色彩的知名學者，廿一日發表聯合聲明，呼應海外及中國大陸知識份子所發起的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運動。聲明中除呼籲中國大陸進行自由民主改革、尊重人權、釋放政治犯外，並要求中共正視此一民主潮流，勿擅輕言壓抑。

這項聯合聲明係繼大陸卅三位知識界精英，及海外五十六位學術界人士相繼發表要求大陸進行民主改革宣言後，來自台灣的第三波行動。聲明由陶百川、胡佛、王作榮、楊國樞等多位經常以言論及著述批判時政的學者聯名起草，並得到文崇一、韋政通、張忠棟、張朋園、李鴻禧、李亦園、瞿海源、蕭新煌等多人簽署支持，廿一日在台北作最後修改後發表。

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改革宣言

我們是海內外一群關切中華民族前途的中國人，我們懷着使全中國早日走上人民幸福和國家富強的道路的強烈希望在本宣言上簽字。

中華民族歷來是一個勤勞、善良、聰慧而又富於正義感的偉大民族，它曾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過光輝燦爛的篇章，然而，近代以來，我們民族却陷入貧困、落後、愚昧和痛苦的深淵，雖然中國人民爲改變這一屈辱的境況作出了許多艱巨努力，但是，主要由於體制上的原因，中國大陸與世界先進國家間的差距愈拉愈大的危急趨勢沒能根本扭轉。大多數人民還不得不爲謀求基本的生存條件而艱辛奔波。

自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社會政經情勢確有改進，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是由於陳舊的政治體制沒有適時地進行實質性的民主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成果面臨被特權階層吞噬蠶食的危險，政治權力的不公正占有導致了社會財富的不公平分配，新的社會不平等嚴重地挫傷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官僚擅權必然造成的人類潛能的極大浪費消蝕了緩慢增長的勞動生產率，人民的強烈不滿日益接近臨界狀態！

當前的局面是嚴峻而令人擔憂的：政風敗壞、官倒猖獗、特權泛濫、人心浮動、教育危機瀕仍、改革幾近夭折。環顧宇內，人們不但爲排名於世界末尾的國民平均收入而羞愧，也爲愈演愈烈的貪污腐敗與日甚一日的通貨膨脹而焦慮不安，事實證明，對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專制傳統根深蒂固，特權勢力盤根錯節的病態社會，只在

經濟政策上作一些修正而不在政治體制上進行實質性的民主改革是無法解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

現行政體制的根本弊端是：它取消了人民理所當然應該享有的對於政治制度、政府及執政黨的政治選擇權，實踐證明，人民一旦喪失了政治選擇權，他們也就無法保障自己的其他基本權利。人民被剝奪政治選擇權的同時也就被窒息了他們的主動精神與創造能力，而執政者擁有不受選擇與監督的絕對統治權的同時也帶來了自身不可遏制的腐化。他們也就必然會從社會公僕蛻化爲社會主人。名義上的全民所有制也必然演變成特權階層所有制，由於人民長期無權而鬱積的社會矛盾醞釀着無法紓解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於是周而復始的社會動亂和生產力的重復破壞也將不可避免。

中國人民在付出了極其慘重的犧牲和經歷了創巨深痛的劫難之後終於覺悟到，決不能再把自己的命運盲目地寄托在執政者的正確領導和英明決策上面，事實上，絕對正確和永遠不犯錯誤的政黨與領導人是沒有的，根本的問題不在某個具體的執政黨以及領導人的品質好壞及其政策是否正確，根本的問題在於人民必須擁有對於執政者的選擇權，質言之，人民必須有權通過法定程序將執政者置於自己的有效監督及實際控制之下，當人民能夠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平地更換那些不稱職的執政者時，後者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就不再像以往那樣可怕和難以挽回的了。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大陸這樣一塊幅員如此遼闊、人口如此衆多、經濟如此貧困的國土之上，如果沒有一個廉潔、有效的政府

和公平、合理的法律秩序是根本無法完成現代化的歷史任務的，而達到這一目標的唯一方法就是進行政治體制的民主改革，應該指出的是，大陸執政黨內的不少有識之士也開始認識到進行民主改革的必要性，但目前至關緊要的是必須採取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才能阻遏改革停滯下滑的頹勢，聚人心於渙散，挽狂瀾於既倒。

時機是緊迫的，歷史已經把民主改革的任務提到了全國人民包括執政黨的面前了。繼續拖延民主改革是對民族前途不負責任的倒退行為，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近年來，與大陸僅一水之隔的台灣，在人民力量的推動下，執政黨應順歷史潮流，開放黨禁報禁，社會開始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軌，這是一個在同樣的文化歷史背景下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實行民主嘗試的成功先例。

最近香港人民爭取民主政制的努力有力地表明，建設民主政治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無庸置疑，促進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完全符合香港和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們相信，只有盡快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改革，徹底解除限制經濟自由發展的人為障礙，才能逐步縮短海峽兩岸實際存在的政經差距，為中國的和平統一創造現實的基礎。從而為全中國包括香港和台灣的長久安定和繁榮提供可靠的保障。中國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中國，決不是一黨一派的中國，促進中國的民主、自由、進步、繁榮是全體中國人民的神聖天職，決不是一黨一派的特權，現在是人民主動起來表明自己的政治要求的時候了，為推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歷史性步伐，本宣言的簽署者謹向全國人民包括執政黨慎重提出下列倡議：

一、開放民辦報刊：人民有權經辦不受官方支配的獨立報刊，只要不是鼓吹暴力或散佈色情的，政府部門不得干涉，報刊觸犯法律應經由司法程序處理；

二、保障結社自由：人民有權組織和參加獨立於執政黨的各種社團和政黨，在非暴力前提下，各人民團體和非執政黨有權公開批評執政黨的政策；

三、民選區縣首長：區縣以下（包括區、縣級）政府首長一律由當地人民直接普選產生，他們受選民的監督，對選民負責，只有原選區選民才有權改選和罷免他們；

四、釋放政治囚犯：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即所謂反革命犯），刪除刑法中關於「反革命犯」的條文，宣佈不得以思想意識和政

治立場入人以罪；

五、實行黨政分開：執政黨各級組織不得向政府機關發號施令，黨的決議文件只對黨內具有約束力，撤銷基層單位的專職黨務人員編制。

以上五項民主改革倡議，只是進行初步政治體制改革以逐步歸還人民政治選擇權的基本要求。我們認為爭取在盡量短的時間內，真正實現上述倡議，是中國大陸能否走向民主化的關鍵。我們呼籲一切支持中國大陸民主改革的朋友們在本宣言上簽名。

凡認可上述宣言的宗旨並在本宣言的任一複制件上補署的人自署名之日起即自動成為本宣言的簽署人之一。

海內外一切贊同民主政治的中國同胞團結起來，為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進程而共同奮鬥！

本宣言起草於聯合國人權宣言四十週年紀念日

附：為統計簽名人數：請簽名者來函或來電告知促進中國民主化聯絡組

電話：(七一八)八九九一五九八六 (七一八)六九九一四三二五

聯繫人：NI YU-XIAN
地址：三三一十八 九十六 STREET
CORONA NY 11368 U.S.A.

首批發起人名單（排名不分先後，以收到回音為序）

- | | | | | | | |
|-----|-----|-----|-----|-----|-----|-----|
| 方勵之 | 余英時 | 許倬雲 | 李歐梵 | 杜維明 | 吳文津 | 丘宏達 |
| 楊力宇 | 胡佛 | 鄭竹園 | 夏志清 | 叢 魁 | 姜敬寬 | 朱永德 |
| 陳博中 | 張系國 | 黃 默 | 楊國樞 | 陳憲中 | 李 怡 | 溫 輝 |
| 金耀基 | 勞思光 | 胡菊人 | 翁松熾 | 李柱銘 | 陳子巖 | 司徒華 |
| 蔡文輝 | 鄭清茂 | 蘇競存 | 殷之銘 | 唐異明 | 張旭成 | 張富美 |
| 傅新元 | 陳鼓應 | 官國蒼 | 程鐵軍 | 吳年人 | 李少民 | 余大海 |
| 司馬璐 | 辛旭東 | 丁學良 | 杜念中 | 顧為群 | 熊 玠 | 黃雨川 |
| 楊中美 | 艾未未 | 董鼎山 | 裴敏欣 | 王石金 | 項國寧 | 周策縱 |
| 田弘茂 | 周天瑞 | 莫利人 | 叢大長 | 李三元 | 謝暉光 | 陶百川 |
| 倪育賢 | 林建坤 | | | | | |

中國民聯聯絡站遍佈全球

中國之春銀行帳號改爲：050043

BANCO DE BOGOTA TRUST COMPANY
87-01 Roosevelt Avenue
Jackson Heights, NY 11372

美國紐約總部：

P.O.Box 70-1400
Flushing NY 11370-9998
U.S.A.

港澳聯絡站：

香港九龍旺角
郵政信箱 79047

日本聯絡站：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16 號信箱

法國聯絡站：

B. 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ee
Cedex 2, FRANCE

西德聯絡站：

Postfach 410223
5300 Bonn W. GERMANY

荷蘭聯絡站：

Develstein 518
1102 AK Bijlmer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英國聯絡站：

P.O.Box 58
Manchester
M14 6XL, UK

澳洲墨爾本聯絡站

G.O.P. Box 376 F
Melbourne, Vic 3001
AUSTRALIA

澳洲悉尼聯絡站

P.O.Box K477
Haymarket N.S.W. 2000
AUSTRALIA

南美聯絡站：

P.O.Box 9A
Alborada Guayaquie
ECUADOR

加拿大蒙特利爾聯絡站：

P.O.Box 574 Station B
Montreal, Quebec
CANADA H3B 3K3

加拿大溫哥華聯絡站：

P.O.Box 94052
Richmond, B.C
CANADA, V6Y 2X2

美國舊金山聯絡站：

P.O.Box 146446
SF. CA 94114-6446

美國洛杉磯聯絡站：

P.O.Box 565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美國華盛頓聯絡站：

P.O.Box 4558
Arlinton, VA 22204

美國休斯頓聯絡站：

P.O.Box 710784
Houston, TX 77271

美國芝加哥聯絡站：

P.O.Box 16061
Chicago, IL 60616-0061

美國西雅圖聯絡站：

P.O.Box 95802
Seattle, WA 98145-2802

美國匹茲堡聯絡站：

P.O.Box 7122
Pittsburgh PA 15213

美國達拉斯聯絡站：

P.O.Box 1701
Dallas TX 75275

美國路易斯維爾聯絡站：

1249 S, 2nd ST Apt 1
Louisville KY 40203

美國麻州聯絡站：

47 Central ST, Apt 5
Waltham MA 02154

美國肯塔基州聯絡站：

3385 Ottee Creek Dr
Lexington KY 40502

美國密西根州聯絡站：

1412 I Spartan Villige
E Lansing MI 48823

美國新澤西州聯絡站：

Box 1404 Raspery CT
Edison NJ 08817

美國北卡州聯絡站：

115 Woodburn Rd
Raleigh NC 27605

美國威斯康星州聯絡站：

5152 Anton DR, #207
Madison WI 53719

美國愛荷達州聯絡站：

P.O.Box 3561
Moscow ID 83843-0477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聯絡站：

P.O.Box 19427,
Baton Rouge LA 70893

美國夏威夷州聯絡站：

P.O.Box 8718
Honolulu HI 96815

美國喬治亞州聯絡站：

2378 Johnson RD
Atlanta, GA 30345

美國佛羅里達州聯絡站：

P.O.Box 4572
Hollywood, FL 33083

美國康州聯絡站：

(地址未定)

美國南卡州聯絡站：

(地址未定)

美國特拉華州聯絡站：

(地址未定)

美國印地安那州聯絡站：

(地址未定)

■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NY 11370-9998

■ 通訊處：(美洲) BOX 701400 TRAINSMEADOW STATION, FLUSHING,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郵政信箱 79047 號

(日本) 日本東京都小金井市郵便局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P.169 77315 MARNE LA VALLE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P.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 電 話：(美洲) (718)429-6777; (718)507-4739 『香港』 3-872506

■ 零售價：(美) 2.50 美元 (加) 3.00 加幣 (港) 10.00 港幣

SECOND CLASS

POSTAGE PAID

FLUSHING N.Y.

ISSN 0735-8237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CHINA SPRING 74-14 Woodside Ave. Elmhurst, NY, 11373